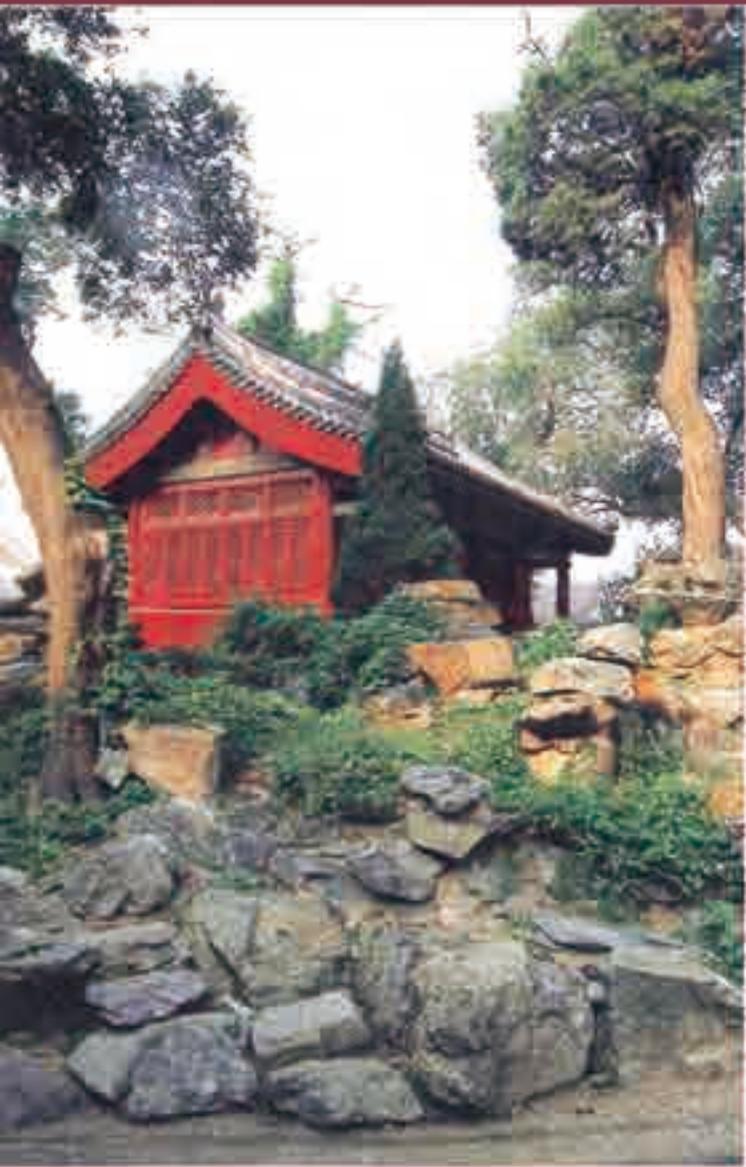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发掘展示无形文化内涵——探化历史名城传统文化保护
□ 关于丹宸北京工业遗址调查的缘起和思考
□ 万寿东路建筑群的历史变迁
□ 北京石刻文献整理的新成果——《房山皇志》序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7 3



乔心，女，1937年3月生，辽宁省辽阳市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曾先后担任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博展览设计、考古发掘、北京史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被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历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十五”规划历史组成员。

20世纪60年代，她就查阅、搜集《金史》资料，撰写了“辽金元展”中“金中都”部分的展陈提纲。在首都博物馆工作期间，她设计了“北京周史展”的展陈提纲；主持了“孔庙展”等展览，并撰写《孔庙》一书，宣传孔庙历史文化；1984年还亲自为首都博物馆首次赴美展出撰写提纲、运送文物。

70年代，她多次参加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工作，如昌平西周白浮墓、大葆台西汉墓等，撰写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昌平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发掘报告》。在文物研究所主持业务工作期间，她主持并参加了“金陵考古调查”课题，发现了金碑、残石街道等重要遗迹遗物，为研究金代北京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并据此撰写了《金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文章。

1995年，在北京市领导及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她主持召开了“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北京琉璃河周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及遗址本身进行了认真考察、缜密论证，认为北京建城最早始于西周西都时期，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这个结论现已达成中外共识。

她将北京史的研究重点放在辽、金方面，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撰写了《金朝胡沙皇志铭考释》等多篇关于墓志的考释文章，认为契丹、女真等民族在北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从历史学高出

文物局

友，阐述北京建都始于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并建三金中都，使其成为当时金王朝的统治中心。

2003年，恰逢金中都建城850周年，为了宣传北京、弘扬北京的悠久历史文化，她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发出积极倡议，并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2003年9月，她主持召开了“北京建都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对金中都历史研究的众多优秀成果，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作为一名从事四十多年文博考古工作的业务干部，她深知几十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中凝聚着几代考古工作者付出的辛勤汗水。北京历史悠久，文物资料丰富，运用建国后几十年的重要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北京古代史，是她多年的夙愿。她策划的《图说北京史》一书被列入北京市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作为该书的策划和主编，她组织文物研究所的同志参加编写，经过两年多的文物遴选、撰文、修改润色，在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市文物局领导的支持下，一部集史料、学术和科学价值于一身的《图说北京史》在1999年正式出版，向国庆五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实现了我市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愿望。

她著述颇丰，除了与他人合作编写的《老北京城与老北京人》、《北京名匾》等，还有《辽丁氏两方墓志考》、《北京地区壁画墓》等多篇有关北京历史文化及文物考古方面的论文被收录进《北方考古研究》第二辑中。被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的《北京考古十年》（1989—1999）课题的初稿业已完成，待修改后出版。

1999年乔心同志退休后，受聘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另外，她还担任着北京考古学会会长、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和黑龙江省阿城市历史顾问等职务，仍然在北京史研究及文物保护方面孜孜不倦的工作着。

专家榜

吴梦麟，女，1937年12月生，山西省文县县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至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又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市文物局、市文物研究所、市古建研究所、石刻艺术博物馆供职。40年来一直从事北京市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工作，期间对18个区县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因此对北京地区文物较熟悉，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工作经历主要为四个方面：

一、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察与测绘。毕业后进入文物工作队考古组，主要做地上文物保护工作。当时正值国保单位要求做“四有”。她参加了我市国保和市保单位的考察、整理档案工作。1972年参与近郊区重要文物的实地考察，做了详细测绘记录，并撰文介绍其价值，后来房山万佛堂花水洞、昌平银山塔林等被公布为国保。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后，她与地上文物组立即奔赴现场，记录震损情况，并参加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京津唐地震小组”，冒着余震的危险到三地调查，记录了古建震害，取得了第一手资料。80年代初组织参与墓四幅、古河城、黄草梁长城调查，并用考古方法进行发掘测绘设计。这是建国后北京地区首次较大规模的实地科学调查。1985年参与筹建市古建研究所。

二、拯救与保护“文化大革命”劫余文物。“文革”非常时期，老前辈于树勋力荐她担任古书、文物清理小组秘书，整理“文革”浩劫幸存文物。任房房组长时与老先生们一起工作，学到不少文物鉴定知识。当时整理的档案为中国文物史留下了珍贵资料。她曾风雨无阻地赴宋庄钢厂拣选铜佛等文物，据此的一些文物今日已成为首博展柜中的精品。

1979年，她参与文管处配合民政局修复“文革”中破坏的列玛案等传教士墓。面对残垣，调查，查资料，运用考古方法解决工程难题。墓按原状恢复后，得到国外好评，也起到文物外交的作用。

三、专题专项的研究与成果。她搞科研一直与工作紧密结合，早期论著多以编写保护单位档案说



明或勘察报告为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今日北京》等均有她撰写的条目。曾参加“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出国文物展”，在宿白先生指导下整理了材料，检阅了文献。唐山地震后，她撰写了《北京古建震害》，并参加编写《中国唐山大地震》古建震害部分，该书是国内外罕见的地震实况文献记录，也是社会科学材料专文列入自然科学巨著的特例，为此受到科技奖。1987年在伦敦“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会议上，她撰写了文物保护论文(中英文)，制作了什刹海与大钟寺规划保护模型，受到参会国代表的特别关注。

她在大量调查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注重专题性的思考。如主持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中北京地区音乐文物的搜集工作，展示了北京古塔砖雕中伎乐内容的精彩画面。多年关注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撰写《房山石经述略》等论文多篇。在石刻馆工作期间她转向对石刻石雕的关注，撰写了《北京地区长城石刻概述》、《北京基督教石刻概述》。任《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主编及专文撰者。她注意碑刻中传递出的北京营造历史的信息。在京崇城学会论文集撰写多篇论文，如“北京宫殿陵寝采石”、“平则门”匾额”等。参与撰写了《中国石刻通论》、《中华文化通志·丧葬卷》等。

四、“退而不休”，她仍然坚持工作在文物保护和研究的阵地上。她看重与区县文管部门和兄弟博物馆的联系，与业务人员交流切磋，积极宣传北京文物。现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委和特邀编辑，并到大学讲课，作科普讲座等。她虽已到古稀之年，但心态还很年轻。今后十分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年轻人。

北京延庆县四海镇火焰山营盘遗址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化委员会



1. 营盘遗址与九眼楼航拍照片



3. F15 房屋基础



2. 营盘遗址航拍照片



4. “威严”石匾



1. 铁蒺藜



2. 铁弹丸



3. 兽面纹瓦当



4. 莲花纹建筑构件



1



2



3



4



5



6

北京文博



目 录

2007年第3期(总49期)

文物工作

- 发掘展示无形文化内涵,深化历史名城传统文化保护
——对总规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七
..... 孔繁峙(5)
- 为推进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 李学军(9)
- 关于开展北京工业遗址调查的缘起和思考 王春城(16)

考古简报

- 北京市延庆县四海镇火塔山营盘遗址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化委员会(20)

文物研究

- 中国古代玉带具沿革及时代特色 沈 咏(26)
- 周代的车马装饰所蕴涵的车马制度 冯 好(34)
- 北京辽金石刻刻工官氏家族考 周 峰(40)
- 万寿寺东路建筑群的历史变迁 孔祥利(45)
- 房山岫云观建筑沿革及相关史实考 韩建议(50)

卷王旧影 周勐忠(55)

北京史地

明代人殉考略 化 蕾(62)

试论清代驻京喇嘛职衔及管理机构 陈晓敏(67)

清代八旗值年旗初探 徐晓倩(73)

文物保护

先农坛古代建筑彩画地仗的肌氏定氮法分析··· 胡一钰 胡东波 康瑾强(81)

资料信息

北京石刻文献整理的新成果——《房山石志》序 齐 心(86)

19至20世纪研究北京民俗的外文文献介绍 赵晓阳(89)

北京市文物局2007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杨康明(97)

封面:万寿寺观音殿

封底:万寿寺万佛楼前中西合璧的月亮门

封二、彩插一:文物局专家楼

彩插二、三、四:北京延庆县四海镇火焰山雪盘遗址发掘简报

封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二)

声 明:为了满足广大文博爱好者的需求,同时为了维护撰稿者的权益,避免发生著作权方面的纠纷,特此告知:凡对本刊投稿即同意授权本刊出版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稿酬已包括其使用费,有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事先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樊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曹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超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王玉伟 巴爱民 刘建全 刘超英 杨 玲 甄 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吴梦麟 姚 安 赵其昌 曹宝麟 徐 伟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昆 舒小峰 韩 东 韩 杨 孟桂华 葛英会 席公俊

主 编:张其 副主编:陈晓敏 编辑部主任:韩建明

本期责编:韩建明 陈 清 高智伟 美术编辑:宋慧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3, 2007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Explore and Exhibit Invisible Culture Connotation, Deepen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istorical Famous City—the Seventh Discussion on Prot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Famous City after Compilation of Collectivity Programming

..... by Kong Fanzhi(5)

Serve to Pus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n Beijing City—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Museum Cause of Beijing in the “Eleventh Five-Year” Period

..... by Li Xuejun(9)

Origin and Reflection of Launching Investigation to Industrial Sites in Beijing

..... by Wang Chuncheng(16)

ARCH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Barracks Sites on Huoyanshan Mountain, Sihai Town, Yanqing County, Beijing City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Yanqing Cultural Committee(20)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Evolution and Times Feature of Jade-Studded Belt Wares in Ancient China

..... by Shen Zhu(26)

Horse and Chariot System Contained in Horse and Chariot Decorations of Zhou Dynasties

..... by Feng Hao(34)

Study on Gong's Family of Carved Stone Inscribers in Liao and Jin Dynasties in Beijing

..... by Zhou Feng(40)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es in Eastern Line of Wanshou Temple

..... by Kong Xiangli(45)

- Study on Establishment and Evolvement of Xiuyun Temple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in Fangshan District by Han Jianshi(50)
- Old Photos of Prince Gong by Zhou Jinai(55)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Study on the Human Sacrifice in Ming Dynasty by Hua Lei(62)
-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Rank and Administrative Setup of Lama in Capital in Qing Dynasty by Chen Xiaomin(67)
-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Banner on Duty for the Year of Eight Banners System in Qing Dynasty by Xu Xiaoqian(73)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 Analysis on Ground Layer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Color Paintings in Xiannong Altar in Kjeldahl Nitrogen Determination Method ... by Hu Yihong, Hu Dongbo, Kang Baoqiang(81)

DATA AND INFORMATION

- New Achievement in Arrangement of Beijing Carved Stone Documents—Preface of Epitaphs Unearthed in Fangshan District by Qi Xin(86)
- Introduction on Foreign Language Documents about Beijing Folk Custom Research in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by Zhao Xiaoyang(89)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07) by Yang Kangming(97)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u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u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shu, Wang Danjiang, Wang Yumei, Ba Aimin,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Yang Ling, Zhang Zhan,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Wu Menglin, Yao An, Zhao Qichang, Jin Honghui, Xu Wei,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Vice-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mei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yahoo.com.cn

发掘展示无形文化内涵, 深化历史名城传统文化保护

——对总规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七

孔繁峙

新修订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出:“发掘、整理、恢复和保护丰富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地名、戏剧、音乐、字画、服饰、庙会、老字号等,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精髓,焕发古都活力。”发掘和展示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遗产,是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和揭示历史文物和传统建筑中的无形文化内涵,是今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于深化名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进一步挖掘历史文物建筑中的文化内涵,全面展示古都丰厚的历史传统文化,不断推进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综合效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北京历史名城文物建筑中 无形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探索

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遗产,是随着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保护的不断完善及整体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项历史文化保护的内容,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工作的深入与延续。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最初是为了保护有民族特点、世代相传的各种演奏艺术、工艺制作等传统民间艺术,如昆曲、京戏、音乐、曲艺等等。随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保护工作也逐步向物质遗产当初制作及营建过程中的精神内涵、意识本质、制作

工艺等无形文化领域深化,以揭示物质性遗产中当初所具有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使无形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北京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存有十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视角观察,保存至今的古都北京,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时间、空间、建筑、意识和传统价值观构成的历史文化象征。尤其是经历代营建并保存至今的古都城市的中轴线建筑、皇宫御苑、王府宅第、坛庙寺观、民居宅院等各类建筑,除代表了古都城市完美的整体布局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以外,还集中反映了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封建国家的礼仪法度等无形的精神及意识观念。正如梁思成先生当年指出的:“建筑之规模、型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射,……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溯其文化,其故因此。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因此,在北京传统文化中,历史建筑不同于传统绘画艺术给人以美感,也不同于传统表演艺术给人以享受。北京的历史建筑,不但能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其建筑自身都凝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精髓,给人以深刻的传统教育和启迪。



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传统京剧演出

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中,我们对历史文物建筑和历史遗迹的认知程度,已经逐步从建筑外观反映出的传统工艺水平、历史价值等方面的直观认识,向当年文物建筑形成中所包含的观念意识、文化内涵深化,通过揭示历史建筑中蕴藏的民族历史文化,促进和推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

从北京名城历史建筑的形体层面观察,人们首先看到和认识的是,历史上封建帝王对全国实施统治时期,北京古都是由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建筑组合的完整城市。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宫殿御苑为中心的皇城、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建筑、分布于内城的座座王府、官邸和建筑上各具特色的坛庙寺观以及大片的四合院、胡同等市井民居,都曾在历史上分别担负着古都城市的不同功能,反映了古都城市漫长的发展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建筑特色。

从北京名城历史建筑构成的传统意识观念层面观察,我们可以深入地感受到古都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和了解到古都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意蕴。这些不同的历史建筑就是不同的意识观念与古代营造技艺的融合和统一,是历史社会以内在的无形文化内涵,塑造了北京历史名城中的各类城市建筑。由于历史传统建筑表现的抽象性,它所表达

的意境和直观效果,并不像无形文化遗产那种再现性艺术表达的情感那么具体、真切,只有进一步的研究发掘,才能真切地展现历史建筑深层次构成的独具特色的人文价值。

二、北京历史名城建筑中无形文化的基本特征

北京地区自西周时期古燕文化崛起之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等千余年的演变整合与融通积淀,已发展形成具有深厚影响的地域文化,特别是辽南京城与金中都城的相继建立,标志着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形成,而元代大都城的营建更是奠定了北京城自元代以来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古都城市地位及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古都城市这一特有的文化形态,历经 700 多年的融合荟萃与发展演变,铸就了北京古都城市历史文化鲜明的传统特征:高大的城墙围合全城,皇城、宫城位居城中,中轴线建筑纵贯都城,天、地、日、月四坛分布四周等布局的宏伟气势及等级森严的府邸、民居等建筑,体现了封建历史时期神权、皇权和维系封建政治统治以及适合各阶层人士生活的都城建筑体系;在其城市建筑文化中,儒学成份、礼仪法度、皇权统治、帝王意识

的价值体系,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并由此形成了北京古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首都城市的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历史上传统的古都城市文化在今天的现代意义,已成为象征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多民族文化并存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

1. 古都传统建筑中的无形文化与物质载体的融合性。以演奏艺术和传统工艺为主体的无形文化遗产,是通过人的世代传承方式得以保存和延续,在其展示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器具(乐器、道具等)只是展示这一无形文化遗产的工具,其价值多在表演者的操作水平。与此不同的是,古都城市的历史建筑所具有的无形文化内涵,是建筑本身所汇集的建筑理论、思想理念、认识观念、营造工艺的融合体,蕴含了古代思想、艺术、文化等全部内容。北京古都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往往蕴含了历史时期的社会礼制观念、统治思想、宗教内容等历史文化的多种意义,既是物质产物,也是精神文化的内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观念、经济、文化及科技水平的表现。

2. 古都传统建筑中无形文化的历史性。由封建帝王统治的古都历史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北京千百年的都城建筑与传统文化发展的成果,仍然以物质的承载方式长久地流传后世,其历代传统文化极富特色,异彩纷呈,皇家文化、都城文化和民俗文化共同构成特色鲜明的北京古都城市传统文化体系。当然,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名城传统文化的内涵已更加丰富和广泛,凡是古都城市历史上的各类城市建筑以及戏剧表演、民族工艺、文学史籍、市井民俗等等,都属于北京历史名城传统文化范畴,而其中的历史文物及建筑则是以物质的形式,真实地记录和承载了那个时代包括观念、信仰、意识及制造工艺、生产水平在内的无形文化内涵。

3. 古都传统建筑中无形文化的延续性。以表演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都

城市历史上传统的社会精神文化的直接反映;而古都城市的历史建筑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是北京历史名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产物。以物质形式保存的无形文化内涵,则是通过三种方式流传后世的:一是典籍传播方式,即历史上在文献典章中记载的古代都城建设理论、规划、理念和建筑设计以及指导城市规划设计的观念意识等等,都以典章制度的形式流传后世;二是技术传承方式,经千百年流传发展而形成的古都建筑工艺技法,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历代的能工巧匠在实践中的口传身授而流传至今的;三是型体特色的传播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古都城市创造的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标准的各类都市建筑,依照严格的营造规制所形成的“官式”、“民式”等不同的建筑形制和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古都特色,使得古都城市的整体建筑形制、风貌,历数百年而不衰。

传承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和保护物质性的各类文物与历史建筑,但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弘扬古都历史建筑中所蕴含的深厚而悠久的无形文化,否则,流传至今的文物及历史建筑将失去其生命力。只有永葆物质文化与无形文化的特色,才能使北京历史名城的传统文化恢复活力及影响,才能在今后的保护工作中,不断提升北京历史名城传统文化的质量。

三、无形文化遗产的发掘对历史名城保护的意义及作用

千百年的古都城市发展史,为我们保留了极其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深入研究和发掘北京名城历史建筑中的无形文化内涵,对当前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发展民族文化,提升名城历史文化价值,深化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的内涵,将进一步推动以历史传统建

筑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以深入发掘历史名城建筑中蕴藏的无形文化内容:

如在历代都城中始终位居全城中心的皇城、衙署等建筑群落,无论是规制布局还是建筑规划,都鲜明地体现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理念,正是在这一皇权理念的背景下,形成了代表中国传统建筑最高水平的宫廷建筑艺术。

分布于内城的各类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公主府、国公府及王公大臣的府邸宅第,则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上封建宗法礼制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建于古都城市内各个区域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等不同形制的宗教建筑长期共处,既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与建筑艺术的统一,又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最好见证,在古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古都城市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遍布全市的具有浓厚古代都市生活情趣的四合院建筑,汇集了历史传统建筑和市井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多种建筑形式,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蕴藏了极为丰富的古城历史及民间传统文化,折射出多彩的古代民间生活,具有独特的古都传统文化风格。

清末以来,先后出现在古都城市内的各种西方教堂建筑和中西结合式建筑,是古都城市在近现代时期中国传统建筑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过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所产生的一种具有近现代特色的建筑景观,真实地展现了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瓦解后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建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追求民主、追求发展、追求现代化的一种社会文化。

二是,拓展了北京历史名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域,从而使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向无形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领域延伸。这样,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物质的有形文化与非物质的无形文化的研究、保

护、展示工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开展:第一类是以具有老北京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昆剧、京剧、评剧、相声、民间曲艺、传统戏剧等著名的表演艺术,是通过人的世代传承,以人的演艺为直接的展示方式,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中不可缺少的无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类,是以传统手工技艺为特色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包括玉器制作、雕漆、景泰蓝、刺绣、剪纸、面人等多种民族手工艺及一大批各类传统老字号等,如北京市公布的两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荣宝斋、同仁堂、全聚德、瑞蚨祥、盛锡福、内联升、一得阁等在京城享有盛名的老字号,其各自形成的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都在其有形的物质成果中蕴涵着高深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因素,是北京历史名城中十分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第三类,是以物质为主体的历史建筑中所蕴藏的无形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将不断展示出历史建筑中的传统观念、信仰、意识、道德、制度、礼俗、艺术等多方面的历史人文价值,如在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名人故居、会馆戏楼等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中,应特别注意保持和恢复历史建筑中原有的无形文化内涵,并作为开放、展示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提出,是当前新形势下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新举措,也是历史名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发展的必然。随着工作的推进,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将逐步从名城的历史建筑向多种传统文化、从文物的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从有形的文物及建筑向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的研究与保护方向深化。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领域中,逐步形成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体现科学保护利用并揭示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的新型展示方式,从而不断实现和提升北京历史名城负载的民族优秀文化永恒的历史价值。

(文内图片摄影:赵德春)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为推进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李学军

在2006年9月发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公共文化服务”部分提出了“完善大中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加强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中心)建设”的指导性方针。博物馆作为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宣传教育与服务公众的双重责任。“十一五”期间我市将迎来奥运盛会的召开,特别是“人文奥运”理念的提出,将使博物馆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现状与不足

(一)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

1. 北京市博物馆总体概况

从总体分析,我市博物馆的数量及门类齐全程度居全国首位。从数量上看,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各类注册博物馆141座(目前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126座,因各种原因已撤销或暂未开放的15座),约占全国博物馆总量的6%左右。从隶属关系看,中央级单位所属博物馆44座,市级单位属博物馆44座,区县属博物馆31座,民办博物馆22座。博物馆的门类日趋多样化,由建国初期单纯的历史类逐步扩展为各种专题类、科技自然类、宗教民族类、风物民俗类、

区域地志类、建筑园林类、文化艺术类、革命纪念馆及遗址类、院校类等十余个类别,其中科技自然类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因此,从数量和门类上看,我市已初步具备了形成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

2. 新馆建设、老馆改扩建投入巨大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市在博物馆的改扩建、新馆建设及服务设施的改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优化增量、重点投入”的思想指导下,我市加大了对重点博物馆建设的投资力度。随着首都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等一批现代化、高水平的博物馆相继建成,行业、私人办馆日渐增多,使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在新馆建设方面,投资12.3亿元、展览面积达25990平方米的首都博物馆新馆于2005年正式开放,成为目前国内展览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博物馆;为迎接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投资近8.5亿元、展陈面积约9300平方米的中国电影博物馆也于2005年开放,成为目前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的电影专题博物馆。此外,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海淀区博物馆、宣南文化博物馆、百工博物馆等多家各具特色的博物馆也先后亮相京城。

在博物馆改扩建方面,中国地质博物馆新馆、北京天文馆新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已完成了扩建改陈工作。

3. 博物馆软、硬件服务设施不断改善

为营造良好的博物馆人文环境,北京市文物局针对各馆的停车场、售票处、双语标识、开放区域指示牌、座椅、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及展区的绿化美化等,开展了环境整治工作。同时,从更新改造博物馆服务设施、提高展陈手段的科技含量、完善观众服务项目与功能、完善服务设施的质量和功能等几个方面,面向全市文博系统提出了要求。目前,全市博物馆正在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本馆的馆容馆貌进行整治,改造或完善各种接待设施。

为加强人材培养,北京市文物局每年都针对全市文博行业举办不同层次的讲解员培训班、保管员培训班、新任馆长培训班等,借以提高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博物馆的软件环境。

4. 博物馆展览与藏品资源丰富

博物馆文化资源及其内涵极为丰富,展示内容各具特色。目前北京各博物馆共设有固定展陈近 220 项,每年举办的临展、巡展达 200 余项,年平均观众量约为 2900 万人次。展览策划及宣传运作水平逐步提高,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当代油画·素描大展》、《云帆万里照重洋——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展》,首都博物馆新馆《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 250 年藏品展》、《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周年成就展》,中华世纪坛的《中华的文明——世纪国宝展 II》、《意大利文艺复兴展》,中国科技馆的《中国载人航天科普展》,中国美术馆《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等展览项目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于近年来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市馆藏品的数量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至 2005 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市藏品总数约达 323.8 万余件(馆藏品中的钱币、邮票及图书资料部分未计算在内),其中故宫博物院

101.1885 万件,国家博物馆约 61 万件。由于我市行业博物馆、科技自然博物馆的迅猛发展,其在藏品鉴定及定级等方面还未出台统一的标准,因此珍贵文物的数量尚待进一步统计。

5. 博物馆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及广阔的发展空间。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公司集团及有实力的社会各界人士,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树立企业文化形象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建馆要求和建设规划。我市 2001 年实行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更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鼓励和提倡社会各界、公民个人兴办博物馆,优先发展填补本市门类空白的博物馆”。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允许非政府投资建立博物馆,极大调动了社会办馆的积极性,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二) 博物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 博物馆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

博物馆质量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是我市博物馆面临的首要问题。本市博物馆数量虽居全国前列,但由于其隶属关系复杂,软硬件设施及内部管理水平相差悬殊,致使现有博物馆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市的博物馆在内部管理机制、业务人员水平、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现代化展陈手段、文物保护设施条件、讲解服务接待及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2. 博物馆事业发展经费普遍不足

各博物馆在开展各项业务中,普遍面临着事业发展经费不足、专项资金缺乏的问题。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国家的极大投入,但由于目前财政投资还比较有限,且博物馆隶属关系的复杂性造成其资金来源和渠道相差悬殊。所以就本市而言,许多博物馆在基础设施建设,展览陈列制作、文物保护与征集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占博物馆群体大多数的历史类博物馆及部分

行业博物馆尤为明显。

3、博物馆的现行管理体制严重影响宏观管理部门工作职能的发挥

目前我市共有 141 座注册博物馆,与外省市 80%—90%的文博单位均隶属文物系统相比,北京市文物局属馆仅 17 座,其余大部分博物馆分别隶属于各中央在京部委、大专院校、公安部队、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集团及市园林、宗教、民政、科委等部门,以及社会公民个人。这些博物馆与我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没有隶属关系,其人员、机构、经费、收支等均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控制,北京市文物局无权在其人事任免、机构组成及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管理,无法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提出诸如环境整治、硬件设施改造、展览制作与改陈、门票优惠等方面的硬性要求,因此管理体制上的问题造成了行业主管部门属地管理工作的难度很大。

同时,由于“文物保护法”只提出了对文博工作的要求,缺乏相应的罚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业主管部门在实施行业管理方面得不到法律保证,管理力度不大,客观上造成了某些博物馆业务工作不够规范,长期存在着馆藏底数不清、文物藏品建帐建档工作不完善等问题。

4、文博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人材队伍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人类活动见证物和自然科学标本并向社会开放的公益性机构,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市各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技术人员在一些博物馆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影响了博物馆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效益的发挥。近年来,随着老一辈专家、学者逐渐退出工作岗位,全市很多博物馆的专业技术力量开始呈现出青黄不接的局面。

二、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定位与功能

1、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地位与作用

博物馆是人类永远的学校,是融传统文化和科技自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使命。它利用自身藏品资源的优势,在开展社会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素质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博物馆在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代城市中的博物馆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塑造并代表着城市的文化形象。它通过展现北京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与融合性,引导人们在行为意识、思想观念上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与升华,逐步提高全市公民的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平,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树立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博物馆与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众多的文物古迹、历史景点和博物馆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提升了城市的人文价值,是城市深厚文化内涵的缩影,必将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博物馆对于旅游业的拉动目前还难以用数据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影响和渗透,通过树立文化品牌、展示精神内涵实现城市文化对旅游市场的深远影响。同时,旅游业的繁荣会为博物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契机。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正在成为文化旅游市场的焦点和热点。博物馆行业应以此为契机,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开发休闲娱乐项目,必将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

博物馆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文化资源。作为公益事业的博物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领域产生着巨

大的影响。文化创意是通过创意的过程赋予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某种独特的“象征意义”，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新的文化要素，为消费者提供与众不同的全新体验，从而提高产品与服务的社会价值。

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植根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上的，而博物馆正是传承历史文化、展示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最好载体，因此必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可充分利用、发掘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资源及其文化内涵，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4、博物馆在社会公众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与服务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功能。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把它视为自己的“终身学校”、“生动的百科全书”。北京拥有十分丰富的文物古迹、历史名胜，这些都是对广大社会公众进行文化教育的丰富资源。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及活动，以生动、直观的形式进行思想品质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5、注重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

多年来，公众一直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场所，而忽视了其应有的休闲娱乐功能。伴随时代的发展，休闲娱乐已经成为当今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在发达国家，包括旅游在内的休闲产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公众观念的不断更新，观众群体已经不再把接受教育作为参观博物馆的主要目的，而更加注重博物馆在调节心情、放松精神、增添生活情趣等休闲娱乐方面的功能。公众通过参观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可以亲身体验到文明、健康、科学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氛围，并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得以提高，对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及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是有益的。因此，加强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与设施建设已成为博

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博物馆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1、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和“三贴近”原则，充分发挥博物馆宣传、教育功能，发挥博物馆在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展示古都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坚持“整合资源、挖掘潜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指导下，初步实现我市博物馆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实现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参与性的有机结合，满足广大群众对高品位精神文化的需求。

2、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博物馆保管、研究、展示和服务水平，改善博物馆基础设施条件，使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整体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初步建立起与首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城市性质相匹配的、具有首都特色和优势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研究制定社会投资主体兴办博物馆的引导政策、管理机制和规范制度。在保持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适度增长的同时，力争实现博物馆在门类、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实施博物馆的分级管理，重点扶植地方特色、时代特征鲜明的专题博物馆，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及可以弥补我市博物馆门类中缺项的博物馆项目。提高博物馆的科技含量和展陈水平，重点推广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和研究方面的应用，从软硬件服务设施、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博物馆的质量。积极围绕“人文奥运”理念筹备北京奥运会文化项目。同时，鼓励和提倡各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办馆，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益事业发展机制。

四、展望“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

1、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日趋完善

(1)新馆建设及老馆的改扩建工程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进一步完善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网络体系建设,重点提升现有博物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力争实现每个区县都拥有一座以上博物馆的目标。

未来几年,北京地区仍将有部分大型博物馆投入建设,如公安部的中国警察博物馆、北京市文化局的北京美术馆、中国妇女联合会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民航总局的中国民航博物馆等。

在旧有博物馆的改扩建方面,国家博物馆的扩建工程已通过国家立项,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改扩建现已开工,中国科技馆三期和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将在规划中的奥运公园内建设。

(2)加大博物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馆容馆貌整治力度

在北京奥运会前,我市文博系统将以《关于加快旅游景区环境、设施和服务建设工作的通知》内容为指导,更新改造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完善观众服务项目与功能。按照《通知》要求,我市博物馆应分期分批设置《参观指南(或简介)》、语音导览机和各类中英文双语标识牌,规范停车场、售票房、餐饮部、商亭、厕所、指示说明牌等,分批完成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改造,添置轮椅等公用设备。《通知》同时规定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标准和要求,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

(3)深入开展人员培训工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针对开放单位的特点,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宣传。通过加大对全市博物馆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能力和外语接待能力,提高博物馆管理水平。

通过迎奥运相关筹备工作,我市文博系统将配合市相关部门开展首都窗口行业的奥运培训工作,积极参与制定相关规范、教材,组织全市博物馆进行有针对性的奥运培训,内容包括奥运基础知识、服务规范、礼节礼貌、奥运英语和残疾人手语基础等。

(4)开发特色鲜明的博物馆旅游纪念品

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物资源、文化内涵及其研究成果,开发与博物馆主业相关的图书音像制品、旅游纪念品及博物馆网络文化资源,以期形成具有博物馆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力争开发并推出多种特色鲜明的博物馆旅游纪念品并进入销售市场,力争形成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图书音像资料出版和旅游纪念品开发为特色的博物馆文化产品体系。

2、博物馆展览陈列丰富精彩

(1)筹备人文奥运“双两百”展览项目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为提高博物馆的展陈水平,更好地展示首都北京的文化特色,从现在起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市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设施条件,以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大型文物精品展为主干,以各馆现有展览及计划展览项目为依托,以引进国内外精品展览为补充,通过整合资源、引进外展等途径,采取“自主筹办、联合举办、引进外展、整体宣传”的模式,筹备并实施博物馆“双两百”展览计划,即策划并推出高质量的固定陈列200项,临时展览及特色活动200项。为实现这一目标,市行业管理部门将全程参与重点展览的选题、策划和实施,并从中选择优秀展览项目提供适当的经费支持和整体宣传。

(2)推动博物馆科普动手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注重发挥社会科学类博物馆(以历史知识、社会知识为主要展示内容)在普及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知识中发掘可用的科普

资源。有条件的博物馆应在馆内开辟科普活动场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设计推出适合青少年观众参与的互动项目,配合教学及社会热点定期举办科普知识讲座。

同时,继续推动和支持局属博物馆“科普互动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并将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在全市推广。定期举办面向全市的科普培训班,以交流经验、开拓思路。力争达到多数博物馆都能拥有一至两项深受青少年观众喜爱的科普互动项目,从而为我市的科普教育工作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活动空间。

(3) 在展览中进一步应用现代化的展示、服务手段

博物馆的展陈是人类历史文明与现代高科技产业相结合的产物。为全面提升博物馆的展陈水平,我市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增强博物馆展览的科技含量,在展陈中使用电脑触摸屏、语音导览系统、三维立体数码影像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推广多媒体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在博物馆展示方面的应用,以增强博物馆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形成完美和谐的统一。

3. 馆藏品管理趋向规范化

在“十一五”期间将基本完成市属及区县属博物馆馆藏品的清点、建帐工作,启动中央在京博物馆的藏品清库工作。完成市属及区县博物馆《馆藏品目录》及珍贵文物纸制《藏品档案》的备案工作。以国家级行业博物馆为龙头,开展本行业近现代藏品定级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文博系统外行业博物馆的文物鉴定定级工作。

在馆藏文物的修复、保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文物保护修复机构在人材、技术、设施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形成以中国文物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为中心的两级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心。同时,加快藏品信息的数字化管理,为建立“全市博物馆藏品数字化信息资料管理中心”奠定基础。

4. 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1) 提供优质的讲解接待服务

讲解接待服务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在大力加强博物馆讲解员队伍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各馆的讲解接待水平,力争达到每座博物馆均有两名以上的专职讲解员,初步形成稳定的博物馆讲解员队伍,能够针对儿童、青少年、成人等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讲解服务。

(2) 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免费开放力度

在现有优惠服务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免费或优惠开放的力度,加大对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学生等特殊社会群体的优惠幅度。同时,与市财政等相关部门充分沟通,选择部分外系统博物馆,试行市民免票参观博物馆、由市财政予以门票补贴的方式,并分期分批地予以推进,以使博物馆真正实现其公益性的社会职能,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根本宗旨。

(3) 发展壮大博物馆志愿者队伍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在现有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博物馆志愿者的整体素质,吸引更多高素质、高学历、高层次的社会人士加入其中,逐步拓展博物馆志愿者的服务领域和工作内容,充分发挥志愿者在沟通博物馆与社会、拓展博物馆社教功能、促进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与支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 社会宣传工作

坚持每年举办“5·18 国际博物馆日”及“世界遗产日”纪念活动,并力争在活动内容 and 宣传形式上有新的突破。继续发行《北京地区博物馆通用年票》及举办“我爱北京、我爱博物馆”系列活动,积极与各大新闻媒体合作,开办介绍博物馆、文物历史知识等内容的“文博专版”。汇编并发布“北京地区博物馆展览展讯”,定期介绍博物馆展览、讲座等各项文化活动。

配合人文奥运筹备出版《北京地区博物馆导览手册(2008年版)》,向国内外游客介绍全市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固定陈列

以及临时展览的内容及档期。制作并推出中、英、阿拉伯文的《北京博物馆 2008 年奥运会期间展览地图》，标明博物馆的位置、特点、规模，介绍展陈内容。制作博物馆宣传折页在机场、奥运村等地散发。

5、文博科研工作将深入推进

在“十一五”期间，我市将重点加大对文物保护类科研项目的投入，充分发挥我市的人材优势，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开展文物科学保护技术研究，特别是针对石质文物、纸质文物、丝织品等质地文物的保护，完善本市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建设。积极支持部分博物馆承担并完成一批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

加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理论研究，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积极开展国内外博物馆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博物馆学术理论及管理水平。在深入了解国外博物馆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一批代表国外博物馆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专著，使学术研究成果得以推广。

6、博物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前景广阔

博物馆所蕴藏的丰富文物资源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网络平台的方式予以充分展示和利用，借助信息产业的发展建立数字虚拟博物馆、网络共享博物馆物质文化资源、联合举办网上虚拟展览及其相关的拓展服务。

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引入博物馆藏品管理、展览文化传播、社会教育宣传等工作中，已成为我市文博单位的重点工作项目。通过开展相关工作的开展，力争达到博物馆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信息网络发布平台，部分博物馆建有自己的网站或主页，并能通过网络传播信息、沟通情况，初步实现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积极开展博物馆信息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初步建立“北京地区博物馆资料库”、“博物馆藏品信息数据库”和资源信息共享机制。

7、文博行业宏观管理将进一步规范化

(1) 博物馆重新登记审核与博物馆分级管理

初步建立北京市博物馆的分级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配合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文化部《博物馆管理办法》，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对我市的博物馆进行重新审核登记，注销不符合条件的博物馆。在此基础上开展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分级管理研究及试行工作，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博物馆分级标准，并利用这一标准试行博物馆的分级管理工作。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级别的博物馆在建馆、税收、经费等方面可享受的优惠扶植政策，供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参考，为国家适时制定并颁行针对博物馆发展的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2) 设立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经费

力争建立“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我市相关政府部门可参照我市 3.3 亿文物保护经费的办法，打破隶属关系的束缚，设立“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新馆建设及老馆扩建改陈、提高展览水平、改善基础服务设施、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开发特色纪念品、研究和建立文化创意产业、为免费开放提供经济补偿、筹备人文奥运展览项目、改善馆藏保管条件、开展文物藏品的保护与修复及博物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由此可以吸引博物馆主办者投入相应的配套资金，以提高博物馆的整体水平。

(3) 建立高素质的文博专业技术队伍

“十一五”时期，围绕北京市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全市博物馆将以接收重点院校本科以上毕业生为主要渠道，以引进高级管理人材和高级专业技术人材为重点，实现全市文物、博物馆事业管理人材和专业人材总量增加、整体素质提高的总体目标。同时，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年轻化也是工作的目标之一。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研究员)

关于开展北京工业遗址调查的缘起和思考

王春城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接受了北京火柴厂捐赠的档案资料。北京火柴厂的前身是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创设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民国七年(1918年)与宣统元年(1909年)开办的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经营，成立丹华火柴公司。1950年由北京市政府接管，1955年与厚生火柴厂合并，转为地方国营，改名为北京市火柴厂。随着社会的发展，到2002年火柴厂的民用火柴已基本停产。这个百年老厂顺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转制过程中注重档案的管理和保存，值得称道。

接受捐赠后，我们集中力量，经过两个月的清点、梳理，得知这批资料起止时间是从1949年到1980年，共有1100余册，近14000件，数量繁多。其中文档1122册(卷)，包含文件13904件，火花册40册，火柴实物430条，其它实物60余件。无疑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承载着北京地区近现代火柴工业发展过程的第一手资料。

首博征集近代工业实物资料已经历了很多年头了。目前收藏的藏品中有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煤矿、清河毛纺厂、二七机车车辆厂、诺基亚公司等单位产品和相关实物资料。在近6年来的征集过程中，首都博物馆对北京工业文物和工业遗址相关档案资料的征集，也只有不到百件的收获，成果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批量收藏有关北京工业档案资料，首博还是首次。为进一步完善这批资料，我们想补充一些北京火柴厂厂址的资料照片时，发现工厂的原址早已经面目全非——我们失去了记录北京火柴厂历史发展过程的机会。

由此，我们感悟到首都博物馆需要急切地探寻北京工业的发展过程，追踪北京工业遗迹的变化，收藏北京工业的实物资料。忠实记录北京近代工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不只是为丰富首博馆藏，更重要的是，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后代积累历史的财富。我们感到在北京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首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应该对北京地区的工业状况进行梳理，征集适合博物馆收藏的实物资料。遗憾的是我们感悟的太晚了。行动！立即将思维转化成行动——2006年6月首博征集部开始对北京工业产业的变化和相关工业遗址的重点企业展开调研。2006年7月，我们跟踪采访并见证了北京焦化厂停产的全过程，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10月我们携手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制作了《京西门头沟煤矿》专题片，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2006年底和2007年初，我们在总结半年对北京工业状况调研工作时体会到，北京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阶

段,在封建社会时期它一直是一座消费型城市。北京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清政府在京西三家店创办了为军械服务的神机营北京机器局,1897年后为京汉等铁路的通行,又建立了长辛店机厂、长辛店电器修缮厂等。到民国初期,北京的工业只有一些小型的玻璃厂、火柴厂,大工业、重工业基本无从谈起。

从建国初期的1956年提出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以来,北京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布局: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63.7%,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北京因此成为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经过近2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现有城市产业部门分布来看,曾居城市首位的制造业正逐步从城市的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转移,取而代之的是与北京历史、文化和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教育、行政等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中心城区,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了80%。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首都北京的发展规划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着。变化是为了走得更远,发展是为了明天更美好。但是,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北京的发展有数百家老工业企业和几代劳动者所做出的巨大奉献。那些工厂历史的旧迹必将成为这座城市永恒的记忆,而劳动者的奉献和努力业已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不仅感受时代的发展,还要承担起记录历史转换、发展的重任,积极地收集、调查即将消失的工业文物。

我们重视工业遗产,因为它是工业文明的一个体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技术水平和价值观。因此,我们要像对待文物那样对待工业遗产。我们以前很重视农业社会时期留下的遗产,譬如古

城保护、古村落保护等,但是对待工业遗产不够重视。很多珍贵的工业遗产被拆掉,沈阳、哈尔滨、上海、北京等中国重要的工业遗产在消失。北京的工业史也就不到百年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时代留下的遗物和痕迹不能算是文物、遗迹,于是采取了退出第二产业,引进第三产业的策略。在城市功能转换过程中,北京工业发展的历史很容易被人忘掉。因此,社会的发展已给北京工业遗迹的保护、利用、需求关系、价值体系、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依据有关信息报道:截至2006年8月底的统计,《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签约国共有182个,其中有23个签约国拥有43项世界工业遗产。中国共有33项世界遗产,而其中只有一项是工业遗产——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从拥有工业遗产项目数与该国总遗产项目数的百分比看,中国排名第20位。

目前,中国已有11处工业遗产成为“国保”单位。2001年,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和青海省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成为首批进入“国保”单位名录的工业遗产。去年又有9处近现代工业遗产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它们分别是: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南通大生纱厂、中东铁路建筑群、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石龙坝水电站、个旧鸡街火车站、钱塘江大桥、黄崖洞兵工厂旧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导弹卫星发射场遗址。

北京的工业辉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永恒记忆,落寞的工业遗迹能否再度熠熠生辉,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发展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目前北京关于工业遗迹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工业遗产在北京的保护存在的问题有:

一是重视不够,工业遗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比例较低,无法可依的尴尬让我们失去了很多。2007年3月到4月,首都博物馆征集部工业遗址调查组到位于广安门外手帕口南街的北京双合盛五星啤

酒厂厂址进行了调查,当时已经拆迁的老厂址内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建于1915年的麦芽楼,楼的平面为正方形,灰色砖墙,细长形的拱形小窗,顶部有砖垒的花牙和四角圆柱,顶部为覆斗烟囱,其上大字写着“双合盛啤酒厂”,它的门楣上嵌着五星商标的标志,半圆形的门楣和窗额,都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建筑特征。这是北京唯一的啤酒酿造业旧民族工业遗迹,由于这座建筑没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在2007年5月1日前夜被拆毁了。

二是家底不清,对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和保存状况心中无数、界定不明,对工业遗产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保护理念和经验严重匮乏。798厂创意产业的成功模式不断地被翻版,新的思路有待开发。

三是认识不足,认为近代工业污染严重、技术落后,应退出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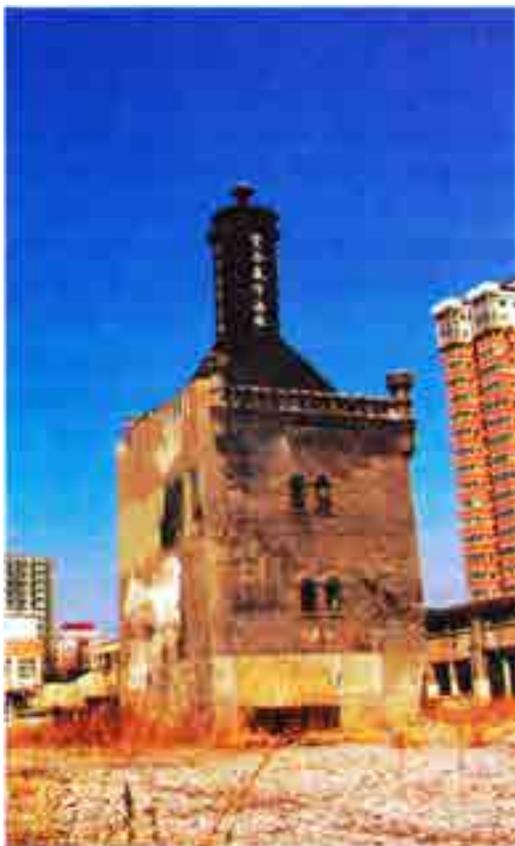
四是措施不力,“详远而略近”的观念使不少工业遗产首当其冲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为此,要提高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必须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工作,而后再搞认定、评估、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直至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当然,开展工业遗址普查活动,仅凭我们的力量,甚感势单力薄。特别是现在开展调研、征集、记录工业文物和遗迹的变迁,可谓是困难重重。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可能会形成一种舆论关注的态势。特别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京西门头沟煤矿》专题片,引起北京各大媒体的关注。为此,我们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竞报、信报、晨报等近十家强势媒体于2007年1月22日向社会发布了共同开展北京工业遗址调研活动的消息。我们共同设计调研计划,制定调研对象……。在同一天,各报共同报道了“随着北京焦化厂、首钢公司等一批老工厂逐步搬迁,老北京的工业符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昨天,首都博物馆面向社会启动工业文物征集活动,同时与本报等多家媒体合作,

寻找并留住正在消失的北京工业遗迹……

这项昨天启动的留住北京工业遗迹活动是全国首次专门针对工业遗迹的专题调研。内容包括:探寻北京工业的发展过程,追踪北京工业遗迹的变化,收藏北京工业的实物资料。主办方将特别关注京城百年以上的老字号工业企业以及1950年到1979年建立的支柱性工业产业,如能源、纺织、无线电、机械、化工、钢铁等工业项目。为此,主办方将组成不同的工作小组进行实地考察和走访,与有关企业的负责人实地商定可征集的实物,如生产资料、产品等;图纸,如工厂在北京的位置图、厂区图、厂房建筑图、生产工艺流程图、机构设置图(表)等;相关照片、音像资料等。”^①首博开展留住北京工业遗迹活动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双合盛五星啤酒厂的麦芽楼

在2007年初北京人大会议期间,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韩永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北京的工业遗迹保护与活化的提案》。该提案“建议制定北京工业遗址普查管理办法;建立北京工业遗址认证评估体系;制定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方案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出台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和利用工业遗址开发创意产业、商业、展示等项目。”得到众多的代表赞同和联署签名。

从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期间,我们走访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化工集团、门头沟矿业集团、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焦化厂、首都钢铁厂等一批企业,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资料,收集了部分实物资料。这些资料有清河制呢厂厂房即将结束其使命之前,首都博物馆接受了清河制呢厂捐赠的1930年比利时亨利·保律斯(HENRI PAULUS)机械厂生产的纺织搓呢机,还有北京化工集团、北京第一机床厂、门头沟矿业集团的一些档案资料。

2007年6月我们回访了成府路附近胡同内的清华园火车站,我们看到火车站的现状与前几年没什么改变,多的只是几条晾衣服的绳索。6月28日北京晚报记者发表了《百年清华园站状况堪忧》的文章。

我们调查小组踏查了永定河上游的七座桥,其中有英国工程师设计的1896年永定河上第一架铁路桥,在钢架上拍摄了Dalzell英文商标;也有詹天佑1906年勘查设计的铁路桥。为了了解北京近百年中国铁道桥建设使用现状,我们同时深入到北京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一定的成果。2007年7月2日北京晚报记者发表了《永定河上的桥梁博物馆》的文章,目的是期望有关方面关注这些珍贵的遗产。

工业遗产的调查保护课题,代表了首都博物馆发展理念的新趋势。博物馆不等于文物收藏,收藏只是博物馆的功能之一。

博物馆是向大众传播我们的文化,传播知识科学,不是文物库房,无所谓远近的价值差异。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当下能做些什么,这很重要。保护工业也代表了首博对城市本身发展的关注,城市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我们考虑的是城市发展史,关注的是城市本身,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行为习俗、功能建设等各个方面。

北京工业遗产关联着城市自身的历史。一个城市应该对自己的企业有一份独到的感情。工人日报2007年1月31日报道首博面向社会征集工业文物、寻访工业遗存时发表题为《保护工业遗产 保护工人阶级历史》的社评文章。文章说:“工业遗产还承载着工人阶级诞生、发展的历史。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工业的出现而诞生的,又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从保护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历史的角度出发,工会组织也应该介入工业遗产保护”。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不是虚拟的,它是有着实质性的,它综合地代表了一种民族的精神。如果我们通过工业遗址的调查,并以此带动一些文化活动,激励着一批新型产业的诞生和城市功能发展的延伸,我想对于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应该有益无害。

遗产,顾名思义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遗产是民族文明的载体,保护遗产就是传承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的过程。如今,我们重视保护遗产的力度应该说是空前的。为了民族精神的延续,为了给后人储蓄财富,为了博物馆的明天,我们必须承担记录今天历史转换、发展的责任,积极地收集即将消失的时代符号。

①参见2007年1月23日《北京娱乐信报》。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副研究员)

北京市延庆县四海镇火焰山营盘遗址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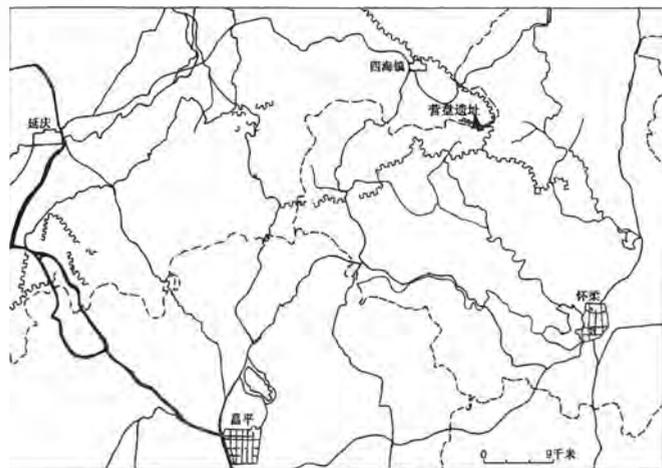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化委员会

火焰山营盘遗址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四海镇石窑村东南3公里的火焰山上(图一)。营盘遗址东西分别与外长城相连,北望黑坨山,东接九眼楼,南北为陡坡,西为断崖,面积约4400平方米(彩二:1)。地理坐标为北纬 $40^{\circ}28'52''$ 、东经 $116^{\circ}29'52''$ 。海拔高度1058-1085米。

2006年3-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延庆县文化委员会对火焰山营盘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共布10米 \times 10米的探方13个,个别探方根据需要进行了扩方,揭露了大面积相连的建筑基址(彩二:2)。此外,为了进一步明确遗址内建筑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清理了庙台和北敌楼,实际发掘清理面积共计1600余平方米^①。

一、地层堆积

营盘遗址范围内的遗迹普遍位于表层



图一 火焰山营盘遗址位置示意图

土下或裸露于外,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只有一层。这一层土色灰黑,土质松软,主要由腐殖质构成,厚0-0.45米,出土遗物以砖块、建筑构件、兵器、瓷片为主。这一层还出土有近现代遗物,表明遗址废弃至今一直有人类在遗址内活动。

二、遗迹

营盘遗址遗迹主要有城墙、城门、房屋基址、北敌楼和庙台五部分,北敌楼和庙台分别位于北城墙和南城墙外侧。

(一) 城门

城门一处,位于T0207和T0307,门向 303° 。现存城门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城门前的台阶和平台,城门洞,城门内甬道。

城门前平台近方形,长3.3米,宽3米,残高1.5米,周边用加工过的石条和石块平铺而成,中间填充碎石块和黄土,台面用石块平铺而成。平台西侧设有马道,马道为台阶式,清理出台阶3级。平台台面低于门洞地面,故设有2级台阶与门洞基石相连,门洞基石同门洞地面一致。由平台登3级台阶步入城门。城门前台阶每层高0.15米,长1.25米,宽0.40米。马道台阶由石块干垒,每层高0.18米,残长1.3米,宽0.42米。

城门前门洞前、后端之间界线明显,门洞前端用加工过的大石条做基础,且高出门洞地面两层,由此可见,门洞的前端是为了加固

后端所建,由此推断该城门有建筑时间早晚之差别,故分为早、晚两期。

1. 早期城门

由城门和城门前甬道两部分组成。城门略窄于城门前甬道,整体平面呈“凸”字形。

城门位于甬道的前端,平面呈长方形,长 1.40 米、宽 1.55 米,自下而上的修筑方法是:用长短不一的条石垒砌基础;基础之上两侧翼墙用青砖错缝平砌;券顶部分残缺,残留部分用三层青砖券制成拱形,而且每层拱券之间平砌一层,即三伏三券。券顶至地面的水平高度为 2.20 米。整个缝隙之间用糯米浆泥铺垫,外用白灰勾缝。

甬道位于城门的东端,平面呈长方形,长 4.50 米,宽 2.05 米。其修筑方法同城门结构。顶部已坍塌,残高 1.80 米。从残存迹象可看出该甬道顶应高于城门券顶。

2. 晚期城门

晚期城门其建筑方式与早期城门相同,拱券顶部已坍塌,其残存高度 1.25~2.00 米,进深 1.55 米,宽度与早期城门宽度相同。从坍塌断面看出晚期城门与早期城门互不衔接,由此可推断它的作用是为了加固早期城门免遭破坏而修筑。

(二) 城墙

营盘遗址城墙周垣轮廓较为清楚,共分五段,大体呈不规则五边形,周长约 263.6 米,其中东城墙长约 22.4 米,南城墙长约 88 米,西南城墙长约 45 米,西城墙长约 64.8 米,北城墙长约 43.4 米。除城门为砖砌外,城墙部分皆为石块干垒修筑,部分城墙发现以石条为基础。城墙均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城垣残存高度 1.5~6.5 米。城墙上窄下宽,断面呈梯形,顶宽 1~2.5 米,基宽 3~6 米。

整个遗址内发现马道三处,均为台阶式,皆用石块干垒而成。第一处马道位于城门前北侧,残留共 8 级,由此马道可登上西城墙;第二处马道位于南城墙上,残留 12 级,由此可登上南城墙上;第三处马道位于南城墙上,每一级均由石条垒成,共 37 级,由此可登上西南城墙和庙台。

(三) 房屋遗迹

营盘城内正对城门有一条道路将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此次发掘主要清理了营盘遗址的北部大部分和南部的一小部分,清理部分约占城内面积的 65%。除庙台发现房屋基址 2 座外,城内北部发现房屋基址 12 座,编号 F1~F12,南部发现房屋 2 座,编号为 F13、F14。现将 F1、F12、F13、F14 详述如下:

1、一号房基(F1)位于营盘城内的北部偏中,坐北朝南,方向 218°,由前月台、正房及北踏道三部分组成,仅存基础部分。

月台位于房址的南端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5.80 米,东西宽 4.75 米,四壁均用不规则形石块垒砌,残高 0.12~0.26 米。

正房位于月台北端,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0.5 米,南北宽 6.65 米,四壁基础均用石块叠压垒砌包边,内用规格为 0.30 米×0.30 米×0.05 米的青砖叠压错缝封砌。四壁墙体均宽 0.30 米,残高 0.30~0.45 米。在房址的中部北端发现相互对称的柱础及柱坑五个,依次编号为柱 1~5,由此推断该房址内的南端也应有相互对称的柱础。据此柱网分布可知该房址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无廊式建筑,即正厅和东西套间。正厅前后有门并相互对称,而且正厅北门发现有门槛朽痕。西配间北部设有火炕,已被破坏,东西长 3 米、南北宽 1.1 米、残高 0.21 米。室内地面用规格为 0.36 米×0.17 米×0.09 米长方形和 0.30 米×0.30 米×0.08 米的方形青砖十字错缝地。

踏道位于正房的北端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用青砖叠压砌制,内用不规则形石块填砌。东西长 1.6 米、南北宽 1 米、残高 0.18 米(图二)。

2、十二号房基(F12)位于营盘城内北部偏西,北距 F11 约 3.5 米,南邻 F4。该房址坐北朝南,方向 220°。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9 米、南北宽 4 米,其建筑规格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仅存墙基部分,四壁墙基均用不规则形石块叠压垒砌,基础宽 0.45~0.80 米、残高 0.32~0.40 米(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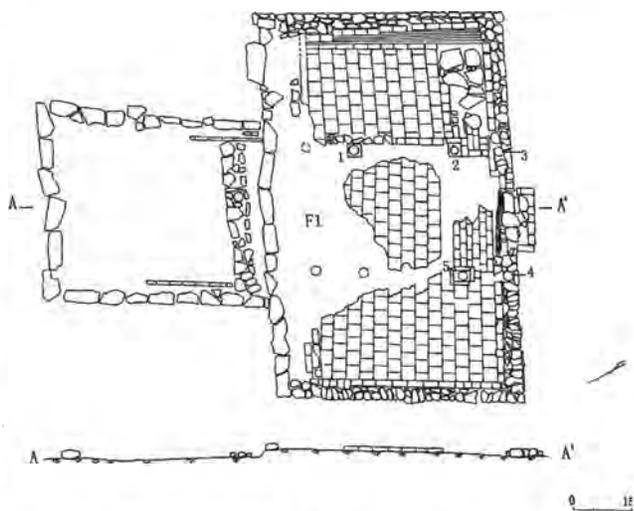
3、十三号房基(F13)与十四号房基(F14)并列位于营盘城内南部偏北的东端,坐北朝南,方向223°。仅存基础部分,且南北相连,墙基均用不规则形石块叠压垒砌。墙基宽度不一,宽0.50~2米、残高0.15~0.75米。两座房址均把门设置在东南角,各宽为1米。同时在室内西南角皆设置火炕。F13内炕床为方形,边长为1.65米,残高0.65;F14内炕床为长方形,南北宽1.75米,东西长3米,残高0.40米。两炕床皆用不规则形石块砌制(图四)。

(四)北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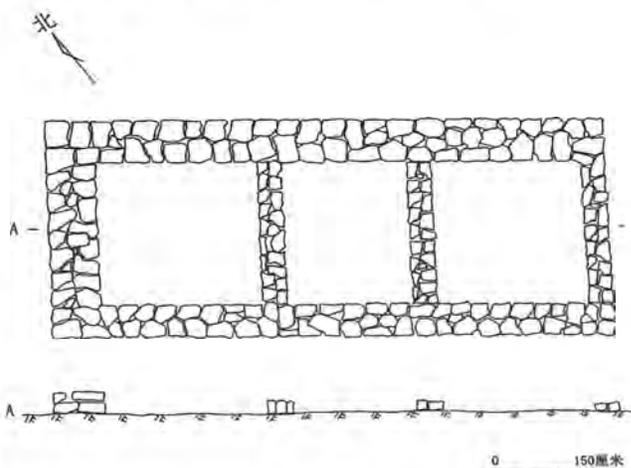
北敌楼位于北城墙外侧,其西北部塌毁,顶部东边残长9.7米,南边长9.55米,西边残长2.75米,残高6.3米,其四周为条石错缝砌制,内用石块加白石灰填充;其上发现有残存墙基和火炕遗迹,出土遗物有铁弹丸、铁蒺藜等。因北敌楼与北城墙之间堆积大量石块及碎砖,故未清理至底,该敌楼应依吊桥与北城墙相互连接且能起通行与御敌的两大作用。

(五)庙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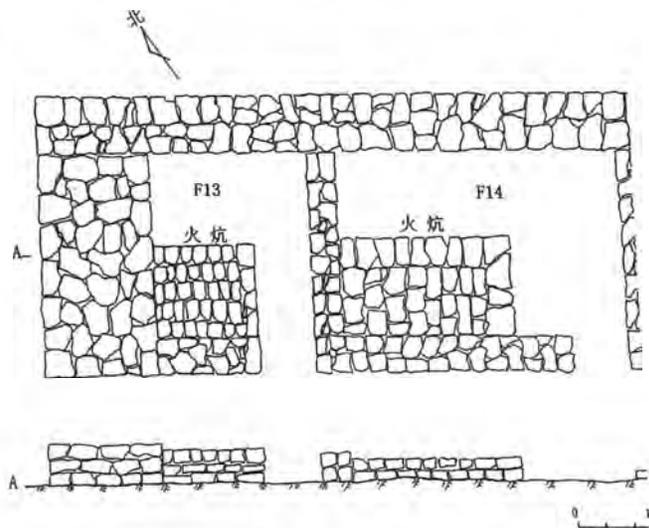
庙台位于西南城墙外,东、南、西三面为断崖(图五),其台面之上建有F15和F16。F16距城墙3.5米,此建筑坐北朝南,方向215°。该建筑西墙基础已被破坏,其他三面保存较好,前有廊道。整个建筑共发现柱础5处,即室内1处,门两侧各1处,前廊2处,东西三排每2处一排相互对称。础石为下方上圆,边长在0.45~0.55米之间,鼓径在0.25~0.30米之间。前廊长7.00米,宽1.20米,廊外有0.80米的散水;东墙残长5.80米,宽0.55米,残高0.24~0.56米;后墙残长4.95米,宽0.75米,残高0.28~0.56米。砖长0.40米、宽0.18米、厚0.07米。F16用石块做基础,青砖砌制墙体,墙体的筑造方法为里外单砖错缝平铺包砌,中间填充青砖碎块,每层砖之间用白灰粘连。基础内外各有6厘米的收分。前廊和室内地面均用青砖错缝漫地,只残存少部分。根据柱网的分布情况,F16为前出廊的方形建筑。推测F16应为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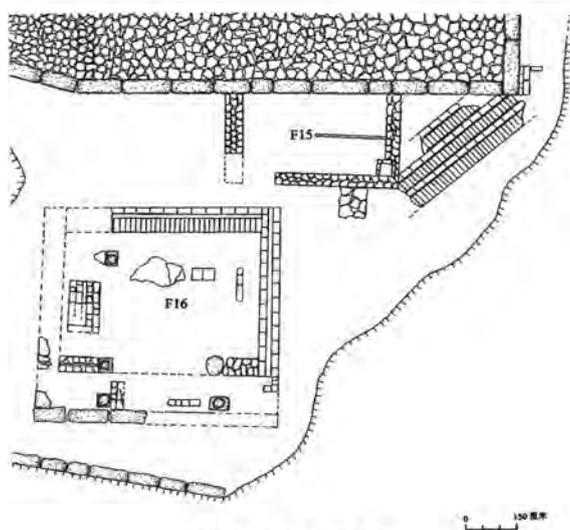
图二 F1平、剖面图(1,2.柱础 3,4,5.柱础坑)



图三 F12平、剖面图



图四 F13、F14平、剖面图



图五 庙台平面图

另外, F16 和城墙之间清理出房屋基础一处, 编号 F15, 此房坐北朝南, 方向是 216°。F15 依城墙而建, 以城墙作其后墙, 东西长 4.20 米, 南北宽 2.50 米, 该房基础及墙体均用石块垒砌, 墙宽 0.40~0.60 米, 残高 0.25~0.50 米, 房门宽 0.95 米。房内东南角设有火炕, 已被破坏, 只残存底部, 此房址应为庙宇的附属建筑物(彩二:3)。

三、出土遗物

营盘遗址出土器物以兵器和建筑构件为主, 生活用品也有发现, 另在城门外采集到一块石匾。

(一) 石匾

标本采集:1, 已残为五块, 拼接后长 87、宽 50、厚 21 厘米(彩二:4)。石匾正中阳刻楷书“威严”二字, 笔法遒劲刚健、大气磅礴。其两侧阴刻楷书两竖行, 右侧为“钦差怀隆兵备按察使胡立”十一字, 左侧为“万历年次戊午□秋吉旦”十字, 一字缺。四周饰以阳刻牡丹缠枝纹。万历戊午年为万历四十六年, 即公元 1618 年。

(二) 兵器

主要有石弹丸、铁弹丸、手雷和火銃等, 以质料可分为铁质兵器和石质兵器。

1. 铁质兵器

手雷 共 22 件。生铁铸造, 表面锈蚀, 一端作球形, 有短柄, 其口沿有引信孔。依据柄的长短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柄较短。标本 T0204①:1, 口径 1.5、柄端长 1.5、壳厚 1~1.1、腹径 9、通高 9.5 厘米, 引信孔长 0.8、宽 0.6 厘米, 重 1.05 公斤(图六:3); 标本 T0207①:2, 口径 2.2、柄端长 1.5、壳厚 0.6~0.9、腹径 7.5、通高 9.2 厘米, 引信孔长 0.8、宽 0.5 厘米, 重 1 公斤(图六:2); 标本 T0307①:6, 口径 2.4、柄端长 1.6、壳厚 0.6~1、腹径 9、通高 10 厘米, 引信孔长 0.8、宽 0.5 厘米, 重 1.15 公斤(图六:1)。

B 型 柄较长。标本 T0406①:2, 口径 2.2、柄端长 2.5、壳厚 0.6~0.8、腹径 7.2、通高 10.5 厘米, 引信孔长 0.8、宽 0.8 厘米, 重 1.12 公斤(图六:4)。

铁蒺藜 共 75 件。生铁铸造, 表面腐蚀, 有四根伸出的铁刺, 铁刺相连接处有孔(彩三:1)。标本 T0307①:1, 每个铁刺长 4.3 厘米, 重 0.15 公斤。

铁弹丸 共 236 只。生铁铸造, 表面锈蚀, 球形。根据大小可分为三档(彩三:2)。大铁弹丸 32 个, 标本 T0307①:8, 直径 6.5 厘米, 重 1.3 公斤; 较大的铁弹丸 49 个, 标本 T0207①:10, 直径 4.6 厘米, 重 0.23 公斤(图六:5); 小铁弹丸 155 个, 标本 T0207①:1, 直径 1.7 厘米, 重 0.07 公斤(图六:6)。

三眼铁銃 共 2 件。生铁铸造, 表面锈蚀, 由三支单銃绕柄平行箍合而成, 成品字形, 各有突起外缘, 共用一个尾部。标本 T0306①:3, 銃身有三道箍, 箍宽 1.2 厘米, 单銃外径 4、内径 2.2 厘米。药门为一圆孔, 孔径 3.5 厘米。柄端扁平, 弯曲, 上残留一圈铁环, 一铁钉从铁环和柄端穿过, 铁钉两端有垫片。柄端长 20 厘米, 通常 47.5 厘米。

2. 石质兵器

石弹丸 共 156 只。质料为灰白石, 球形, 表面光滑。根据大小可分为两档。大石弹丸 38 个, 标本 T0307①:4, 直径 7 厘米,

重 0.5 公斤(图六:7);小石弹丸 118 个,标本标本 T0207①:6,直径 4.5 厘米,重 0.35 公斤(图六:8)。

(三)建筑构件

除各种规格的砖外,出土数量较多的是板瓦、筒瓦、瓦当及脊饰等建筑构件。

板瓦 泥质灰陶,长方形弧状,表面多为素面,背面饰布纹。标本 T0609①:3,残长 15.6、宽 10.5、厚 0.7 厘米。

筒瓦 泥质灰陶,前部瓦唇圆钝,套接部位较长,表面多为素面,背面饰布纹。标本 T0609①:5,长 27、宽 12、厚 0.7 厘米。

瓦当 均呈圆形,泥质灰陶。纹饰均为兽面纹。标本 T0609①:2,残,兽面纹瓦当,当面居中饰凸起兽面,外饰一周凸棱,边缘较宽,饰凸起连珠纹。直径 9 厘米,边缘宽 1.1 厘米(彩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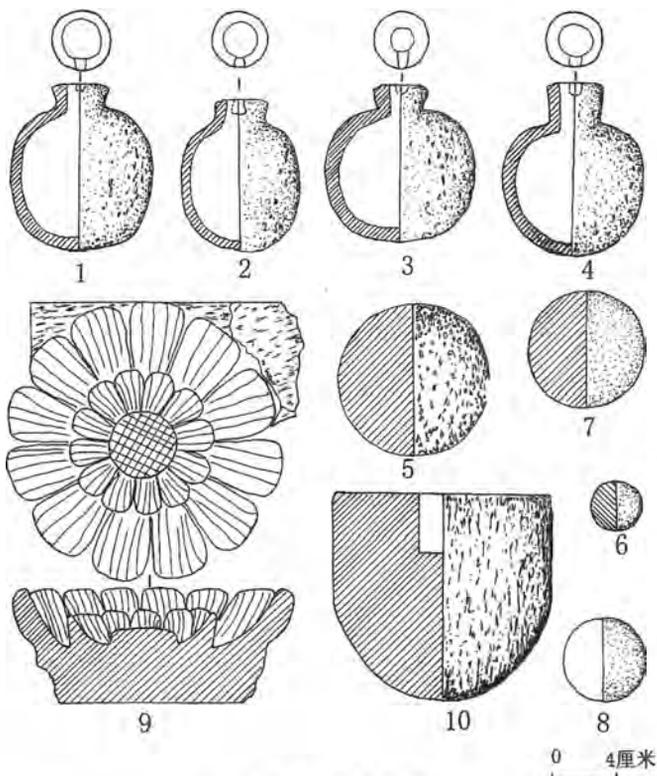
脊饰 均为泥质灰陶,均不可复原。标本 T0402①:2,莲花纹建筑构件,为一盛开的莲花状,直径 17 厘米,厚 7 厘米(图六:9;彩三:4)。标本 T0402①:6,叶纹建筑构件,为一枝叶状,长 26 厘米,宽 8 厘米,厚 5 厘米。标本 T0402①:7,作莲蓬形状,长 13、宽 11、厚 6 厘米。标本 T0402①:8,兽首形,长 15、宽 9、厚 7 厘米。

(四)瓷器

发现瓷片均为青花瓷,有

一定数量的有款瓷片,可辨器形均为碗。

青花瓷碗(残片) 标本 T0305①:4,内底正书“寿”字款,外有双线圈,勾勒牡丹纹。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底部较平坦,足底草书“大明年造”四字款两行。底径 10.3、残高 4 厘米(彩四:1)。标本 T0404①:3,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底部较平坦,足底心书“成化年制”四字款两行,外饰单线圈。底径 5.6、残高 2.5 厘米。标本 T0406①:3,内底饰葵花纹,外有双线圈,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底部较平坦,足底草书“宣德年造”四字款两行,有双线圈纹。底径 8、残高 4 厘米。标本 T0408①:1,内底勾勒如意云纹,勾勒双线圈,一粗一细,线圈外饰花草纹。矮圈足,底部较平坦,底心勾勒单线圈,底径 12.5、残高 3 厘米(彩四:2)。标本 T0408①:2,可复原。敞口,弧腹,矮圈足。饰青花缠枝纹。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无款。口径 21、底径 7、高 12.3 厘米。标本 T0506①:3,内底勾勒牡丹纹,内壁下腹饰双线纹,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外底突起,足心草书“大明成化年造”六字款两行,外有单线圈。底径 9 厘米,残高 5 厘米(彩四:3、4)。标本 T0607①:5,内底饰老叟抚琴图,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外底



图六 出土遗物

1~4. 手雷 (T0307①: 6、T0207①: 2、T0204①: 1、T0406①: 2)
 6. 铁弹丸 (T0207①: 10、T0207①: 1) 7、8. 石弹丸 (T0307①: 4、T0207①: 6)
 9. 莲花纹建筑构件 (T0402①: 2) 10. 石片 (T0404①: 3)

乳凸,底心草书“宣德年造”

四字款两行,外有双线圈。底径 8.3、残高 3 厘米(彩四:5、6)。标本 T0607①:11,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足心草书“大明成化年造”六字款两行,款字外有单线圈。底径 6.5、残高 3.9 厘米。标本 T0607①:8,矮圈足,足口外敛内敞,足心草书“大明成化年造”六字款两行。底径 7.5 厘米,残高 4.5 厘米。

(五)其他

石杵 共 2 件。青灰石质,顶平,有孔,底弧形,较为光滑。T0404①:3,顶径 13.5、顶圆孔径 3、深 3.5、通高 12.5 厘米(图六:10)。

石砚 1 件。标本 T0508①:1,残,灰白石质,仅残留墨池部分,墨池内依然有黑色的墨痕。残长 10、宽 12.8、高 3 厘米。

顺治通宝 1 枚。标本 T0612①:1,小平钱,方穿,宽郭,钱面文为“顺治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7、穿径 0.6、郭宽 0.35 厘米。

四、结 语

由于四百年以来人为破坏和自然的作用,营盘遗址内房屋建筑损毁严重,不过通过这次考古发掘清理,基本搞清了遗址内及周围城墙上的建筑情况。城内建筑由城内南北向的一条道路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建筑在北半部。营盘遗址城内建筑物均依山势而建,建筑物之间高差最大达到 27 米。主体建筑 F1,位于南北中轴线上,该建筑群有正房和厢房 7 座共计 13 间。F1 为正房,坐北朝南,是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F2~F7 为附属建筑,即东西厢房,F6、F7 为东厢房,F4、F5 为西厢房。F2、F3 位于 F1 之北,其中 F2 室内有灶的遗迹,因此这两座房屋可能直接附属 F1。

另外在遗址北部建筑群内设有东、西跨院,西跨院清理房址 3 座(F10、F11、F12),共计 7 间。F10 为西房,F11、F12 为正房,坐北朝南。东跨院清理房址 2 座(F8、

F9),共计 4 间,F8 为正房,坐北朝南,F9 为厢房。F1 可能为营盘城内将领居住,厢房及其它房屋可能是其他各级士兵居住,可见营盘内房屋的布局有一定的规划。据踏查营盘遗址周围长城,未发现附近有类似的堡垒性质且内部房屋有所规划的遗址,因此可以推断营盘遗址内的守将很有可能统帅附近长城上防守的将士。

在三处城角发现有条石基础,分别是东城墙与南城墙相接处、南城墙与西南城墙相接处、西南城墙与西城墙相接处。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数十年以前,这三处都曾建有敌楼,北敌楼亦曾完好,同时城门上亦曾有城门楼。经过时代的变迁,曾经存在于城墙上的敌楼已荡然无存。不过由此可以推断营盘遗址城墙之上曾经存在四处敌楼,一处城门楼,可谓建筑壮观,防守严密。而从铁弹丸、石弹丸和铁蒺藜等多出土于西城墙附近及北敌楼可知,北面乃是防卫御敌的关键所在。

通过此次发掘,基本搞清楚了营盘遗址范围内北部区域及庙台等处的房屋的布局情况,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文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营盘遗址内军队武器装备情况,丰富了对明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认识。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袁进京,参加发掘的有于璞、刘伟、赵铭岩、何东来、张绪武、赵博安、朱文军。在发掘过程中,承蒙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张治强、郭京宁、孙勳和北京市延庆县文化委员会程金龙、范学新的现场指点,得到了北京市延庆县九眼楼自然风景区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示感谢。

①该次发掘的部分材料已于《北京文博》2006 年第 3 期上发表。

摄影:王殿平 何东来

绘图:张绪武 赵博安 朱文军

执笔:于璞 刘伟 赵铭岩 何东来



中国古代玉带具沿革及时代特色

沈 珠

图八 陕西周原遗址出土玉带具

“带”作为腰间的束扎物是中国古代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带”分为“革带”和“大带”两种。

“革带”顾名思义是用动物皮革制作的腰间系扎物。历朝历代，从布衣平民到达官显贵乃至天子都要束带。

“大带”又叫“绅带”。早期束系在革带的外边，一头垂下，主要起装饰作用。束系大带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绅带的长短因地位的高低而异。“大带”虽然华丽但由于是纺织物，不能承载重物，随着革带上装饰物的增加，大带则逐渐从“幕前”退居到“幕后”束系在革带之后了。

革带的束结，早期是用绦带与绦带，绦带与固定在革带上的环或钩相系。随着革带装饰功能的不断增强，兼具装饰和实用功能的钩、环相连束结方法逐步成为主流。

带钩，自出现以来，历朝历代发展变化较大，本文将玉带钩的发展变化作为重点之一，按朝代详细叙述。

带环，在钩环相扣的革带束结中，其装饰作用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形制比较简单且变化不大，故不在此赘述。辽、金、元时期环与钩的装饰地位出现互换，变化较大，后文详述。

新石器时代，以玉作钩，最早出现在新

石器晚期。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余杭反山遗址、上海福泉山遗址均有玉钩出土。钩呈长方体，出土实物长度在5-8厘米之间，一端为两面对穿的大孔，可用于穿系，另一端琢磨成铲形钩状，钩首部分与后世的钩首呈反向弯曲，已发现的实物均出土于人体的腰部，无疑用于钩系腰带。

已发现的带钩形制简单，绝大多数没有装饰纹样，仅见浙江余姚反山 M:158 出土一件带有兽面纹带钩（图一），该钩为我们提供了良渚先民如何使用带钩信息：为让兽面纹正向面对他人，将软性绳状腰带一端结系在带钩的孔洞上，右手握钩，向左侧括扣于腰带另一端（应该有结系好的绳环），这与人们的生理习惯完全吻合。

夏、商，目前没有发现实物，好像带钩与人们生活暂时失去了联系。

西周，从春秋普遍使用带钩的情况判断，带钩成型期应该在西周，这与西周重“礼”不无关系，人们的着装、佩挂、行走、坐卧无一不列入“礼仪”范畴。带钩的出现符合美观、整洁、使用方便的实际需要，众人纷纷效仿，唯恐“失礼”，但具体的形成过程及形制的发展变化，由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有限，不能准确定论。

春秋时期，带钩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但主体是金属带钩,玉带钩偶见。比较知名的出土有: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春秋墓(图二)、河南固始侯古堆墓1号墓等出土的玉带钩。该时期出土与传世的实物有下述特征:器体小巧,已知的出土器物长度都小于3厘米,钩身短小扁宽或环状,钩首相对钩身而言显得较大,扁长似鸭嘴,突出钩括作用,强调其实用性。装饰性纹饰见有满布器表的蟠虺纹,纹饰突起呈圆弧状,器体外边缘多齿凸状,给人以浑圆饱满的感觉。该时期带钩最大特点是没有钩钮,钩钮的作用是将钩固定在革带上,没有钩钮说明此时期钩与带的联结方式有别于后世。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其联结方式视带钩钩身的形制而异,可能有两种或更多,如,环状钩身的玉带钩将丝质地或其它柔软材质的腰带直接连缀在环状钩身上或通过介质与革带联结。再如,长方体中空钩身的玉带钩将革带直接插入中空部分将革带与带钩固定相联。

战国、两汉是玉带钩发展使用的鼎盛时期。根据所见出土、传世玉带钩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分为如下类型:

1.四棱体玉带钩:流行于战国至西汉,以战国为主。钩身四棱体,边棱轮廓清晰有平直的切割感,钩首简约,大多是马头状或只突出眼部和吻部的龙首,因此也被俗称为“马头钩”。钩首相对扁长,留有春秋玉带钩钩首的痕迹。背部有长方形钮,钮柱两侧不内缩,与钩身的宽窄一致。其代表器有:河南信阳县长台关战国墓出土、广东肇庆北岭松山1号墓出土、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藏的战国四棱体玉带钩。

2.宽体玉带钩: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基本形制是:钩首多龙首,钩身扁宽,背部有圆形钮。代表器有:山东曲阜鲁故城遗址出土玉带钩(图三)、江苏无锡市鸿山镇越国贵族墓出土透雕玉带钩。

3.多节玉带钩: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基本特征是,体量较长大,有多节玉块组成,中间以金属条贯穿连接。代表器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浮雕多节玉带钩(图四)、

陕西西北郊六村堡建辛宫出土西汉七节兽头玉带钩。

4.长形玉带钩:流行于战国至西汉。钩体修长弧状,多在15厘米以上,钩首多雕龙头,偶有钩尾也雕龙头的,背部有圆形、椭圆形或钝角长方形钮,钮低于钩首与钩尾的水平线。代表器有: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龙首长形玉带钩、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双龙首长形玉带钩。

5.禽形玉带钩:流行于西汉至东汉。体量较小,钩首多做禽首(亦见龙首),钩身弧形隆起呈鸟身状,依稀可分辨出双翼,背部有圆形或椭圆形钮。代表器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禽形玉带钩、江苏徐州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出土的禽形玉带钩等。

6.琵琶形玉带钩:该种形制可以说是带钩的主体形制,从战国晚期出现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钩首多做龙首,少量为禽首,钩身至钩首折弯处开始逐步加宽加厚,腹部弧形突起形似琵琶,背部有钮多为圆形。战国、两汉的代表器有: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河北满城汉墓、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琵琶形玉带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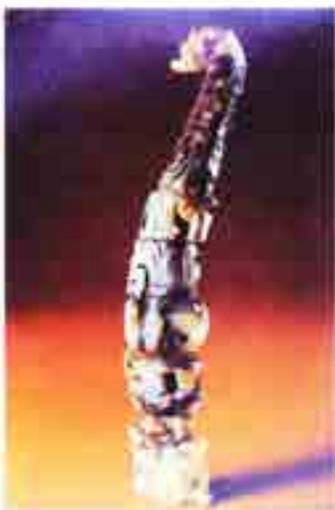
7.异形玉带钩:除上述六种常见的类型外,还可零星见到异形带钩,这些带钩基本上是为王侯贵戚所作的精品,制作精美,标新立异,用来标榜自己特殊的身份。代表作品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龙虎并体衔璧玉带钩(图五)。

8.金玉合体带钩:流行于战国。以金、银、铜等金属做钩体,表面再覆以鎏金、错金、包金等工艺,并镶嵌若干玉块,金玉结合,华丽精美。典型器有:河南省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鎏金嵌玉铜带钩、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错金嵌玉铁带钩等。

虽然我们将战国和汉代的玉带钩在此一并分类,但两个时代历经近700年时间,还是各有特点。总体而言,战国时期玉带钩制作工艺精良,棱角分明,常以简练的线条勾画动物形象,具有抽象的意味,给人以严



图一 余姚反山出土兽面纹带钩



图四 广东南越王墓出土浮雕多节玉带钩



图二 陕西宝鸡出土玉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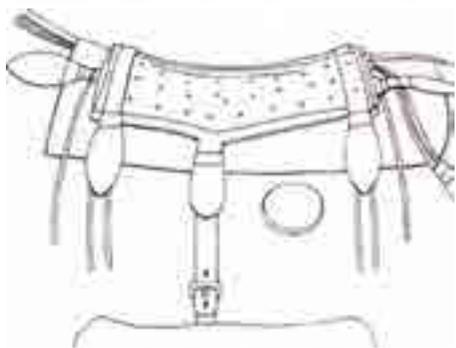
图五 南越王墓出土龙虎并体衔璧玉带钩



图三 山东曲阜出土玉带钩



图七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玉透雕龙纹带饰牌



图六 秦兵马俑陶马腹带的带扣示意图

谨、规矩的总体印象。汉代特别是西汉中晚期到东汉,题材丰富,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动物形象的塑造从抽象逐步演变到具体,给人以灵动、细腻的印象。

以上八个类型,是我们对战国至汉代玉带钩认识的分析与归纳而得出的初步结论,只能作为鉴定时的参考依据,不能在实际鉴定过程中简单地生搬硬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看到不少传世品具备上述类型中两个或多个特征。例如,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藏的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青玉龙首带钩”,既具有春秋时期玉带钩体量较小没有钩钮的特点,又具有战国时期简练勾画动物线条的时代特点。又如,该中心收藏的“汉代龙首带钩”钩身上有象征禽鸟翅膀的线条纹饰,而钩首却是龙首,因此也很难归入禽形玉带钩类。如此种种情况说明每个具体实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每个类型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在鉴定中要综合地看待每件器物,通过与科学考古的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学对比、古代文献资料的查找、老师经验的传授、个人知识积累运用,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或接近正确的结论。

东汉后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匈奴、东胡等少数民族革带的系结有别于中原地区,他们使用带鞞来扣结,所谓“鞞”就是有舌的环,同时革带的鞞上装饰铜牌。有不少专家认为这样的装饰方式影响了中原地区,但1992年在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墓出土了战国时期鸭首玉带鞞,秦始皇陵2号兵

马俑坑出土的陶马腹带也是比较完整的使用带扣的实例(图六),是受草原地区文化影响,还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创造?有待进一步证实。

蹀躞带是带鞞上垂下系物之带,始见于东汉。河北定县43号东汉墓出土附有马蹄形环的长方镂空银铸蹀躞带,此时期多金属制品,仅有洛阳东关夹马营路15号汉墓出土玉质带扣和台北故宫收藏汉代四灵玉带扣等几个不多的实例。蹀躞带在公元3~5世纪非常盛行,以至于后来人们称这种带具为“晋式带具”。

南北朝时期的出土和传世玉带饰数量不多,著名出土器有:1988年5月为建陕西西安咸阳机场考古发掘中,在7号墓中发现了一条完整的玉带具。该墓是北周武帝儿女亲家、重臣城郡公骠骑大将军若干云墓地。这条玉带具包括8枚附环的方铸、1枚铎尾、1枚带扣及扣柄、9枚偏心孔玉环及1枚镂空柿蒂纹方铸。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完整玉带具,是研究我国蹀躞带形制、制度的重要物证。其余代表性的传世器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玉透雕龙纹带饰牌(图七),从饰牌背面两行铭文得知,是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制作,自称是“白玉袞带鲜卑头”,孙机先生研究认为是与带扣相对的牌饰。

虽然出土和传世的玉质实物不多,但金属材质的蹀躞带较多见,证明其使用还是非常普遍的。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使用玉质带具的人身份地位极高,因此,从选材到制作都十分考究,均选用上好的白玉,绝大部分玉铸表面没有装饰纹,抛光好,玉铸(包括上博收藏的白玉龙纹鲜卑头)的正面四边打若干穿孔,用金、银等贵金属将玉铸固定在带鞞上,个别玉铸使用透雕工艺,装饰在革带正面显著位置,以增加其整体装饰效果。

隋代基本继承了南北朝的带具形制。出土实例很少,仅见西安东郊郭家滩发掘的隋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姬威墓出土玉带具。此时期依然以蹀躞带为主流,工艺与装



图九 无锡出土“春水纹”玉带具



图十三 明代至清初出现的带扣



图十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藏“秋山”玉带具



图十四 连体碧玉龙尾带钩



图十二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藏元代“玉带身”



图十五 清代白玉带钩

饰风格亦无大的变化。

唐代是玉带具的滥觞期。有唐一代各时期风格略有不同。初唐基本延续北周、隋代的风貌,自中唐以后,其形制、装饰风格、制作工艺、带铐与革带的联结方式变化较大,形成独特的时代风貌。

唐代出土物以陕西地区为最,特别是陕西长安县里王村唐上柱国左卫府中郎将窦噉墓出土的玉梁金筐宝钿珍珠装蹀躞带(图八),让我们看到蹀躞带华美的极致。此外,能基本反映唐代玉带具面貌的是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10副玉带具。

唐代带具的使用非常普遍,以材质和铐数来区分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十三铐玉具带。《新唐书·车服志》载:“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铐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玉带铐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玉带铐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铐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输石带铐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铐七。”《新唐书》的记载与其它史书例如《旧唐书》、《通典》等的记载略有所出入,但不管哪部书记载都是以玉带具铐数最多的为最高。从记载的不一致,推测唐代用带制度前、后期有所变化,制度也不十分严格。同时何家村窖藏的玉带具铐数分别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多个规格也能证明上述推断。

唐代包括唐代之前流行的蹀躞带都是单扣单铤尾带(就像我们现在的腰带)。所谓铤尾,“腰带者,搢垂头于下,名曰铤尾,取顺下之意。(《新唐书·车服志》)”。单扣单铤尾带因身体前部分带鞞有叠压现象,不便于装饰带铐,为对称美观,带铐一般都排列在腰两侧及背部。唐代开始出现双扣双铤尾带,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武士像的腰带就发现双铤尾带。双铤尾带为周鞞装铐提供了可能,双铤尾带自宋代开始逐渐流行,金代已成定制,明代只有这一种带式了。

唐代玉带具图案艺术特色十分鲜明,

多为伎乐人物、花卉、动物,许多纹饰具有外来文化的痕迹,伎乐人物的外形特征几乎都是高鼻深目头发卷曲的西亚人形象,被统称为“胡人”。国人对狮子形象的认知源于外国进贡。花卉图案大多是正面图案化的花朵或叶片,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教文化装饰图案的倾向。玉带饰图案的大量外来文化元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外贸易、文化交流频繁。唐代玉铐的图案时代风格鲜明,异域风情浓郁,生活中常见的景物成为描写对象,一反汉代以前神秘侍神倾向,图案从抽象变为具体,从平面向立体转化,玉器从祭神走向了待人。

唐代玉铐工艺也有独到之处,先在带铐的正面碾琢出主体图案的轮廓,再从带铐的四边向内斜刻至主体图案,在边缘和图案之间形成凹池,以此方式突出主体纹饰,让人有主体纹饰的浮雕感,这种技法被后人称为“池面隐起”。同时,多用短小较宽的阴刻线纹表现细部,线纹多呈平行放射状。玉铐的边缘为梯形,背面有多对象鼻孔,用于穿钉将其固定在带鞞上,改变了以前正面对穿打孔的做法,为图案整体化提供了可能,这种技法一直沿用到以后各朝各代。唐代带具的铤尾与带鞞联结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在铤尾方型的一侧横向切出一凹槽,将带鞞夹嵌在其中,再以金属钉固定。二是,把铤尾方形一端反面剔掉一层,使其变薄,并在上面加钻象鼻孔,将带鞞末端用金属钉固定。

宋代,基本沿用唐制,但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数量看,远远少于唐代。究其原因,一是,此时中国西北地区战乱频仍,玉材来源通道远不如唐代畅通。二是,宋代崇尚黄金,太宗皇帝(976-997)认为“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炼不变,真宝也。”因此“乃创金铐之制,以赐群臣(欧阳修《归田录》)。”金带的纹饰有六种:“毳路、御仙花、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岳珂《愧郈录》)。”其中荔枝纹应该最受重视。荔枝带本是皇宫内室赏赐之用,奖赏有功将相,如果不是皇帝特殊的恩准,“官至三品乃得服之”(《宋史·舆服



图十一 元代《名器四像图》中虞夏虞僧

志》)。”从出土实物上看,荔枝纹最多,如:江西遂川北宋郭知章墓出土荔枝纹金带具、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元代荔枝纹金带具、宁夏银川西夏8号陵出土荔枝纹金带具。上述出土物虽然是金质,但我们可从其中看出其形制和唐代基本一致,均为单铤尾带,证明双扣双铤尾带尚未成定制。

宋代玉带具出土实物见有江西上饶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出土的人物纹玉带具九枚,其中方铤七枚,有孔桃形铤一枚,铤尾一枚,作为完整玉带具似乎有部分散失。

从不多的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资料上看,宋代的玉带具基本继承了唐和五代的形制,带铤的数量减少,体量增大,尤其是铤尾加长,带铤侧面的梯形坡度减小近乎垂直。纹饰方面,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已经融合,不再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情,特别是“胡人”形象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文人雅士。主体纹饰周围不再用细小的装饰线纹围绕,因而使得主体纹饰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阴刻线纹从平行短小演变为随刻画

主题需要而弯曲流转,因此给人以流畅飘逸之感。在制作工艺上,总体感觉是,在前人工艺技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特别是方铤有两个方面变化,一是减小了“池面”的深度,二是恢复了透雕技法。透雕技法比北周时期更加成熟、细腻,例如,荔枝纹、毯路纹就是借助透雕技法完成的。

辽、金、元时期,辽(916-1125)是契丹贵族建立的政权,金(1115-1234)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辽、金政权存在的时间分别与北宋、南宋大致对应。元代(1217-1368)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朝代。虽然契丹人、蒙古民族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草原上,女真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但他们的生活习俗基本一致,“四时捺钵,逐水草而居”。他们的带具的佩戴制度基本和宋一致,也以玉带具为最高。辽代的带饰形制没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大小、不同质地饰物可以同时装饰在同一条带上。金代则“其束带曰吐鹞。……吐鹞,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铤周鞞,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铤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金史·舆服志》)。”证明金代带具已有定制,双扣双铤尾带已经成为唯一,奠定了后世带具主流样式基础。

辽、金、元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反映“四时捺钵”纹饰的玉带具。其中“春水”(图九)和“秋山”(图十)纹样最多,主要用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参加春捺钵、秋捺钵活动时佩戴。《辽史·营卫志》就记载有这种玉带具。以往散存的辽、金时期的传世品,多因资料的匮乏、研究深度所限不敢或不能确定。近年来,伴随着科学发掘的进展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筛选出部分实物,特别是春水秋山题材的传世品,确定为辽金时期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春水图饰、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藏的青玉鹞啄鹅饰等。

这件器物,我们认为是革带或绦带上承钩的环。汉代以前革带的连接使用钩环相括的方式,在钩、环之间,钩处于装饰主角的地位,而环则处于从属地位。辽金时期

乃至元朝,钩、环相括的形式又开始流行,不仅在革带上使用,也用于绦带。绦带一般被视为“常带”,即日常用带。元人《名贤四像图》中虞眉庵像其腰部扎系的就是绦带,两端分别是钩、环(图十一)。此时环的装饰作用大大提升,其上加著浮雕,最多的是鹤啄鹅雁反映春蒐活动的纹样,我们把这类环暂称为“绦环”。还有一些以秋季山林、虎、鹿、熊为纹饰反映秋猕活动的带饰,大部分是“玉带穿”。带穿:长方体,下部有半圆形环,侧面有横贯的长方空,可直接穿带在带鞞或绦带上,应该是蹠蹠环的变体(图十二)。

辽、金、元时期纹饰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亦有所区别,可作为鉴定的依据之一。以“春水玉”为例,辽至金早期主题纹饰比较单一,只有天鹅(或大雁)和鹤,周围没有花草装饰,以浮雕的方式突出主题,用较粗的阴刻线纹描画细部,环的特征较为明显。金代晚期至元代,尤其是元代,在鹤、鹅的周围加了许多花草装饰,采用多层透雕的技法,层层密密,加大了纵深感、装饰感。有人将这种层层密密的风格总结为“密不通风”。此时环的特征已不明显,仅在器物的背面保留环状,器物的两侧,各有一缺口(缺口大部分都有破坏画面的情况),一侧略大用于承钩,另一侧稍小用于与带固定。

元代,玉带具的纹饰题材范围明显增加,龙、螭、人物、花鸟、走兽、花果、龟游、连珠等都是常见的纹饰,纹饰凸起较高,立体感强,方铐的体积较大且厚重,出现倭角,蹠蹠环饰使用普遍,整体艺术风格是粗犷中见精细。

对应“绦环”的带钩,辽金时期不多见,元代带钩的特征是:形制相对单一,多为琵琶形,体量较大,厚重,钩首较长,钩首转折的弧度较小,背部多为长方桥形钮。

明代,玉带具已经完全程式化,“革带前合口出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

三枚。”(明张自烈《正字通》)此时的玉带具已经完全是身份地位的昭示物,基本没有使用功能。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的玉带铐数各异,皇帝使用的带具加铉尾共计二十四枚,臣僚二十枚。主要的出土器有:江西南城县明益庄王朱焯墓出土玉带具二十枚,山东邹县朱檀墓出土玉带具二十枚,南京地区出土明代皇家玉带具等。传世的玉带具也比较多,但基本上已经散佚难成组套。

纵观明代玉带具,纹饰种类颇多,常见有云龙、云鹤、花卉、动物、人物、杂宝等。明前期,玉带具制作较为精良,如山东、南京等地皇家贵族出土物就属此类。明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制作粗糙,以龙型为例,身躯细瘦,细部刻画潦草,抛光简单。

明代出现新的带具品种,集钩、环功用为一身的“带扣”,也有人称为“绦环”(图十三)。从形制上看,这种带扣应该用于日常生活中扎系的绦带上。明代至清初,由于是新的品种,人们既喜爱又重视,因此选料讲究、制作精心,有不少精品传世。整体敦厚,两侧多对称浮雕龙纹、螭纹、花卉等。到清代逐渐退变,演变成透雕薄片状,钩短小,代表环的孔洞也较小。另外还有些异型带扣,如单体双钮白玉马上封侯带扣、连体碧玉龙尾带扣(图十四)等。

清代,由于服制的变化,革带系在补褂之内,其身份的标志作用不再具备,因此逐步退化,带铐基本无存,仅存带钩、带扣,其作用和明代基本相同。

明代至清代初期的带钩是否全是实用品?有待进一步考证。从可观的传世品数量上看,可能相当一部分带钩已经从实用转为陈设。这种带钩特征是:体量较大,钩首短胖,多为龙首,钩身浮雕面向龙首爬行的螭龙,似母子对望(图十五)。其装饰性远远大于实用性。

(作者为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助理)

周代的车马装饰所蕴涵的车马制度

冯 好

《国语·鲁语上》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车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早在先秦时期，车便被纳入了礼制体系之内，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用以辨服章、别尊卑的重要手段。先秦贵族乘用的车基本为马车，因而这一用车制度可称为车马制度。车马制度与冠服制度合称“舆服”制度，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车马制度早在夏商时期已形成^①，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夏商车马制度的内容今已不详。依据有关周代车马制度的文献记载，再结合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可以确定至迟西周时期车马制度已臻成熟，其基本内容也是后世历代车马制度的直接源头。对周代车马制度展开研究，无疑对于先秦礼制、古代舆服制度等领域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代车马制度主要对不同等级贵族用车的种类、装饰与数量这三个方面进行限定。关于用车数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较为丰富，明确，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关于车类与车马装饰，由于文献记载零散，出土材料保存不佳等原因，有关研究进展不大。已有学者指出，各等级贵族用车的总体结构是基本相同的，因此这些马车的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车马的装饰上^②。笔者赞同此说，并尝试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对车马装饰所蕴涵的车马制度问题做一粗浅的梳理，希望对于周代车马制度的研究有所助益。

本文认为车马装饰包含四个部分：马饰、车饰、装饰性车马器、车体部件。以下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辨析。

一、马 饰

马饰特指不能归入车马器的软质装饰。文献中有关马饰与车马制度之间关系

的记载较少，已知体现了等级差别的马饰主要是马胸前的樊缨。《左传》桓公二年曰：“鞶、厉、游、纆，昭其数也。”杜注曰：“纆，在马腹前，如索结。……尊卑各有数。”樊缨与贵族等级、命服之数有密切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车马装饰。但由于其不易保存，很难在考古发掘中完整地辨认出来，因而对于樊缨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材料。

关于樊缨的基本形态，《周礼·春官·巾车》郑玄注云：“樊读如鞶带之鞶，谓今马大带也。”郑众注曰：“纆，当胸，以削革为之。就，重，匹也。……纆，今马纆也。”孔疏曰：“一采一匹为一就。”此谓樊缨为马胸前皮带与带上悬挂的成束纆穗，后世均从此说。

由文献记载可知，依礼樊缨为周王、诸侯车马所专用。《左传》成公二年记，卫国大夫仲叔于奚立下显赫战功，请求卫侯赐以“曲县(悬)，繁(樊)纆以朝”，卫侯许之。曲县(悬)即《周礼·春官·小胥》所记载的诸侯钟磬“轩县(悬)”。是故《左传》成公二年又记，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此杜注曰钟磬轩悬、马佩樊缨均为诸侯之礼。《三礼》等文献中关于樊缨就数(即重、匹之数)的文献记载都是围绕着周王与诸侯乘坐的辂车展开^③，也证明樊缨是周王、诸侯车马所专用。

《三礼》等文献中记载樊缨就数与周王、诸侯辂车的等级存在严密的对应关系。但令人困惑的是，不同礼书记载了截然相反两种对应关系。同时，这两种对应关系还与《三礼》记载的几种王之辂车序列纠缠在一起，从而使情况更复杂。囿于篇幅，本文不就王之辂车铺陈太远，而将另文详细考证。在此仅对不同文献记载的王之辂车的构成，及其对应的樊缨就数略做表述。

(1)五辂等级由高至低为大辂、级辂、先辂、次辂、戎辂，樊缨就数分别为一、三、五、七、九就，就数以少为尊。《尚书·顾命》

曰周成王陈“大辂在宾陛面，缀辂在阼陛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先儒认为次辂之后应还有戎辂，因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郑伯赏卿子展“先路（辂），三命之服”，赐卿子产“次路（辂），再命之服”，僖公二十八年又记周王赐晋文公“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因此推测戎辂与一命之服相对应，为五辂之末；由于“兵事非常，故不陈也”^④，是故《尚书·顾命》没有将戎辂与其它四辂一同陈放。《礼记·礼器第十》曰：“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大路（辂）繁（樊）纓一就，次路（辂）繁（樊）纓七就。”将其余三辂填补进此句，则可知大辂、缀辂、先辂、次辂、戎辂樊纓分别为一、三、五、七、九就。

(2) 四辂由高至低为大辂、先辂、次辂、戎辂，樊纓就数分别为一、三、五、七就，就数同样以少为尊。《礼记·郊特牲十一》曰：“大路（辂）繁（樊）纓一就，先路（辂）三就，次路（辂）五就。”这里没有了《尚书·顾命》记载的缀辂。但《礼记·礼器第十》又言“大路（辂）繁（樊）纓一就，次路（辂）繁（樊）纓七就”，郑玄、孔颖达等先儒在《礼记》注疏中赞同次辂五就，认为《礼记·礼器第十》所曰“次路（辂）繁（樊）纓七就”当为“五”就之讹，并认为次辂之后还有戎辂，樊纓七就。

(3) 五辂由高至低为玉、金、象、革、木辂，樊纓就数分别为十二、九、七、五、三就，樊纓就数以多为尊。《周礼·春官·巾车》曰：“王之五路（辂）：一曰玉路（辂），钺，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辂），钩，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辂），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辂），龙勒，条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辂），前樊鹄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虽未言木辂樊纓就数，但可类推为三就。

笔者认为，《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的玉、金、象、革、木这五辂序列不见于其它先秦文献，其可信度存疑，构拟的理想成分较大，因而其关于樊纓就数的记载也不免令人生疑。《左传》关于周王、诸侯“赐辂”的记

载在先秦文献中最为丰富，所赐辂车包括王赐大辂与戎辂，诸侯赐先辂、次辂，表明《尚书·顾命》与《礼记》记载的辂车序列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其关于樊纓就数以少为尊的记载可信度更高。

但是究竟一至九就樊纓对应五辂，还是一至七就樊纓对应四辂，目前还不便轻易断言，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缀辂”。缀辂在先秦典籍中仅见于《尚书·顾命》，并且上引《左传》中关于“赐辂”的记载提到了其它四辂，唯独不见赏赐缀辂，这是“四辂”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礼记·礼器第十》又言“大路（辂）繁（樊）纓一就，次路（辂）繁（樊）纓七就”，如果排除此文有讹误的可能，则大辂与次辂之间分明又应有缀辂的位置。文献记载相互矛盾，存疑待考。

樊纓就数以少为尊，与周人辂车以朴实为尊有密切关系。《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谏桓公曰：“清庙茅屋，大路（辂）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遭，昭其俭也。”杜注曰：“越席，结草。……大路（辂）越席，如清庙茅屋，清庙之华，以茅饰屋，示俭。”《礼记·明堂位》亦曰“大路（辂）素而越席”。皆曰大辂朴实无华。因此大辂服马樊纓仅一就，也是为了彰显大辂的朴素之风。大辂质朴的特点，可能是因为大辂继承自朴素的商人辂车。《礼记·明堂位》曰：“大路（辂），殷路（辂）也。”此当理解为周人大辂仿自商人辂车。《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公赐唐叔“密须之鼓，与其大路（辂），文所以大蒐也。”杜注：“密须，姞姓国也。……文王伐之，得其鼓、路（辂）以蒐。”文王伐密须是在商末，密须之大辂无疑属“殷辂”，该辂于周初又被做为赏赐之物，可见周初有的大辂直接来自商王、商方国诸侯的辂车。从考古发掘来看，商晚期马车的装饰普遍不如西周马车，因此周代大辂以殷辂为楷模，以朴素为尊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车 饰

车饰指车体上的附属性软质装饰。从

文献来看,周代车马制度对车饰的等级限定主要体现在鞅革、髹漆、彩绘等方面。

(一)周王、诸侯的辂车

文献中关于辂车车饰特征的记载甚少。由于保存问题,考古发掘资料亦不足征。上引“大辂”的文献材料说明,周代辂车总体上是以朴素为尊,但不同辂车的具体车饰则无从考证。

(二)卿以下贵族的服车

郑玄注《巾车》曰:“服车,服事者之车。”贾疏曰:“孤卿以下,皆是辅佐之臣,服事于上,以服事之车解之也。”是以服车特指卿及其以下贵族之车,以示与王之辂车有别。

《周礼·春官·巾车》完整记载了卿以下贵族的服车,其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周礼》关于不同服车的记载可与其它文献相对照,为探讨卿以下贵族服车的车饰特点提供了线索。

1、卿之服车

《左传》哀公四年记:“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卿之车”表明卿一级贵族是有专用服车的。

《左传》哀公二年记晋卿赵简子誓曰:“素车朴马,无人于兆,下卿之罚也。”正义曰:“素车,无饰。”下卿谓赵简子本人,以乘素车作为对卿的惩罚,这说明卿之服车本身是有装饰的。

《周礼·春官·巾车》明确描述了卿之服车的装饰特征,其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孤”指孤卿,是地位最高的卿^⑤。夏篆、夏纁二车的车名均仅见于《周礼》,其它文献无载。虽然《周礼》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笔者认为夏篆、夏纁的记载应有所本。郑玄注《巾车》曰:“故书‘夏篆’为‘夏缘’。郑司农云:‘夏,赤色。缘,缘色。或曰夏篆,篆读为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约也。’玄谓夏篆,五采画轂约也。夏纁,亦五采画,无瑑尔。”贾疏释“无瑑”即无“轂约”。《说文·车部》曰:“辂,谓之约,《周礼》曰:‘孤乘夏辂’。”

许慎将夏篆读为夏辂。孙诒让《周礼正义》引阮元语:“辂与篆声相近,盖许(慎)所读本如是,训为车约,与两郑义合。”概而言之,夏篆、夏纁二车的共同特征为车有彩饰,可能是彩绘或彩漆。二者的区别在于夏篆饰轂(即辂、瑑),夏纁轂无饰。

以彩饰车正与“素车”相对,因此《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的夏篆、夏纁卿车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卿车的基本特征就是车有彩绘或彩漆。考古发现东周时期的马车较为流行车轂涂漆、彩绘,有的学者推测这就是夏篆的特点。但车轂涂漆本身具有保护车轂的作用,未必就与等级身份有直接关系,况且车轂涂漆的出土马车所属墓主等级很难准确判断是否为孤卿。因此彩饰车轂是否是孤卿服车夏篆的特点,目前还很难说。

2、大夫之服车

先秦礼书谓大夫服车为墨车。《仪礼·士昏礼》曰:“(士)乘墨车,从车二乘。”郑玄注曰士昏礼摄盛一等,乘大夫之车。《仪礼·觐礼》曰:“侯氏裨冕,释币于祚。乘墨车,载龙旂。”郑玄注曰:“墨车,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国,车服不可尽同也。”敖继公《仪礼集说》云:“乘墨车者,屈也。……晋韩宣子聘于周,自称曰士,大国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则其君自比于大夫亦宜也。”此谓诸侯人觐天子自比大夫,不乘辂车而降礼乘大夫之车墨车。《周礼·春官·巾车》则明确称:“服车五乘:……大夫乘墨车。”

关于墨车的装饰特点,郑玄注《巾车》曰:“墨车不画也。栈车不革鞅而漆之。”郑玄注《仪礼·士昏礼》则曰:“墨车,漆车。”《释名·释车》曰:“墨车,漆之正黑,无文饰,大夫所乘车也。”汉儒谓墨车以革鞅车,车漆黑色无彩饰,与卿之彩绘服车形成了等级差别,这是合乎情理的。

3、卿大夫之轩车

轩车不见于礼书,而见于史书文献。关于轩车的文献记载可明显看出轩车与卿大夫贵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些史料明确说明乘轩车者为大夫。《左传》定公十三年曰：“齐侯敛诸大夫之轩，唯(大夫)邴意兹乘轩。”《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卫国外州人夺卫大夫大叔疾之轩。《左传》哀公十五年记，卫太子欲使无爵禄之竖助其篡位，许之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杜注：“冕，大夫服。轩，大夫车。”

有的史料表明乘轩者还有大夫以上的贵族。《左传》闵公二年曰：“(齐侯)归(卫戴)公乘马，……归(卫戴公)夫人鱼轩。”杜注曰：“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诸侯夫人命服低于诸侯，与诸侯之卿相近。

其余有关轩车的史料虽未明言乘轩车者的爵等地位，但从文意来看可以肯定不会是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攻人曹国，“数之(曹臣)，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注：“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左传》闵公二年记：“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

以上史料表明，轩车是卿大夫贵族乘坐的马车。关于轩车的形态特征，《说文》曰：“轩，曲辂藩车也。”藩车即舆栏有藩蔽的车，轩车的特征即在于舆栏有藩蔽，用途广泛，卿、大夫贵族均可使用，而与墨车等各级贵族专有服车有别。“鱼轩”“犀轩”之名则缘自轩车藩蔽鞮革的不同。《左传》闵公二年杜注释“鱼轩”曰：“以鱼皮为饰。”《左传》定公九年正义曰：“鱼轩以鱼皮为饰，犀轩当以犀皮为饰。”

4、士之服车

《周礼·春官·巾车》曰：“服车五乘：……士乘栈车。”栈车也见于其它文献，《考工记·舆人》曰：“栈车欲弇。”《诗·小雅·何草不黄》曰：“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有栈之车”即栈车。

笔者认为，《周礼·春官·巾车》所记栈车为士之服车是成立的。《诗·小雅·杕杜》曰：“檀车幘幘，四牡瘖瘖。征夫不远。”檀、栈音义相通，檀车即栈车。《诗经》中出现的檀(栈)车均与戎事有关，《诗·小雅·杕杜》

曰“檀车幘幘，四牡瘖瘖。征夫不远”，《诗·小雅·何草不黄》：“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大雅·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骖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可见《诗经》中的这些檀(栈)车都是战车。西周、春秋时期的战车乘员均为士以上的贵族，尤其以士为主体，因而《诗经》以士之栈车指代战车。

《说文》曰：“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可见栈车的形态特征是简陋朴素。《周礼·春官·巾车》郑玄注曰：“栈车不革鞮而漆之。”《考工记·舆人》曰：“栈车欲弇。”郑玄注曰：“为其无革鞮，不简，易圻填。”郑玄认为栈车因无鞮革而舆栏易外倾，故而舆栏应内敛即“弇”，笔者赞同此说。栈车又作辘车，《左传》成公二年曰：“丑父寝于辘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杜注：“辘，土车。”正义曰：“辘与栈，字异音义同耳。”由于栈车无鞮革，舆底木材之间有缝隙，因而蛇“出于其下”。

总之，栈车的主要特征为无鞮革，迳以竹木素材为车，较为简陋。战车又称檀车(栈车)，也是因为战车数量大，损耗快，因而普通战车不可能像贵族服车那样有华丽车饰，而以竹木素材为主要原料。士无栈车，笔者认为就是因为轩车藩蔽有鞮革，士服车无鞮革因而士不能乘轩。

三、装饰性车马器

以车马器彰显等级，则这些车马器必然以装饰功能为主、实用功能为辅。古文獻中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车马器与车马制度之间存在联系，后人或根据文献记载，或根据考古发现予以推断。

1、高级贵族专用车马器

从考古发现来看，铜轭、轴饰、马冠基本上仅发现于大墓中。尤其是轴饰、马冠发现较少，但凡有明确出土记录者无一例外都发现于高等级大墓中。因此这三种车马器应当是大夫以上贵族专用车马器，轴饰、

马冠的等级可能更高。

轴饰、马冠不是必不可少的车马器,因此作为装饰性车马器为高级贵族所专用。车轭虽为马车上必不可少的功能性部件,但木轭上包裹的铜轭则非必需之物,因此也成为高级贵族专用车马器。西周金文中屡见“赐轭”的记载,一般称为“金轭”即铜轭。但也有例外,毛公鼎铭文曰:“赐女(汝)……右轭。”^⑥木轭是无需赏赐的,因而右轭应是指辘右服马的铜轭。铜轭还分左、右单独赏赐,这其中似乎隐含着车马制度的内容,即可否同时使用左右铜轭可能与高级贵族的具体等级有关。

2、各级贵族依礼使用不同数量组合的车马器

这类车马器与贵族用鼎一样,不同等级贵族使用不同数量的同类车马器。从考古发现来看,銮铃便属这种车马器。

已有学者指出,《诗经》言“八銮”者均指诸侯级贵族的马车。例如《商颂·烈祖》“八銮鸛鸛”系颂扬殷商先王,《大雅·韩奕》“八鸾锵锵”颂韩侯,《小雅·采芑》“八鸾玼玼”颂宣王卿士方叔,《大雅·烝民》“八鸾喑喑”赞美樊国国君仲山甫,因此推测只有周王、诸侯、与诸侯爵等相仿的王之卿士这类高级贵族的马车才能用八銮^⑦。笔者受此启发,对发现完整銮铃组合的西周、战国时期车马坑与墓葬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两周时期的车銮存在一车二、四、六銮的组合,但未发现一车八銮的组合。

西周时期的车銮组合有一车二銮和一车四銮。目前发现有完整銮铃组合且墓主明确的西周车马坑,有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车马坑 G1(四銮)^⑧与长安斗门镇西周中期车马坑 M3(二銮)^⑨,这两座车马坑的主墓白草坡 M2、斗门镇 M15 从墓葬规模、随葬礼器等方面来看均非诸侯级墓葬。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墓 II M253 嵌在墓室北壁的一个车衡上有完整的四銮^⑩,该墓从墓葬规模、棺椁重数、随葬礼器的种类与数量判断,墓主等级比前两座车马坑的主墓

要高,但又不及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墓葬。可见西周时期二、四銮的组合适用于卿大夫。

东周时期车銮不再流行,但少量发现的东周车銮仍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已发现的东周时期完整的銮铃组合有两例,均为六銮,所属车马坑为辉县固围村战国时期 131 号车马坑^⑪,与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 K2^⑫。131 号车马坑葬有 19 辆车,所属墓葬已被盗扰殆尽,但据闻该墓仅编钟便出土了至少 24 件,墓主当为魏国诸侯或卿。马鞍冢 K2 葬有 23 辆车,主墓虽然被盗,但墓葬规模甚大,墓主为楚王应无疑问。虽然战国时期的车銮已无西周时期那样强烈的礼制色彩,但这两座战国车马坑均出现六銮组合当非偶然,从中或许可窥见西周古制:六銮组合很可能在西周时期已有,为卿以上贵族马车所用。

虽然可确定为一车八銮的考古材料迄今尚未发现,但《诗经》有关八銮的诗句应有所本,不会是纯粹的艺术夸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周时期的车銮以偶数组合标志着贵族的等级高低,与周代的用簋制度相似,即诸侯八銮、卿六銮、大夫四銮、士二銮。鉴于《诗经》未言天子用八銮,因此周王用銮可能超过八銮。东周时期随着礼制的变迁更迭,车銮不再具有标志等级地位的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四、车体部件

已知蕴含着车马制度的车体部件还很少,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车较。较是车舆侧栏(即车轆)顶端向外伸出的扶手状木结构,车较有重较(两轆均有较)、单较之分,所对应的马车等级也不同。

《诗·卫风·淇奥》曰“倚重较兮”,毛传曰:“重较,卿士车也。”该诗颂扬幽王卿士卫武公,毛传“卿士”实指王之卿士,与诸侯爵等相同。考古发现的先秦重较车亦仅见于诸侯墓葬,包括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车舆^⑬,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楚王墓陪葬车马坑 K2 的四辆有盖安车^⑭。此外秦

陵一、二号铜车均有重较^⑤，由此推测周王之车也是重较。因此，周代重较应为天子与诸侯级贵族马车所特有。

虽然先秦文献没有出现单较的记载，但有重较就应有单较，单较也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太原金胜村战国早期赵卿墓陪葬车马坑四、九号车^⑥，和甘肃平凉庙庄战国晚期墓 M6 墓内随葬的马车^⑦均仅左辕有较。这两座墓葬墓主身份分别为卿与大夫，可见单较车属诸侯之卿大夫贵族所有，士车应无较。

结 语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齐卿庆封聘于鲁，“其车美”，鲁大夫曰：“服美不称，必以恶终。”车马装饰僭礼而被认为将有“恶终”，可见车马装饰在标志贵族等级地位、维护统治秩序方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对车马装饰与等级制度的关系展开专项系统研究，将为先秦礼制的探索拓宽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方法与内容。

从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周代车马装饰表现等级差别的方式主要为三种：一是以某类车马装饰的有无来体现等级高低，例如鞅革、车较，以及轴饰、马冠等。二是以车马装饰的数量组合表现等级差别，例如樊纓、銜铃、车较，铜轭可能也属于这类情况。三是以车马装饰的形态差异表现等级差异，例如彩绘与髹漆。这三种方式与两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制度内涵颇为相似。周代不同等级贵族的车马装饰往往同时使用以上三种方式来彰显地位尊卑，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又成熟的规制，并为秦汉以降的舆服制度所继承。

①《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②曾永义：《〈仪礼〉车马考》，《〈仪礼〉复原研究丛刊》第 79 页，台中书局 1971 年。

③“辂”又通“路”，指天子、诸侯所用之车。郑玄注《周礼·春官·巾车》释“路”曰：“王在焉曰路。”贾

疏补证曰：“言‘王在焉曰路’者，谓若路门、路寝、路车、路马，皆称路，故广言之。……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诸侯亦然。《左氏》又以为行于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门寝之等，岂亦行于路乎？”王所在曰“路”，若后世所谓“御用”之意，因而周王所用之车曰辂或辂车，例如《诗·大雅·韩奕》曰：“王赐韩侯，……乘马路车。”

④《尚书·顾命》孔疏引马融、王肃云：“不陈戎辂者，兵事非常，故不陈也。”

⑤《周礼·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郑众注：“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关于孤卿的记载也见于《大戴礼记·王事》。

⑥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⑦杨英杰：《战车与车战》第 22 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⑧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 2 期。

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 1 期。

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 48 页，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⑫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阴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0 期。

⑬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309 页，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阴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 10 期。据报告描述，K2 的四辆有盖纵长方舆安车有车耳，车耳屏蔽车轮，此即车较。但报告未提供详细情况与图片。

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⑰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5 期。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北京辽金石刻刻工

宫氏家族考

周峰

在北京辽金两代的历史上，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刻工宫氏家族在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到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的长达 169 年中，始终活跃在刻石活动中，见于石刻的其家族成员有 10 余人。这一家族作为石刻刻工家族活跃在历史上的时间之长，留下的石刻之多，在中国历史上虽不敢说是绝无仅有的，但也确实是世罕其匹的。^①

一、宫氏家族刊刻的碑石、墓志

除了房山云居寺石经外，目前发现的宫氏家族所刻碑刻、墓志共计 11 种，涉及宫氏家族成员 9 人。

1. 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 该碑是目前所发现的除了房山石经外年代最早的宫氏刻石，立于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四月，此碑现存房山区青龙湖镇北车营村谷积山灵鹫禅寺。碑通高 254 厘米，宽 94 厘米，碑阳正书 20 行，满行 40 字。^② 碑末记“河南郡宫士金刻”。该碑碑阴刊刻《师德华严七处九会千人邑会之碑》，但字迹漫漶，其刻工也应为宫士

金。

2. 马直温等为太夫人建陀罗尼经幢

其题记文字不长,全引如下:“奉为先内翰、侍郎太夫人特建尊胜陀罗尼幢。长男静江军节度使、知顺州军州事、开国侯直温,次男洛苑副使、前随驾锦透背皮毛库副使内温,小男安州防御使、知中京诸军都虞侯、开国子处温,长孙乡贡进士、内供奉班祗候梅书。伏以欲报昊天鞠育之鸿恩,惟仗诸佛宣传之密教。刻之贞珉,树于先莹。期覆影以霏尘,愿觅佛而阐法。时天庆元年岁次辛卯四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丙时建。刻石宫士全。”^③可见此幢立于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刻工为宫士全,他也参与了房山石经的刊刻。另外马直温家族的石刻还有其妻张馆墓志。^④

3. 史洵直墓志 此墓志刊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1956年出土于昌平区西城墙下。墓志正方形,边长62.5厘米。志文楷书,27行,满行30字,字迹清晰,字体端秀。^⑤志文末刻“河南宫士永刻书”,可见刻工宫士永不但能刻,而且有较高的书法水平,其文化程度想必也不低。

4. 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 1991年发现于北京宣武区天宁寺塔刹座内,辽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立。碑石方形,边长48厘米,厚8厘米。^⑥建塔者为“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耶律淳,也就是后来的北辽天锡皇帝。碑末题“宫亨刻”。

5. 张岐墓志 此墓志刊刻于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志石正方形,边长56厘米。^⑦志末刻“河南郡宫世存□□”,宫世存肯定是该志的刻工。

6. 武德将军幢 建于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题记末刻“中都河南郡宫福昌刻”。^⑧

7. 吕徽墓表 1991年出土于丰台区石榴庄凉水河南岸,该表表身为四角方柱形,每面高205厘米,宽56厘米,四面共刻楷书31行,满行27字。建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由金代著名书法家蔡珪篆额,正文

则由另一著名书法家任询撰写书丹。^⑨表末刻“宫伯元刻”。

8. 时立爱神道碑 原在河北省新城县北场村时立爱墓前,现存河北省博物馆。该碑立于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由金代著名文人李晏撰,赵沅书丹,党怀英篆额。碑末题“永安宫济摹□”。^⑩

9. 张汝猷墓志 刻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志石长89厘米,宽91厘米,志文39行,满行38字。^⑪志文末刻“永安宫济刻”。

10. 鲁国大长公主墓志 1980年出土于丰台区米粮屯,刻于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鲁国大长公主是金世宗的长女,下嫁乌古论元忠。志文正书43行,满行42字,共1088字。由金代著名文人周昂撰写,著名的书画家庞铸书丹并篆盖。^⑫末题“张伯玉、宫琢刻”。

11. 杨瀛神道碑 1991年发现于房山区石楼镇石楼村西,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四月十六日立。碑主杨瀛为“奉议大夫、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兼劝农安抚事”。^⑬碑文末题“古□宫琢刊”,□可能是“燕”字。

二、房山石经的主要镌刻者

曾毅公先生从房山石经题记中辑出辽代宫氏刻工10人,即“宫士永、宫士全(疑即宫世全)、宫太奴、宫宁哥、宫世宁、宫世全、宫世纯、宫佛奴、宫金佛奴、宫垣”。^⑭现将《房山石经题记汇编》^⑮一书所载辽代宫氏刻工详载如下,其中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为该书页码。

大宝积经

吴极 吴 宫善 卷五条十三 304

宫太奴 条十四 304

宫恒 卷七条十九 305

宫善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点书
卷七条二十一 305

宫恒 宫匠 卷十条二十九 305

宫重熙十一年六月日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点书鐫 宫善卷十二条三十六 305

宫□ 卷十五条四十四 305

宫太奴

重熙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点书鐫 宫太平 卷十八条五十四 306

华手经

宫世纯 宫宁 宁哥刻 上面了 卷二条二 356

菩萨地持经

宫士全鐫 燕台逸士张龙图书 卷一条一、二 435

宫宁哥刻 张龙图书 条九、十 435

宫士全刻 条三、四 436

宫世纯刻 张龙图书 条十三、十四 436

宫金佛奴刻 张龙图书 条十五、十六 436

宫世纯刻 书 条十九、二十 436

杨忠信书 宫金佛奴 条十七、十八 437

菩萨善戒经

宫士全刻 邓中益书 条十七、十八 438

殿试进士贾致君书 宫士全刻 僧法玄书 条五、六 438

宫世纯刻 刘师倩书 条七、八 438

宫金佛奴刻 豫韶书 条十一、十二 438

宫士全刻 张龙图书 条十三、十四 439

宫金佛奴刻 条十五、十六 439

宫宁哥刻 僧行杰书 僧行杰书 条十七、十八 439

宫宁哥 张龙图书 条七、八 439

底一面世纯刻宫佛奴刻一面 张龙图

书 宫世纯刻 条九、十 439

宫宁哥刻 张龙图书 杨□□ 条十三、十四 439

宫宁哥刻 张龙图书 条七、八 439

宫金佛奴 卷五条一、二 440

宫佛奴 条九、十 440

宫士全刻 行杰书 条十一、十二 440

僧行杰书 宫宁哥刻 条十三、十四 440

宫金佛奴 条三、四 440

宫士全鐫 行杰书 条九、十 440

宫士全刻 杨忠信书 条十九、二十 441

宫士全刻 卷八 条一、二 441

净业障经

宫士全刻 江应祥 条三、四 442

大乘三聚忏悔经

宫士全刻 杨忠信书 条三、四 452

佛说文殊悔过经

宫宁哥刻 张龙图书 条十七、十八 453

大智度经论

宫金佛奴刻 孟士端书 条十五、十六 458

孟士端书 宫士全刻 条十五、十六 461

赵祁书 宫世纯 条五、六 465

宫士全鐫 沙门善雍书 条三、四 465

宫士全刻 宋谦书 条五、六 476

宫士全刻 宋谦书 条十九、二十 476

瑜伽师地论

宫士全刻 条十一、十二 482

宫士全刻 卷二条十一、十二 482

宫世纯刻 条十一、十二 482

宫世纯刻 条五、六 484

宫世纯刻 张龙图书 卷九十一条三、四 489

宫佛奴刻 张龙图书 条七、八 489

宫士全刻 条十九、二十 489

宫士全刻 条九、十 489

宫士全刻 张龙图书 条五、六 489

宫世纯刻 张龙图书 卷九十五条一、二 490

宫世纯刻 张龙图书 条七、八 490

宫士全刻 张龙图书 条九、十 490

张龙图书 宫纯刻 卷九十六条一、二 490

宫士全刻 张龙图书 卷九十八条三、四 491

由上引史料可见,宫氏刻工有宫士全、宫世纯、宫纯、宫金佛奴、宫佛奴、宫宁哥、宫宁、宫太奴、宫太平、宫恒、宫善、宫匠等12人,其中并无曾毅公先生提到的宫士永、宫世宁,另外曾先生提到的宫垣应为宫恒之误。上述12人中,宫纯可能是宫世纯的简写,宫佛奴可能是宫金佛奴的简写,宫宁可能是宫宁哥的简写,而宫太奴、宫太平很可能是宫太平奴的简写,宫匠可能是某位宫氏刻工的代称。如此,则该书所载宫氏刻工有宫士全、宫世纯、宫金佛奴、宫宁哥、宫太平奴、宫恒、宫善7人。宫氏家族参与刊刻了大宝积经、华手经、菩萨地持经、菩萨善戒经、净业障经、大乘三聚忏悔经、佛说文殊悔过经、大智度经论、瑜伽师地论9种佛经,这些佛经大多篇幅较长,宫氏家族所刻条数也颇多,堪称辽代刻经的主力。

三、宫氏世系及其他

目前已知的宫氏家族成员有宫士金、宫士全、宫士永、宫世存、宫亨、宫伯元、宫福昌、宫济、宫琢、宫世纯、宫金佛奴、宫宁哥、宫太平奴、宫恒、宫善15人,他们生活在至迟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到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的长达169年中,如

果以25年为一代的话,则他们分属于至少7代人。据上引史料,完全生活在辽代或辽金之际的有宫世纯、宫金佛奴、宫宁哥、宫太平奴、宫恒、宫善、宫士金、宫士全、宫士永、宫亨、宫世存11人,完全生活于金代的有宫伯元、宫福昌、宫济、宫琢4人。其中最晚见于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的宫琢应为该家族中最晚的一代,见于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和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的宫济很可能是他的同辈人。见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的宫伯元和金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的宫福昌大概是同辈人。他们和最晚的宫济、宫琢之间应该还有一代。

在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刊刻的大宝积经中见有宫太平奴、宫恒、宫善3人,他们和宫金佛奴、宫宁哥、宫亨应该是最早的两代人,但具体世系难以辨明。从太平奴、金佛奴、宁哥等名字中可看出,当时的宫氏家族不仅笃信佛教,而且其命名习惯受到了契丹人的影响,一部分人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契丹化的现象。但是随着辽朝的灭亡,宫氏家族的命名方式完全恢复为汉族的方式。从宫氏家族成员的名字中,还可以明显看出有“士”和“世”两辈,其中最早的宫士金见于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最晚的宫世存见于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明显“士”字辈要早于“世”字辈,其关系可能是上下辈。

综上所述,宫氏第一、二代有宫太平奴、宫金佛奴、宫宁哥、宫恒、宫善、宫亨6人;第三代“士”字辈有宫士金、宫士永、宫士全3人;第四代“世”字辈有宫世纯、宫世存2人;第五代有宫伯元、宫福昌2人;第六代失载;第七代有宫济、宫琢2人。当然,以上的分析都是根据史料推论得出,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在前引史料中,有7条提到宫氏家族的籍贯,有“河南郡宫士金”、“河南宫士永”、“河南郡宫世存”、“中都河南郡宫福昌”、“永安宫济”两条、“古燕宫琢”。可见宫氏的祖籍是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其家族入辽时间不详,我认为很可能是辽太宗

耶律德光灭亡后晋时,被掠到燕京。随着时间的推移,宫氏家族在辽南京(燕京)和后来的金中都居住时间的延长,其籍贯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整个辽代,宫氏家族仍以籍贯河南郡自居,而到了金代宫福昌这一代时,其自认为是“中都河南郡”人,也就是寄籍在中都的河南郡人。但到了最晚一代时,则自称“永安”人,“古燕”人,“永安”是北京在海陵王时曾用过的名称,这里“永安”和“古燕”都是中都的代称。至此,宫氏家族已完全将自己视为中都的土著,完成了籍贯观念的转变。

在长达 160 余年的刻石活动中,宫氏家族在北京辽金两代的刻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他们刊刻了包括石经在内的数量很大的石刻。第二,宫氏家族服务的对象多为统治阶级的高层,这其中包括北辽皇帝耶律淳和金世宗长女鲁国大长公主以及大量高官显宦。第三,宫氏家族所刻碑文、墓志多出於名家撰写并由名家书丹,如蔡珪、周昂、党怀英等人都是当时的一流文人。第四,宫氏家族在长期的刻工生涯中,对自身的文化素养的培养也较为重视,其家族的文化水平也较高。有些家族成员也善于书法,如宫世纯在刻经过程中也写经,宫士永书写并刊刻了史洵直墓志等。尽管宫氏家族除了在石刻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之外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一代代宫氏刻工却在这碑铭文字中获得了不朽。

①另外,据叶昌炽《语石》卷 6 所载,北宋的安

氏刻工家族也延续了 100 余年。“余按北宋一朝碑版,安氏刻者为多,其最先者为安宏、安仁祚,自建隆迄徽、钦之际盖百余年,而其泽未艾也。”

②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③据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菁华栏所刊拓片录文,该拓片国家图书馆编号为:各地 1624。

④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166-168 页。

⑤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年,第 172 页。

⑥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25 页。

⑦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284 页。

⑧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95 页。

⑨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96 页。

⑩该碑拓片见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菁华栏,国家图书馆拓片编号:各地 5118。

⑪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第 217 页。

⑫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第 219 页。

⑬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第 157 页。

⑭曾毅公:《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80 页。

⑮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万寿寺东路建筑群的历史变迁

孔祥利

万寿寺建筑群经明清两代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东、中、西三路并存的局面,建筑规模庞大,风格独特。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至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本文主要讨论万寿寺东路发展变化的历史情况。

一、明代万寿寺东路形成的时空依据

明代万寿寺已经有了东路,但是它的形成不在万寿寺建立之初。据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载:万寿寺“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鼓楼、天王殿,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湑具列。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最后果园一顷,标以杂树,琪株璇果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顷有奇。”^①敕建万寿寺碑文在万历六年(1578)立,即万寿寺建成之后的当年,在碑文中已经把万寿寺的全部建筑殿堂包括方丈、厨房、浴室都列出来了,而且将其列在石山之前,说明万寿寺兴建当初的五进院格局已经囊括了寺院所需的各种功用建筑,尚不存在东路建筑。

那么万寿寺东路是何时得以兴建的呢?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与永乐华严钟(即永乐大钟)于万寿寺悬挂之时,即大钟钟楼兴建之时为起点。

永乐大钟为何要悬于新建成的“藏经香火院”万寿寺,这个问题笔者以前在相关文章中已经有所论述,主要原因为:永乐大钟名为华严钟,它是一口佛钟,因它周身刻有佛经,它作为佛经传播的一种载体而一直收藏在汉经厂。汉经厂是皇家收藏佛经之机构,又有为皇家从事诵经祝寿的功能。万寿寺取代汉经厂并承续相应的功能,因而有大钟迁移万寿寺并悬挂撞击之举。^②

据文献记载,永乐大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才移至万寿寺,也就是万寿寺兴建后的第三十年。选择这个年份移钟的基

本依据是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风俗移钟要占卜择吉，永乐大钟要在吉年吉月吉日吉时实施迁移工程。据明代文献记载：“西郭外万寿寺，今上所建，大内出一钟，成祖时少师姚广孝监铸。铸时年月日时皆丁未，今徙置之日为六月十六日，亦四丁未相符，事亦奇矣”。^③ 根据择吉结果，这个吉日吉时选择在丁未年丁未月丁未日丁未时，即四丁未。移钟时间定在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午后举行。这一时间的干支恰好是四丁未（年月日时皆为“丁未”干支），被认为十分吉利。为何要选择在丁未年，是因为丁未的纳音五行为水，即“天河水”，大钟五行性质为“金”，与“水”恰好为相生关系。相关佐证见笔者《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卧考》一文。^④

华严钟移至万寿寺后，安置在寺院东侧前端。据《长安客话》载，“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仪容钟”。^⑤这里所说的大道即万寿街，隔街即为玉河（今长河）。

永乐大钟钟楼为何要建在寺院东侧，而不是中路呢？因为万寿寺中路建筑已经健全，不可能再添建新建筑。所以要在寺院的一侧增建钟楼。为什么不在寺院中路改建钟楼悬挂华严钟呢？一方面，从中路建筑群的体量上看，原有的钟楼与寺院整体建筑相匹配，但是难以容下永乐大钟，如改建扩建，势必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不可能把已有的钟楼拆除再新建一个钟楼，因为无法使悬挂永乐大钟的钟楼与其它建筑相匹配，它确实需要增加较大的建筑体量。所以，永乐大钟迁移至万寿寺不能在中路动用建筑设施，也因此只能在寺院中路之外的地方另起钟楼建筑。实际上，新的钟楼就建在寺院中路钟楼的外侧，也就是寺院的东侧前部。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华严钟不是普通的佛钟，所以它也不能被作为配属物悬挂于建筑的配殿偏房一侧，而需要悬挂于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加以供奉。所以华严钟钟楼建筑在寺院东路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其他相关文献也有佐证记载：

据《宸垣识略》载，万寿寺“左钟楼，前

临大道”^⑥，这里所说的“左”，不会是寺院中路内的“左”，因为它“前临大道”，与《长安客话》记载相同，寺院中路第一进院的钟楼怎么能“前临大道”呢？它的建筑面向是朝西的，而西侧则是寺院的中轴区域，并不是寺前大道。这充分说明华严钟楼不在寺院中路，而是在寺院左侧即东侧，并且钟楼建筑的面向是朝向大道的，也就是朝向西南，因为万寿寺建筑坐东北面朝西南。万寿寺坐向问题见笔者论文《万寿寺中路建筑群的五大格局》^⑦。

文献中所说的“前临大道”，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大钟钟楼建立之初，寺院东路并不存在院墙建筑，虽然钟楼在临大道之位置，但前面并无院门之类的建筑，而是直接面对大道，所以有此记载。

又据万寿寺内所存《重修药王殿碑》记载，也说明大钟钟楼在寺院东路。碑文记载：“入寺，前殿已毁，殿基立巨钟，钟高可二丈余，大六围，……盖明永乐时所铸。”这里所说的入寺，应为寺院东路。因为“前殿已毁，殿基立巨钟”中的前殿，当指永乐大钟钟楼。为何作者把钟楼称为前殿呢？笔者分析是因为钟楼建筑宽阔，形如殿堂建筑规模所致，而且还因为钟楼建筑在寺院东路中轴线的位置，而一般只有殿堂才会在居中的位置出现。因为永乐大钟钟楼居于寺院东侧，而不受寺院对外关闭之限，可随时接受游人观赏，因而出现大量文人墨客描写永乐大钟的诗赋。寺院中路通常仅于佛祖诞辰日才对民众开放半个月，届时有庙会举行。

所谓“前殿已毁”的意思，是说在明天启年间曾发生的拆除钟楼的事情。据文献载，永乐大钟“至天启中，置不复击，卧地上”^⑧。永乐大钟在万寿寺悬挂撞击十余年后，国家发生了内乱，兵变和起义之事扰乱了朝廷，“近年有讹言帝里白虎方不宜鸣钟者，遂卧钟于地。”^⑨巨钟卧地原由的相关论证见笔者论文《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卧考》。卧钟的举措必然出自于朝廷，因为永乐大钟为皇家佛教法物，万寿寺又为皇家

寺院。钟楼虽撤,但大钟作为巨物,移动艰难,所以有“卧地上”的结果,也自然就在原位下落于地,故有“殿基立巨钟”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讨论永乐大钟钟楼为何建在寺院东路第一进院的问题。由前所述,永乐大钟钟楼兴建前,万寿寺东侧并无建筑,所以,钟楼建在与中路一进院平行的位置,临街面水,已作为第一进院处理。如果按堪舆理论分析,大钟的悬挂自有讲究。易理河图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为阳数,六为阴数,一六同居坎宫”之说,故第一进院按易数五行属水,而大钟本体五行属金,所以在这里建钟楼有取“金生水”之意。在这里取“金生水”之意,还在于万寿寺建于长河之滨,广源闸之西,广源闸处有龙王庙,为祈雨、祈水之地。所以在这里建钟楼悬钟也含着以钟利水的吉利意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大钟“日供六僧击之”^⑩,取六名僧人每日击钟,其“六”数也是金水相生的寓意。

明代万寿寺僧人的活动特点是在太监的管辖下进行佛事活动,所以击钟活动表达了皇室的意图,也是万寿寺取代汉经厂当年由官员进行佛事活动的作为。寺院僧人在中路诵经祝福皇帝万寿,在东路则是以击钟表达这个意愿。

我们通过《重修药王殿碑》可以得出相关结论:永乐大钟的钟楼立在万寿寺东侧前首之后,东路建筑随后有了发展。永乐大钟钟楼不会出现孤零零地在寺院东路立足的局面,在钟楼的后面出现其它寺院建筑是必然的趋势。

《重修药王殿碑》立于清康熙年间,碑文中谈到寺院东路在康熙年间重修的情况,因为是重修,说明东路的药王殿在明代就应当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乾隆初年间。

《重修药王殿碑》碑文这样记载:“人寺,前殿已毁,殿基立巨钟,……盖明永乐时所铸。殿后阁前,罗汉松七八株,……过药房,……上大禅室。”这里所说的“殿后阁前”的殿,应当是指所谓前殿之后的正殿。

笔者认为它就是药王殿。因为碑文讲的是重修药王殿,工程以药王殿为主,所以正殿必为药王殿。由此可知,药王殿应当在钟楼之后。“殿后阁前”中的阁应为毗卢佛阁,见碑文“戊午遂建毗卢佛殿五楹于药王殿后。”碑文中所提到的药房则应当在毗卢佛殿之后。毗卢佛殿则是此次修缮工程新增建的。而药房之后应当是方丈室,即“大禅室”。由此可知,万寿寺东路在明代期间,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建有悬挂永乐大钟的钟楼,二是建有药房并建有供奉药王的药王殿;其主要建筑有:钟楼、药王殿、药房、方丈室。

至于为何在万寿寺东路建药房,碑文没有记载,我们在其它文献上也没有查到相关记述。万寿寺东路为何要建药房,笔者认为应当与万历皇帝重视万寿寺有关。万历皇帝重视万寿寺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是为万寿寺赐田庄共九顷七十亩,见《宛署杂记》^⑪记载。二是巡幸万寿寺,在万寿寺用餐游赏,据《长安客话》载,万历皇帝于万历十六年(1588)巡幸万寿寺假山,在山亭内用膳,寺僧因“上曾于此尚食”,对此山亭“不敢启视”^⑫。三是万历皇帝的替身僧在万寿寺修行。据《万历野获编》载,万历替身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⑬,主持寺院的佛事活动。所以万寿寺的相关活动总与万历皇帝休戚相关。因此在这里建药房也必然与万历皇帝之需有关。我们从《重修药王殿碑》第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一些原由(因为碑文字迹斑驳无法确定全部含义):“万寿寺在西直门外六里,一侧药房□□,明后宫□□□(药王)殿,以祀药王者也。”这里提到了“后宫”二字,可见药房及药王殿的营建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与万历皇帝有关。

二、清代万寿寺东路的修复与改建

据《重修药王殿记》记载,万寿寺东路在清康熙年间没有得到皇室的修复。东路

的修复靠的是寺院主持及僧人们的自发努力。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与圆明园兴建同时,万寿寺中路得到大规模修复及扩建,寺院由五进院扩为七进院。清乾隆《京城古迹考》记载,万寿寺“殿宇九层,巍焕如新”^④。这是乾隆初年大臣励宗万对万寿寺进行考察的记录,但是这个考察没有说万寿寺东路建筑的情况,《重修药王殿记》刚好补充这方面资料的不足。

康熙年间清皇室为何没有实施修复万寿寺东路的工程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永乐大钟尚还卧地于东路前殿(即钟楼),由于钟楼是前朝因故拆除的,清皇室没有必要和理由将它恢复起来;(二)在康熙皇帝修复寺院中路之前,东路已经由寺院僧人动手修复了,而且已经接近完成(据《重修药王殿》载,东路建筑修复工程从康熙十七年(1678)开始,至康熙二十年(1681)主要建筑已经修缮完毕,康熙二十八年(1689)全部结束,历时11年);(三)中路建筑群曾在顺治年间被火焚毁,应当说,康熙皇帝可以通过完全恢复和扩建寺院主体来表达对佛祖的崇敬,而东路建筑群相对独立于万寿寺中路,因为它本身就供奉主佛毗卢佛。

为何寺院僧人仅修复寺院东路而不修复寺院中路呢?笔者认为,当时僧人所聚集的财力有限,而且中路建筑殿堂高大,非巨资不足以修缮,只有皇室才有那样的实力修复本属皇家的寺院,所以东路由寺院僧人自发地进行修缮,是因其规模较小。其所修缮的范围仅包括重修药王殿、新建毗卢佛殿及其配殿。从修缮的工程时间上看,长达11年也说明他们的力量有限。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东路只有钟楼没有修复,这是因为寺院僧人没有能力对其进行修复,大钟的悬挂是件巨大的工程。关于这段记述,碑文是这样记载的:

“上人法名圆亮,沙河人。饭罢,上人谓余曰:某幼穉发得以□□忠寺。康熙乙卯侍吾师显荣止叔门藏,吾师示寂后,戊午遂建

毗卢佛殿五楹于药王殿后。辛酉复建配殿。□□□□□己巳修山门、茶棚,至今以茗饮行者无虚日。某住持二十余年,虽不敢谓戒行相因,然寸阴之惜亦□□□常顾得大法护,以文字作功德,为某记之。磨此石久矣,而未得其人,今法护惠然肯临,当为某立此碑。余闻其言而笑曰:戒毁于惰,而成于勤,行易其苦,而予以甘。上人可谓戒行相因者矣。余自谬□□皇上持远达知仰图报效于校讎之役,兢兢惟谨,以此去寺数里,竟未得过而闻焉。正今值圣驾北狩,自公有暇,始得此山水友朋一日之乐。而上人乃不以余为不文,而以碑相属,得以附名不朽,余何敢辞。于是记以归之。……”

此次修缮除重修药王殿外,重要的是新建了具有五楹规模的毗卢佛殿及配殿,这是当时住持圆亮对寺院建设的功绩,他的作为使万寿寺东路的规模在清初得到了扩大。

万寿寺于清初的这次修复活动,源于寺院在顺治末年被焚毁,据明末清初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的描述,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的一天夜里,万寿寺忽遭大火吞噬,寺院大部分建筑都被焚毁了。这把火把万寿寺建筑烧得面目全非,连多数寺僧都无法在寺中焚修了。孙承泽在题为《经万寿寺志感》的诗前小序中称:(万寿)“寺乃万历初所造,为母氏祝釐,最为巨丽。己亥二月,余在退谷,寺僧报夜毁于火。”^⑤

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皇室还顾不上修复万寿寺这座皇家寺院,只有在康熙皇帝开始营建畅春园时,才顾及到万寿寺被毁的情形。这与万寿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皇家需要使它成为驻蹕之所,所以康熙那次修复增建了行殿。

寺院主持圆亮是在康熙初年就跟随师傅来到万寿寺的,所以有在康熙十七年修复万寿寺东路之举。

万寿寺东路在康熙年间重修后,一直延续到乾隆初年无变化。到了“乾隆八年(1743),皇上命移兹寺内(觉生寺)”^⑥,寺院东路存放的永乐大钟终于迁移至了觉生



万寿寺天王殿

寺，寺院东路建筑群中才少了这一重要文物。但这时寺院东路建筑群尚无变化。

至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为其母后祝寿，重修寺院中路(见乾隆十六年《御制敕修万寿寺碑记》^①)，这时寺院东路才得以全面修缮。因为永乐大钟的迁移，寺院东路已经不很规整。清皇室对此进行了特别的规划。因为这次改动后东路不再供奉主佛，也就是不再设佛殿，寺院东路此时才真正成为寺院的组成部分，而不再独立存在。东路的性质定为僧人生活区，所以东路的建筑群依据这种需求建设，而且与一般寺院僧人区的建设已经无大区别。在前部设库房、十方院、厨房、大斋堂等基本设施的一组四合院落。这组四合院的主要功能是僧众的生活活动区域。东路最后端(与中路终端平行)新建一组方丈四合院落。这种格局彻底地改变了东路原有的建筑组合，使原来东路的建筑全部消失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万寿寺再度得到重修(见《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②)。在斋堂院其后增建法堂等四合院落建筑。法堂四合院的主要功能是集僧众讲经说法之所。法堂与方丈院之间为法坛设立之处，为集合僧众讲经之场所。

万寿寺东路建筑群作为中路的附属建

筑，其建筑体量和规格也全部低于中路。方丈院主建筑用五楹硬山大脊，凸显方丈的地位不一般。其它院落主建筑则多用卷棚顶，建筑色调为灰色，整个东路建筑呈现僧人清静无为的生活氛围。三组四合院以穿廊连接，穿廊之西为中路建筑。

清代东路建筑群的兴起具有特殊的意义。东路出现后，寺院僧人得以增加，特别是能够接待四方游僧的到来。

①见《张太岳文集·敕建万寿寺碑》。

②③见《北京文博》1996年第1期《万寿寺永乐大钟迁移悬钟考》一文。

④⑤⑥⑦见《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国朝苑圃)。

⑧⑨见《长安客话》卷三《万寿寺》。

⑩见《宸垣识略》卷十六。

⑪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3期。

⑫⑬见《帝京景物略》卷五《万寿寺》。

⑭见《宛署杂记·万字》。

⑮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京师敕建寺》。

⑯见《京城古迹考·万寿寺》。

⑰见《天府广记》卷三十五。

⑱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房山岫云观

建筑沿革及相关史实考

韩建识

岫云观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琉璃河北岸的琉璃河中学院内,建于明代,坐北朝南,现仅存三进殿及其后楼廊,是研究明代建筑工艺的实物资料。2003年岫云观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①对岫云观的论述较少有人涉及^②,本文试对岫云观建筑沿革及相关史实加以考证。

一、岫云观创建年代

一种观点认为,岫云观落成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是奉明世宗敕命而建的行宫。^③其根据是清《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京畿·良乡县”：“嘉靖十八年四月己亥,良乡离宫成。初帝命于琉璃河阳建离宫,至是造成。庚戌,帝次良乡离宫。”(《肃皇外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岫云观创建于明代,但具体年代不详。^④笔者认为,岫云观应建于明代,但没有材料证明,岫云观曾为明代离宫。首先,《钦定日下旧闻考》在讲到良乡离宫时,并没有把它与岫云观相联系;其次,〔民国〕《良乡县志》卷一“舆地志”载:琉璃河“阳有明之离宫”,同书卷六“纪幽志”又有恩惠寺(岫云观在明代和清代中早期称恩惠寺)的描述^⑤,也没有把两者相联系;另外,立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九月的《重修恩惠寺记》载:“自

郡城而南百余里为琉璃河,乃万国朝宗所必由之地,旧有恩惠寺,圯坏日久……”^⑥,该碑并没有把恩惠寺与良乡离宫联系起来。根据现存岫云观建筑,其建筑形制属明代;《福德庄严碑记》称恩惠寺为“敕赐护国恩惠十方招提禅寺”^⑦。因此,笔者认为,恩惠寺应为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前的明朝敕赐寺庙。

二、明万历年的重修

位于琉璃河边的恩惠寺,因日久圯坏,明代万历年间,御马监太监张赛请内帑及众人捐助,鸠工庀材,对其重修。工程始于万历戊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仲春(二月),落成于万历己酉(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季秋(九月)。主要整修了佛殿僧寮及垣墙庖厨等,又在衢路修建十方院,为路人提供茗饮^⑧。重修后的恩惠寺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方丈伽蓝殿、祖师殿、天王殿、金剛殿、两廊僧寮,周围群房、钟鼓楼、山门、牌坊等,其基址东至潘桥等,南至琉璃河,西至陈文道,北至马家坟,共管业地二百七十一亩。经顺天府良乡县奉屯田道监察御史请旨除籍钱粮,用于恩惠寺焚修。又于万历三十七年春奉旨铸造渗金大毗卢佛一尊,投佛舍利一颗,渗金三世诸佛三尊,渗金迦叶一尊,渗金阿难一尊,渗金观音菩

萨一尊,渗金铜殿太子佛一尊,渗金坐相韦驮一尊;添置五大部华严经十二部,诸品经忏俱各二十四部,蟒衣一件,玉带一条,永镇山门大铜钟一口,铜殿钟一口,铜铮钟一口,铜云牌一面,大铜香炉一座,小铜香炉一座,大铜烛台一对,大铜花瓶一对,大小铜磬二口,大小锡香炉三十五碗、大小锡烛台十四对,大小鼓三面,日月幡二首,经袱十二个,桌帏十二个,僧袈裟十二顶,以及桌椅等^⑩。

三、清代恩惠寺

岫云观中立有一通《恩惠寺地亩告示碑》,碑文记载:“特授良乡县正堂即补分府加十级、纪录十次王为,勘明庙中地亩,据呈刊碑以垂久远。事照得:良乡县属之琉璃河有兰若一区,名恩惠寺,基拓前朝,地当畿甸,黄金布地,人间开舍卫之城,白玉为阶,座上显文殊之相,诚庄严之绀宇,亦清静之禅关也。庙中向置地亩四顷有余以资香火,有寺僧碧峰者,清规不守,法界难容,身虽舍乎伽蓝,经闻闹乎梵呗。前县吕公屢开觉路,难出迷津,乃复觊觎地亩,未除贪戒。由是该绅耆等别招僧人方山在庙主持。迨本县莅官斯土,碧峰仍呈牒申诉,冀遂私图。现在契据无存,已经本县讯明,将庙中地亩段落四至载於卷帙,谕令方山经理,旧契作为废纸。从此晖台鼎返,合浦珠还,智炬慧灯放光明於宝座,斋鱼粥鼓资供养乎香花。爰勒贞珉,永留金利。特示!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立。”^⑪由碑文可知,同治年间,恩惠寺有香火地四顷有余,寺僧碧峰不守清规,觊觎地亩,当地绅耆等另招僧人方山主持庙中事务。当本县新官到任后,碧峰仍呈牒申诉。由于旧契据已不存在,经县衙讯明,将庙中地亩段落四至载于卷帙,谕令方山经理,旧契作废,碧峰被驱逐。

据〔光绪〕《良乡县志》记载,恩惠寺在清光绪朝仍为京南大刹,有正殿三层,殿之东厢洞房曲室,极其幽胜,殿后有藏经阁储经,所藏储经书全部为明朝时内廷颁发^⑫。

四、清末宣统年间岫云观的重修

1959年在岫云观中有一通碑,记载了清末宣统年间重修岫云观的过程。《重修岫云观碑记》载:“昔人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人寰中淋宫绀宇,崇峨巍焕,历久常新,游览者流连瞻眺,咸归功于创建之初。抑知风霜剥蚀,兵燹销沈尘劫,几经沧桑易变,非有尊德乐道之杰士光先烈而扩宏修,其不至委弃榛芜,难寻基址也,盖亦仅矣。张君云亭、姚君兰荣俱当代之名流也,奋迹云天不忘田舍,生平硕德善行不胜枚举,而於创修寺院、点缀山林尤乐于提倡护持,不遗余力。李君万福亦近时声施卓著者也,慨念琉璃河岫云观本为畿南名刹,曾经素云道人刘师诚印、连捷道人高师诚义擘画营葺,气象庄严。庚子之乱,毁于伏莽,几至楼舍成墟。因同张姚二君子建议重修,二君子躬先发起布施,无年诶吉程功,复有张君元福悉力劝勤,共成盛举,鸠工庀材,楼阁再起,较旧日规模益加高旷。凭栏远望,遥山之层叠,近水之回环,莫不收入一览,奇情妙趣触处层生。一方之文明风脉汇萃於斯,闾阎崇廓,万象更新,粒粟世鲜,亦大千之巨观也。为明神荐馨香,为重镇增名胜,张子及诸君子之功德固超出寻常万万矣。明霁不文,奚足纪述徽美。惟目睹云房之轮奂,心识羽众之皈依,且深知继住开来,尤非一代伟人,不克担荷钜任,敢不揣固陋叙陈崖畧,俾后之经历此邦者,群晓然于经营缔造之苦心,庶几名贤济美可以并垂不朽也夫。

白云观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明霁敬撰并书。

李万福、张云亭、姚兰荣、张元福重修。

宣统三年岁在重光大渊献 九月毅旦立石。”^⑬

碑文中提到的“素云道人刘师诚印”即刘素云,法篆诚印,河北省东光人。光绪时为宫廷内务府副总管,为内务府总管李莲英之副手^⑭。后成为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弟子,曾为白云观护坛化主。自幼好

善，儒道兼优，又长心计。当时白云观财力久屈，于是同治十年(1871年)募捐五千余金，光绪八年(1882年)募捐七千余金，光绪十年(1884年)募捐九千余金，这些捐款或为传戒费，或修屋建舍，或刊板印经，或重勒观内碑文。光绪甲申(1884年)秋，在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高云溪的支持下，他倡议开创了“龙门岔支霍山派”，太监从此有了自己的道

派，归为全真龙门道徒^⑤。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自捐三千余金，为“长春永久供会”之资。刘诚印还修建了妙峰山中北道^⑥及宏恩观等30多座寺庙^⑦。光绪二十年(1894年)羽化^⑧。

据〔民国〕《良乡县志》记载，光绪年间，恩惠寺又经重修，重修后的恩惠寺，金碧辉煌，较以前更加壮丽，每逢正月初九日，游人毕集，士女如云，一片太平景象^⑨。笔者认为，县志中提到的重修，应即《重修岫云观碑记》中所载素云道人刘诚印、连捷道人高诚义对岫云观的“擘画营葺”，刘诚印卒于



岫云观后罩楼

光绪二十年，因此，恩惠寺重修并改称岫云观的时间应在1894年前的光绪年间。

琉璃河岫云观为畿南名刹，经素云道人刘师诚印、连捷道人高师诚义擘画营葺，气象庄严。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楼舍几成废墟。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李万福、张云亭、姚兰荣、张元福等捐资重修岫云观。鸠工庀材，使楼阁再起，其规模较以前更加高旷。凭栏远望，遥山之层叠，近水之回环，尽收眼底。

五、民国年间的岫云观



岫云观三进殿

1884年秋，刘诚印创立“龙门岔支霍山派”，太监归为全真龙门道徒。刘诚印“自壬申岁(同治十一年，1872年)兴修福慧、双泉二寺，凡见有荒庙废祠，无不力任筑削，务使气象更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⑩，其目的，一是为了扩大自己影响，二是为了解决太监日后出宫栖身之处。刘诚印等修缮岫云观也应有此目的。民国初年，清末帝溥仪被

逐出紫禁城,宫内太监也被逐出,一部分流落到岫云观,所以当地人又称“岫云观”为“老公庙”^④。

六、解放后的岫云观

20世纪50年代末,岫云观被琉璃河初级中学占用。一部分建筑已被拆除,仅存三进殿及其后楼阁、戏楼等,庙已不成格局(见图一),且各殿门窗及内部均改。现将其当时规模与形制依次叙述于后:

1. 戏楼: 面阔10米,进深6.5米。小式硬山筒瓦大脊兽头。前出轩,面阔8米,进深5.5米。大式悬山筒瓦元宝顶,檐柱四根,丁头拱雀替,苏式彩画。

2. 过厅: 面阔5.5米,进深5.5米。大式歇山筒瓦调大脊,吻垂戗兽,每边檐柱四根,苏式彩画,丁头拱雀替。前后石级各为一出五级。两旁有小式悬山筒瓦顶走廊各五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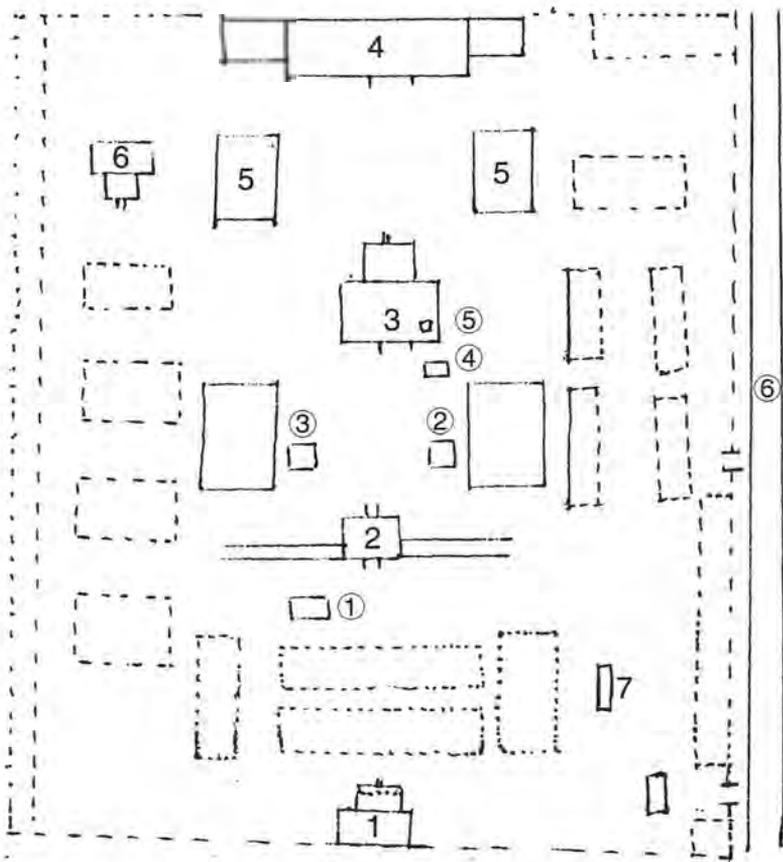
3. 后殿三间: 面阔13.8米,进深12米。大式硬山筒瓦调大脊吻垂兽排山滴水,旋子彩画。内为五架梁,金柱四根。后带大式悬山筒瓦箍头脊垂兽顶之抱厦,面阔9.5米,进深3.5米。

4. 后罩楼五间: 面阔21.5米,进深7.5米。大式硬山筒瓦调大脊吻垂兽排山滴水,上下两层。前出廊。中层

为栏板,滴珠。两旁有耳房各三间,建于高台上,与楼相连。面阔7.5米,进深5.5米,亦为大式硬山筒瓦调大脊吻垂兽带排山滴水之顶子。

5. 东西配殿: 前后两层各三间,面阔10.5米,进深7米。前为大式硬山筒瓦箍头脊垂兽,后为调大脊吻垂兽,均为苏式彩画,石级一出五级。

6. 祠堂三间,在后西配殿西侧,面阔7



说明:①捐资碑

②重修恩惠寺记

③福德庄严碑记

④重修岫云观碑记

⑤县谕碑志

⑥公路

1. 戏楼

2. 过厅

3. 后殿三间

4. 后罩楼五间

5. 东西配殿

6. 祠堂三间

7. 侧殿三间

图一 20世纪50年代末岫云观平面示意图

米,进深4米,大式硬山筒瓦箍头脊垂兽排山滴水。前出悬山筒瓦箍头脊垂兽顶之轩,面阔3.5米,进深2.5米,石级一出七级。

7.侧殿三间,面阔9米,进深6.5米,大式硬山筒瓦箍头脊垂兽顶,前出廊,丁头拱雀替,石级一出五级^①。

1984年,岫云观被琉璃河中学使用。仅存三进殿三间、后罩楼五间及其两旁耳房各三间。三进殿和后罩楼为庑殿顶。后照楼内楼梯已改为水泥制。三进殿成为琉璃河中学库房,后罩楼一层为校办工厂,二层为校用库房。据考,后罩楼下层曾名三清殿,上层曾名吕祖阁^②。

作为“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工程之一,6月14日,岫云观修缮工程开工,年底完工。施工单位为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共投入95万元,修缮面积698平方米。主要对两座建筑屋顶残缺部件进行了补配,恢复三进殿室内地面方砖及室外青白石台阶,恢复后罩楼传统楼梯等^③。

①北京市文物局编:《文物工作实用手册》,华龄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25页。

②杨亦武先生在《明清行宫》一文中有所论述,见杨亦武著:《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353~355页。

③杨亦武著:《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353页;北京市文物局编:《文物工作实用手册》,华龄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25页。

④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1版,第475页;北京市房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市房山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560页。

⑤周志中修、吕植纂:〔民国〕《良乡县志》卷一“輿地志·山川”,第5页。

⑥⑩周志中修、吕植纂:〔民国〕《良乡县志》卷六“纪幽志·招提”,第78页。

⑦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

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明九),第5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7页。

⑧⑩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福德庄严碑记》拓片,索书号:北京9928。

⑪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清二十三),第83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201页。

⑫陈崑修、黄儒荃纂:〔光绪〕《良乡县志》卷六“纪幽志·招提”。

⑬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清三十),第9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⑭见李养正编著《新编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34页。

⑮见李养正编著《新编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05~506页。

⑯奉宽著《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初版,第133页。

⑰见《宏恩观碑记》、《素云刘先师碑记》,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清二十七),第8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75页、129页。

⑱见〔日〕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发行,昭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印刷,第37页、第158~159页。

⑲《素云刘先师碑记》,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清二十七),第8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129页。

⑳《明清行宫》,杨亦武著《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355页。

㉑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1959年1月《岫云观文物古迹调查表》。

㉒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1984年8月《岫云观单体建筑调查表》。

㉓见《北京文博》2004年3期,第98页;2004年6月17日《北京娱乐信报》。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博》编辑部主任)

恭王旧影

周劲思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是晚清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他为维护满清政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程。近年来史学家们围绕奕訢展开了诸多研究,奉其为“洋务运动领袖”、“近代改革家”的论点渐占主位,赞誉他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探索富国强兵途径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如引进第一批西方武器、购置第一支近代化舰队、开办第一所近代学校、第一次深团考察西方等等。其实还有一个第一值得关注,那就是奕訢也是满清贵族中第一个接触并接受西方摄影术的亲王,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留下了由不同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这些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不仅非常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恭亲王奕訢的个人形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恭亲王的着装习惯、社会交往,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等情况,是非常真实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老照片反映出真实的恭亲王奕訢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对一个人的记录除了画像就是文字描述,其中难免受主观因素影响。翻开清史档案卷宗,有关奕訢相貌性格的描述仅是寥寥数语,且多溢美之词,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广颡,秀眉目,举止安详,仪表清超,对人无多语,而辄中窈要。”^①拜见过奕訢的何刚德也在他的《春明梦录》中赞扬说“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见面行礼不还,然却

送茶,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颇久,人甚明亮。”^②然而与他有过接触的一些外国人说词却有所不同,如英国人芮尼在《北京及北京人》中这样记载:“恭亲王表情很和善,是个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颊上长了两个伤疤,显得有点脏,可能是两个小伤疤。他的脸和手很小,手指纤细,有点女气。”^③而另一位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则说:“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在的,他的外貌并没有像在场的其他内阁大臣那样给我留下那么好的印象;然而用照相学的角度来看,他的天庭确实非常饱满。他的目光敏锐,静坐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异常坚毅的神情。”^④很显然,在外国人眼中恭亲王奕訢的外貌并不像中国官员所描述地那样仪表堂堂,伟岸气派,那么到底谁说得更客观准确呢?

目前笔者找到的恭亲王肖像照共计四张,分别拍摄于他青年(图1)、中年(图2)和老年(图3、图4)时期。从这几张照片来看,奕訢的相貌具有爱新觉罗家族的典型特征,削瘦的长脸、饱满的额头,小眼睛,长鼻梁,虽然谈不上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但也确实如中外史料所记述的,气质中既有亲和友善的一面又充满了威严和坚毅,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比较而言外国人对他的外貌描述显然更为客观、真实,看来恭亲王的地位和权势还是非常影响当代人的记录,或多或少总有美化。

另外,在外国人的记载中,对恭亲王的穿着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是非常难得的。只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他们的认识有



图1 青年奕訢



图2 中年奕訢



图3 奕訢与奕劻合影



图4 晚年奕訢

颇多不实之处,通过与老照片的对比研究,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从而加深对大清王爷穿着服饰的了解。如芮尼说恭亲王:“右手拇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白底红面的玉石戒指。”^⑤其实恭亲王右手拇指上戴得并不是戒指,而是一枚玉扳指。他中年时坐在假山石前的那张留影,就很清晰地显示出他搭于岩石的右手拇指上正戴着一枚扳指。扳指最早是中国古代弓箭手套在拇指上用来方便拉弓射箭、保护手指的小物件,比戒指要宽,它有玉、骨、皮等多种材质(见图5)。清代,由于八旗满人崇尚弓马骑射,所以盛

用扳指,后来虽承平日久,武功荒废,却仍喜爱以扳指为饰物,于是女人用镯戒,男士著扳指,成为旗人的一个特色,尤以翡翠扳指为贵。对于自小便文武双全,既通经史又擅骑射的恭亲王来说,喜爱佩戴扳指更在情理之中,至于对玉石“白底红面”的形容,则应该是指珍贵的翡翠或是俏色为红色的白玉。

就恭亲王的衣着,芮尼分别有两段描述,一则为:“(恭亲王)身着海獭皮皮袍,外罩紫色马褂,他的帽子是普通的那种鞞鞞帽,上翻的部分衬有黑丝绒。帽子上端是一



图5 左:翡翠扳指;右:白玉巧雕辈辈封侯扳指

个深红色的丝球，而不是顶子和显贵们所戴的孔雀翎。亲王脖子上戴着两串项链，其中一串是琥珀色的珍珠，另外一串是红珊瑚色的大珍珠。每串项链上都缀有精美的玉石，随着辫子垂向身后，他脚蹬一双黑缎靴。”^⑥另一则为：“身穿一件紫色的，绣有黄龙的锦缎官袍，它们分别在胸前、肩膀上和背后用金线绣成直径为八英寸的圆圈。他带着一顶边缘往上翘的官帽，除了在顶戴处有一个红绸做成的旋纽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装饰”。^⑦对比照片发现，芮尼第二则文字描述的衣装与青年奕訢着朝服像的穿戴非常接近，只是其中有不少误解。首先两段文字中所描绘的帽子应是一种，但它既不能被称作鞞鞞帽也不是普通的官帽，而是清代非常珍贵的“红绒结顶冠”。据清代礼亲王昭槤《啸亭杂录》记载，此冠属皇宫中皇子皇孙尊贵的礼服。近支的王爷、贝勒只有在得到皇帝赏赐后才能将之作为常服冠戴，而其他辅臣即使得到赏赐也不敢戴，只有康熙时的重臣张廷玉曾蒙皇帝特旨准许在元旦日冠戴，被看作非常了得的荣耀。这种帽子的材质并不值钱，却大大胜过那些顶上镶有红宝石、东珠、孔雀翎等贵重物品的帽子，因为这种帽子更多代表的是荣誉和身份地位。显然恭亲王奕訢也得到过皇帝赏赐的这种“红绒结顶冠”，在与英国公使会谈的重要场合，他郑重地把它与绣有团龙的补服搭配穿戴。再有，恭亲王脖子上佩戴的是清代帝后大臣着朝服时必须戴的朝珠，芮尼不了解它特殊的结构，可能作为一名普通军医也不能近距离接触大清朝的王爷，所以把它误看为两串项链了（见图6）。

二、老照片折射出奕訢不同时期的交往和心态

奕訢的这四张照片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由不同的摄影师为他拍摄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到1889年或更晚。有意思的是，这三四十年正是恭亲王从一个初涉政坛个性率真的青年皇子，成长为阅历丰富、行事果敢的政治家，而后再成为看破世俗、超然物外的闲散王爷的岁月。仿佛恭亲王轰轰烈烈而又一波三折的命运就浓缩在这几张小小的照片里。通过研读这些照片背后的内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恭亲王奕訢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交往和精神状态。

这张青年朝服像拍摄于1860年11月2日，这是目前留传最早的恭亲王照片，也是最早的大清王爷的留影，比醇亲王奕譞最早的照片还要早三年。照相的起因是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和谈成功并签署



图6 珊瑚朝珠

了《北京条约》后，又正式到英国公使额尔金的住处回访。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意大利人费利斯·贝阿托乘机给他拍摄了照片，一张为侧面照，一张为正面照。因为当时的额尔金还没住进后来正式用作英国公使馆的淳王府，而是强行住进了怡王府，因此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就在怡王府内。照片中的奕訢面容清隽，

表情肃穆，他虽然在尽力摆出亲王的威严神态，但紧锁的双眉还是透露出了心底的悲凉和忧郁，这当然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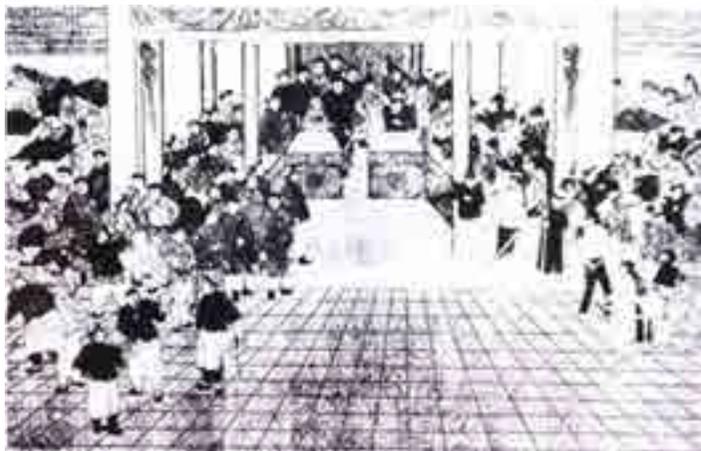


图7 奕訢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1860年对于恭亲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在咸丰帝出逃热河，英法联军直逼京城的情况下，奕訢临危受命留守北京。他作为第五位“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与英法联军进行了艰苦谈判，虽然最后终因力量悬殊他签下的是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但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他促成了英法退兵，维护了清皇朝的统治（见图7）。通过这一次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俄使伊格那提耶夫面对面的交锋和交流，奕訢积累了外事经验，增长了见识，从而成为清皇室贵族中冲破“天朝大国”虚骄作风，以平等礼节与外国人交往的第一人。外国人也认为他不像前几任和谈钦差那样无能和排外，而是思想开明、有办事能力，并在离京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中国外交事务仍归恭亲王专办。和谈成功，使奕訢在国内与国际都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他不仅为清政府争取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他个人的成长和壮大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而他随后所倡议的建立新型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展近代

军事和工业的洋务思想，都发端于他此次与西方世界人和事的深入接触。尽管有上述的种种收获，但恭亲王奕訢的内心依然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和痛楚，正如他自己所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作为天朝大国的显贵王爷，一方面他感到了耻辱和危险，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一展才能，为大清朝尽忠效力。

1861年他果断地联合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夺取了大清国实际最高统治权。此后他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一直在谋求着国家的振兴与富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积极维护与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创办同文馆（见图8），培养具有科学知识的西学人才；发起洋务运动，振兴中国的军事和工业；重用汉将名臣，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反清大火。在他的努力下，清朝一度出现了史称“同治中兴”的繁荣局面，而他本人的政治抱负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1871年的便服照，正表现了走向政治辉煌的中年恭亲王的精神面貌（见图2）。

这张照片，从背景的假山判断拍摄地点应在恭王府花园的滴翠岩。对比年轻时



图8 同文馆

的照片，人到中年的恭亲王看起来更加深沉和成熟。他目光深邃，表情严肃，非常有派头地坐在一把中式圈椅上，右手扶住岩石，左手紧贴左腿，十个手指伸得笔直，显示出一种异常的严谨和坚定。照片的拍摄者是英国旅行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他于1871年来到北京，经美国传教士、时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介绍认识了奕訢。丁韪良是奕訢的老朋友，早在1863年就因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被美驻华公使蒲安臣介绍给总理衙门诸大臣，受到奕訢和文祥的称赞，后被聘为同文馆国际公法教授。1869年他任同文馆总教习，积极筹划着加强和扩大同文馆，颇得奕訢青睐，赠他“冠西”两字，夸奖他对中国的了解较其他西人为上。有这种良好关系的铺垫，奕訢愉快地接受了约翰·汤姆森的来访，并允许他进入戒备森严的恭王府为自己拍照，同时还赠送他许多中国丝绸。由此可以看出，奕訢与西方人士的交友面非常广泛，上至各国驻华公使，下至传教士、摄影家，他都乐于接触，这使他保持了思想的开明和视野的开阔，从而鹤立于当时愚昧落后的满清贵族。汤姆森对恭亲王也评价甚高：“他是一位有敏锐理解，开放意识强和比较自由观点的人。他是被公认的中国政治家中的一派的领导人，他是知名的进步派。”^⑧

然而功高震主，声誉日隆的奕訢在他走向事业高峰的同时也屡次遭遇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贬斥。从1861年到1884年，他有三次被罢免一切官职的经历，如果说前两次慈禧和同治帝仅是想煞煞他的威风，给他一点警告的话，那么第三次则是慈禧太后政治经验日益丰富，并形成以她为中心的新的势力集团后的必然之举。1884年，她借口对法战争奕訢委蛇保荣、未奉全力而导致战败，革除了奕訢及他所领导的全体军机大臣，其中对奕訢的处罚最重：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从此奕訢过了十年闲适自由、超然物外的生活。历经几十年宫廷喧嚣、宦海沉浮，此时的恭亲王奕訢对人性、对人生都有了

较之常人更为透彻的认识和感悟，终日只是与一些诗友们吟诗唱和，畅游山水，人也变得随和而低调，这就是我们在后来的照片中所见到的已知天命的恭亲王，恬淡而随和。

恭亲王晚年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与七弟醇亲王奕譞的合影，名为昆仲联床图，是1889年由天津的著名摄影师梁时泰拍摄的（见图3）。照片中两位亲王分坐于嵌螺钿红木长椅的两端，中间隔一小炕桌，恭亲王坐右手位，醇亲王坐左手位。这一年恭亲王58岁，赋闲在家已经五年，此时的他，神情中少了一些锐气，而多了一些随和，看起来更像一位邻家长者。而另一张恭亲王的单人照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见图4）。这张照片具体的拍摄年代目前不详，但应该晚于上述合影，因为恭亲王的面容已更加苍老。他身穿家居长袍坐于凳上，右手随意搭在身旁的茶几边缘，表情和善，面露笑意，似乎正在享受着“富贵祝来何所遂，世间难得自由身”的惬意。不过如果仔细端详这两张照片，还是能感觉到他神情中所流露出的那份失落与寂寞。

晚年的恭亲王，生活十分简单，除游历山水、与家人闲聚听戏外，也就是引几位诗友吟诗唱和而已，其中最主要的诗友也就两位，一位是与他共事多年，情谊深厚又共同遭贬的原军机大臣宝鋆，另一位则是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正如他自己所说：“年来闲居无事，惟以集句自娱，日与佩蘅相国及扑庵弟往来唱和，几无暇晷。每忆昔人有文战、笔战、酒战、茗战、棋战等名，今戏以诗战命题。只取兴到笔随，不尚勾心斗角”。（佩蘅即宝鋆，扑庵即奕譞）^⑨由此来看，奕訢当时已彻底远离了官场，而且交游甚为有限，一方面他作为被贬之人，为免猜忌有意在封闭自己；另一方面在官场名利圈中，毫无权势的奕訢已没有多少吸引力了。1891年奕訢六十寿辰的庆祝会上，前来恭亲王府的贺客仅六人而已。这与当年奕訢声势显赫时恭王府贺客盈门、车水马龙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这样的现实

问题，奕訢内心又怎能不油然而生出一丝失落呢？（见图9）



图9 《点石斋画报》中“恭邸养痾图”

三、老照片体现出奕訢对摄影的接受和喜爱

恭亲王奕訢自幼长于皇宫，对很多新鲜的、外来的事物并不了解和熟悉。1860年之前，当西方的摄影术已经由香港而在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传播时，他还没有机会接触这一新鲜事物。因此1860年11月2日，当外国摄影师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他时，他很受了一番惊吓。英国陆军司令克灵顿对此有过记载：“在条约签订仪式的过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贝阿托先生很想给‘北京条约的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恭亲王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他先转过脸去看了一下额尔金勋爵，又转过头来盯着我，以为他对面的这门式样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

转阴为晴。”^⑩这种情形对于堂堂大清国的亲王来说不免有些尴尬，不过奕訢的确是

一位思想开通、善于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的人，虽然第一次的照相经历并不愉快，但他并没有排斥，仅仅8天后，他就配合外国摄影师拍摄了那张广为流传的青年照，由此他也成为清皇室贵族中第一个接受这一新生事物并留下影像的亲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判断，另一个较早留下摄影照片的大清王爷是醇亲王奕譞，那是1863年他作为醇郡王管理神机营时在北京南苑军营所拍，时年24岁（虚龄），巧合的是，这两位最早留下摄影照片的大清王爷，一生都喜爱摄影。1889年两人的那张昆仲联床图就是奕譞亲自带了他的御用摄影师、广东人梁时泰，前往恭亲王府邸花园与奕訢所拍，事

后兄弟俩均为此事题写了诗文以作纪念。奕譞题写的七绝为：

垂髻就傅随肩事，忍忆连床媵两人。
入座春风思启迪，放怀秋水拟精神。
九重仙篡心同感，百八灵珠指试轮。
别寓岁寒相勸意，梅前分化放翁身。

诗下特意题注：“己丑五月二日趋谒六兄，得饫天厨肴核，旋共照洋法小相于秋水山房肖，兄与余年岁数合牟尼遂并岸梅咏及”。后来奕譞的《九思堂诗稿续编》收入该诗时又注道：“端午前三日，携照像人梁时泰谒六兄邸园秋水山房前偕照联床图二幅，……因念兄年五十有八，余亦年届知命，斯图斯情不可无诗以纪，爰成四韵，用志怡怡。”^⑪由此可见他是把照相留念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做。

而奕訢也于第二天看到照片时即赋诗两首赠与七弟，一为“即和元韵奉酬”，诗中写道：

方寸巧心通万造，古来知者竟谁人。
年年衰老交游少，默默忘言暗合神。
一曲酣歌还自乐，四时吹转任风轮。
雁行云掺参差翼，为有烟霞伴此身。

他称赞照片是“方寸巧心”，并在诗的题注中特意说明：“照像之技始自西洋，曩昔都中鲜有知者，近年流传日广，中土之人肄此业者甚夥，其精巧迥有过焉。”^⑧流露出他对西洋先进之术开明而赞赏的态度。看到影像中的自己，他总是感慨万千，这在另一首“题照像山房闲坐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诗中这样写道：

半潭秋水一房山，顿隔埃尘物象间。
自笑微躯长碌碌，逍遥心地得关关。
陶庐僻陋那堪比，谢守清高不可攀。
忽喜叩门传语至，殷勤为我照衰颜。^⑨

此外，在奕訢的《萃锦吟·卷六》中也能找到一些他关注照相的蛛丝马迹，如第435页中有“自题友松啸竹图小照一律”，第436页又有“再题歌唐集句图小照二律”，第471页还有“友松啸竹图小照分寄潭柘岫云戒台万寿二寺各留一幅以誌香火因缘并纪一律”，这些诗作均写于他57岁时。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说明这些诗作里所说的小照就是照片，但根据其它的文字内容判断，在奕訢的概念中图和照都是有专指的，小照就应当是照片。看来闲赋在家的奕訢不仅把吟诗唱和当作一乐，也对拍摄生活照、景物照充满了兴趣，而且也很珍视，否则就不会把这些照片郑重其事的送于潭柘寺、戒台寺这两个他晚年非常看重的地方了。

读影辨史，老照片是对过去生活和历史最真实、最客观的记录，镜头下的点点滴滴都是珍贵无比的记忆。如今重读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那些逝去的人物和历史仿佛又鲜活起来，令人感慨不已。恭亲王奕訢的这四张照片，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清王室成员照片，对摄影史、政治史都颇有意义，还在于它们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将之串联起来，能够反映出恭亲王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些奕訢的生活细节，是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①沃丘仲子著：《近代名人小传》上册，第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8页，转引自董守义《恭亲王奕訢大传》第48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③⑤⑥[英]芮尼：《北京及北京人》第1卷，第42~43页，转引自[英]约·罗伯茨编著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7页，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

④[英]约翰·汤姆森：《携带相机走遍中国》，第233~235页，转引自沈泓《恭王府老照片初探》，见《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⑦[英]芮尼：《英国军队在华北和日本》，第184页，转引自沈泓《恭王府老照片初探》，见《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⑧罗哲文：《恭王奕訢及其僚属的两帧老照片》，见老北京网(<http://www.oldbeijing.net/Article/200501/6570.shtml>)。

⑨奕訢：《萃锦吟》卷四，第27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印行。

⑩亨利·诺利斯：《1860年中国战争中的事件：克灵顿将军私人日记汇编》，爱丁堡和伦敦：威廉·布莱克伍德父子出版公司，1875年，第209~210页。转引自沈泓《恭王府老照片初探》，见《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⑪溥任：《旧影和墨宝》，《紫禁城》第36期第38页。

⑫奕訢：《萃锦吟》卷八，第617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印行。

⑬奕訢：《萃锦吟》卷八，第618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印行。

（作者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馆员）

明代人殉考略

化 蕾

人殉是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陋俗。人殉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转化，或父系氏族制已经确立的时期，起因据分析主要有：其一是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从奴隶劳动中所得的剩余产品很少，有时还不能养活奴隶自己，所以奴隶主对奴隶毫不爱惜；其二是当时人们对自然、对人自己的生理缺乏认识，认为人死了，肉体虽然消灭了，但灵魂在阴间也要和在阳间一样，得到与他们活着时依据社会地位而有的相应的享受。^①

人殉制度到了殷商时期最为鼎盛。从考古发掘的商代贵族墓中，发现了大批殉葬者的尸骨，这些墓葬中少则殉一、二人，多则二、三百人。根据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一文统计，已发掘的商代墓中，共殉近四千余人。^②周代人殉之风依旧盛行，《墨子·节丧》中称：“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见人殉已经相当的制度化。史载“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

至战国末年，由于铁器工具的发现，农耕技术的改进，生产力逐渐发展，于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人本思想萌芽，人殉逐渐受到非议，开始多以陶俑、木俑来代替。公元前384年，秦献公下令废止人殉。但这一禁令即使其子孙也没有遵守，秦始皇死后，“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③

西汉初年，制度性的人殉正式被废除。汉宣帝时，赵缪王刘元因逼迫奴婢16人殉葬，遭到了撤消封国的处罚。唐太宗李世民

去世后，跟随太宗多年的两个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杜尔和契苾何力铭感于太宗的知遇之恩而自请殉葬，被刚继位的高宗皇帝李治所禁止。

但在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人殉这一丑陋现象却一直没有禁绝。唐武宗病危，他平日宠信的王才人对武宗说：“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自经于幄下。《宋史》中也看出宋代亦有妃嫔殉葬之事。宋高宗宠幸才人李氏、王氏，高宗驾崩后，孝宗探知此情，即迫告命，让她们自便，实际就是胁迫她们自杀，殉高宗之葬。从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亦可看到元代的人殉现象。书中说：“挑选四十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④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历代人殉之不绝。1971年在洛阳东关发掘到东汉晚期的墓葬，内殉有10人，男女各5。近年来凤翔县境内抢救出土一座唐代古墓，其中亦有两具殉人朽骨。

汉代以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人殉现象虽不乏记载，但终究属于零星发生，那种制度性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杀殉毕竟已不复见。但人殉这一惨绝人寰的制度，在时隔千年之后，在明代却又死灰复燃。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棣死后，以两名王妃殉葬。首开明代妃嫔、宫女殉葬之恶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崩，葬入孝陵。《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明朝小史》卷三亦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46名妃嫔、宫女随朱元璋一同葬入孝陵，其中38人皆为治丧期间勒令从死。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

制度又为朱元璋的后代子孙所效仿,重新成为一种制度,制造了大量人间悲剧。

其后,成祖朱棣的长陵有从殉妃嫔 30 余人。^⑤

仁宗朱高炽献陵有 5 名妃嫔陪葬。据《明宣宗实录》,计有:贵妃郭氏,谥恭肃;淑妃王氏,谥贞惠;丽妃王氏,谥惠安;顺妃谭氏,谥恭僖;充妃黄氏,谥恭靖。其中贵妃郭氏身份特殊,在所见明代皇帝殉葬宫人中未见地位如此之高者。据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贵妃所出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朱邸,在例不当殉。岂街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说明郭贵妃是自愿殉葬,但也不能排除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仁宗在位仅一年,临死前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浹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就是这样,却还殉葬了 5 名妃嫔。

宣宗朱瞻基的景陵则有 10 名妃嫔殉葬。《明史·后妃传》载:“正统元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盖宣宗殉葬宫妃也。”这十名妃嫔比起许多同样殉葬却连姓氏都没留下来的那些妃嫔,多少也算是幸运了。

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在宫中被缢死,然后再装敛入棺从葬。殉死时,其状甚惨,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中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餽之于庭,餽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宫女们被吊死之前,嗣皇帝朱高炽还假惺惺地接见她们,以示褒扬。《李朝世宗实录》中还特别记载了有个朝鲜选献的韩氏宫人,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黑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一命呜呼。十年后金黑等朝鲜婢女回到朝鲜,朝鲜史官记下她们的亲眼所

见,即是《实录》中的这段记载。

殉葬的妃嫔,往往都是宫廷中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为明宣宗生殉的 10 位宫妃中,有一名叫郭爱的宫人,进宫不到一月,连宣宗的面都没见过,就被迫作了殉葬人。《明史·后妃传》中载:“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贤而有文,入宫二旬而卒。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才华横溢的郭爱临死前给世人留下了一首楚辞,字字血泪,嗟叹命运的捉弄,更声讨了吃人的人殉制度,揭下了封建帝王伪善的面具。

当时人殉不仅出现在皇帝的葬礼中,诸王的葬礼中人殉也屡见不鲜,在正史的记载中就可窥一斑。《明史·诸王传》载: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秦愍王朱樛薨,“王妃殉”。

永乐十二年郢靖王栋薨,“王妃郭氏,……遂自经”。

宣德元年(1426 年),唐靖王朱琼炆薨,“妃高氏未册,自经以殉,诏封靖王妃”。

宣德五年(1430 年),蜀靖王朱友瑄薨,“妃李、侍姬黄皆自经以殉”。

正统三年(1438 年),卫恭王朱瞻埈薨,“妃杨氏殉,赐谥贞烈”。

正统四年(1439 年),越靖王朱瞻墉薨,“妃吴氏殉,谥贞惠”。

正统四年(1439 年),周宪王朱有燾薨。因朱有燾生前曾上奏折表示“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故明英宗下旨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圣旨未到,“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诏谥妃贞烈,六夫人贞顺”。

另外,考古发掘也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2006 年年初,湖北钟祥郢靖王墓考古发掘队在清理该墓东、西两耳室过程中,发现了 6 个腐朽的棺材,证明除了王妃,当时还有六名女子为郢靖王殉葬。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正史中记载下来的应该只是少数,大概只涉及王妃及部

分有名分的女子，而没有记载的却是大多数，当时诸王葬礼都应有许多女子殉葬，而这些女子却根本连被记载下来的资格都没有，成为无名冤魂在地下陪伴着帝王。我们从上面明英宗“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的圣旨中也可以看出，诸王死后，随伺的女子本当都该殉死的，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关于这一点，正史中还有一条佐证：

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废景泰帝为郕王，不久景泰帝暴亡。据《明史纪事本末》载：“郕王薨，祭葬礼悉如亲王，谥曰戾。妃嫔唐氏等赐帛自尽以殉葬。”^④景泰帝以王礼入葬，嫔妃都被英宗逼死殉葬，《明史》说“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⑤可见诸王死后人殉几乎已成定制。

比起帝王，当时大臣死后人殉虽未形成惯例，但也比较风行。洪武十六年(1383年)，安陆侯吴复卒，“妾杨氏，年十七。复死，视殓毕，沐浴更衣，自经死。封贞烈淑人”。^⑥永乐十九年(1421年)，惠安伯金玉卒，“妾田氏自经以殉，赠淑人”。^⑦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成安侯郭亮卒，“妾韩氏自经以殉，赠淑人”。^⑧景泰二年(1451年)，昌平侯杨洪卒，“妾葛氏自经以殉，诏赠淑人”。^⑨《明史》中的记载令人触目惊心，相信同帝王用人殉的情况一样，能被正史所记载下来的也只是少数。

明代帝王的人殉制度在明英宗朱祁镇临死前被废止。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⑩英宗止殉一事，明代《翰林记》卷十五载：“天顺甲申，正月朔日以后，上不豫，每日犹裁决万几如常。至初十以来，疾大渐，乃处置后事，命太监牛玉执笔，口使书：其一东宫即位，过百日成昏；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嫔御殉；其四殡敛器服。语意详尽，皆合天理、当人心。书毕，且命牛曰：‘将去阁下看，令为我润色之。’既至，臣时等惊愕曰：‘何至是？’牛曰：‘上意亦谓事不可测，且说下，不用何妨。’臣等钦诵毕，皆叹曰：‘所言关大体，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

今，真盛德事也，不须润色。’言毕时，不觉泪下。牛备以前言复命，且曰：‘彭时尤悲愴。’上闻之亦陨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后遵行。’”明代刘定之《否泰录》则载：“高庙、文庙、仁庙、宣庙皆用人殉葬，至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子孙勿复为之。’”^⑪

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宪宗即位后，遵从了英宗的遗诏，没有用妃嫔和宫女给英宗殉葬，之后直至明亡，基本未再发生逼死宫人殉葬的事情。^⑫成化四年(1468年)，辽靖王朱豪壘上奏嫡长子恩镛亡，“欲以其妇冯氏、妾曹氏殉。上贻书切责之，令移其妇妾于宫中，供养如法，毋使失所”。^⑬诸王入葬也基本禁绝了人殉。

因此，英宗废止殉葬之举得到了群臣的称颂，后世史官亦赞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⑭清代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说：“夫以宫人殉葬，自是乱政，罢之宜耳，何足谓为盛德哉？考贤等当日捧手诏颂扬，犹属臣下之体，而史臣据以为夸美，殊未考英宗之始末也。”^⑮诚如清人所说，宫人殉葬本不当有，但若英宗不废止，不知道要到几时方休，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生命惨遭杀戮。仅从此点而言，英宗功不可没。

那么，英宗为什么要废止人殉呢？史书不载，无从查考。但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出，英宗废止人殉的想法似乎并非一时之念。正统四年，英宗才只有13岁，周宪王朱有燾薨，英宗即下旨“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年少的英宗即出手制止过殉葬。令人不解的是，他又曾亲自逼死过景泰帝诸妃。英宗当时刚被景泰帝幽禁了七年，充满了对景泰帝的仇恨，恨及其家人，做出反常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见的。笔者还设想，明英宗止殉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据《明史·后妃传》载：宣宗孙皇后为贵妃时，“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宠益重。……而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英宗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不知道，但他的母亲肯定就是可怜的宫女中的一员，或在孩子被夺走

的时候就被杀害，或有可能在宣宗死后被迫殉葬。思及母亲，英宗对宫人的凄惨命运较之其他皇帝总会多一份怜悯。可能正是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促使他最终决定废止令人发指的殉葬制度的。据《明史纪事本末》载，景泰帝死后，英宗本打算让景泰帝废后汪氏也一同殉葬，后大臣李贤劝道：“汪妃虽立为后，即遭废弃，与两女度日，若令随去，情所不堪，况幼女无依，尤可矜悯。”英宗听了，“惻然曰：‘卿言是。朕以为弟妇少不宜存内，初不计其母子之命。’”^⑧一提母子之情，英宗便“惻然”，打消了让汪氏殉葬的念头，亦可佐证母子之情对英宗有很大的影响力。

清朝初年，人殉之制曾有一段死灰复燃，因满洲旧有殉葬之俗，贵族常以妾、奴仆殉葬。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死时，都有人从殉，从殉者有嫔妃和侍从武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努尔哈赤死后，大妃阿巴亥被逼殉葬。康熙皇帝即位后发布了禁止殉葬之令，从那以后，人殉作为一种制度，才算在中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为什么人殉制度会在明代重新出现的原因。固然这可能与朱元璋生性凶残有关，但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极度强化。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已经成为人们身上的枷锁。统治者大力提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道德，臣、子、妻相对于君、父、夫而言，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而其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妇女。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早期的人殉，殉葬者男女不限，也有很多奴隶甚至大臣，但到了明代，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子，这与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逐渐加强是一致的。

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但总的看来，程朱理学的观念在宋时还只是一种观念，到明朝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对女子守贞殉节的要求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代极力表彰贞节烈女，明太祖在洪武

元年就下过一道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⑨又令巡方督学，岁上其事，著为规条，或赐祠祀，或树坊表。明代还组织出版了一些“女教”的书，如明成祖仁孝文皇后编的《内训》，还有《古今列女传》等。这一来，对社会风气有很大推动，明代所谓的节女、烈女迅速地增加了。据《明史·列女传》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可见这种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何等的严重。

据有学者统计，“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记载的妇女，连《列女传》及其他传中附及，《元史》以前没有到60人的；《宋史》最多，只有55人；《唐书》54人；而《元史》竟达187人。《元史》是明朝的宋濂等人纂修的，明朝极力提倡贞节，所以搜罗的节烈妇较多；同时，他们的实录与志书又以很大力气记载许多女子节烈之事，所以到了清朝人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多次筛选，最后还有308人，几乎是《元史》的一倍。如果再看一下《古今图书集成》，其中的‘闺节’、‘闺烈’两部中收入的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而明代竟达近3.6万人，这些数字更清楚地显示出明代倡导贞节之剧。”^⑩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殉的死灰复燃、女子成为人殉的主要受害者，也就显得并不那么令人诧异了。为了鼓励妇女殉节，封建统治者也用上了各种手段。从上面引证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宫女殉葬都被追封为妃，王妃殉葬也都给予褒谥，大臣妻妾殉葬则“赠淑人”，给予殉葬者以至高无上的“光荣”。宣宗殉葬诸妃的册文中说：“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⑪把殉葬宫人都说成是自愿殉死，既掩盖了自身的凶残，又把殉葬者作为一种榜样，推上了所谓的道德至高点。此外，殉葬者的家属还会因殉葬者的“壮举”得到优抚。《明史·后妃传》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

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这种奖励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不仅殉葬者本人是“光荣”的，而且其家族也是“光荣”的，甚至还能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如前述成祖殉葬宫人中有一朝鲜选献的韩氏，他的哥哥即被封为鸿胪寺少卿，得益不少，于是这个哥哥居然又把另一个妹妹又送入了宫。已经有一个妹妹殉葬了，居然还又把另一个妹妹“生送葬”，人性已经完全被扭曲了。

翻开《明史·列女传》，民间殉死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卢佳娘，福清李广妻。婚甫十月，广暴卒，卢恻绝复苏，见广口鼻出恶血，悉舐食之。既殓，哭辄僵仆，积五六日，家人防懈，潜入寝室自经。后其县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诀曰：“疾愈甚，知必死。汝无子，择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呕血尽吞之，以见志。及禾歿，即自经。

高烈妇，博平诸生贾垓妻。垓卒，氏自计曰：“死节易，守节难。况当兵乱之际，吾宁为其易者。”执姑手泣曰：“妇不能奉事舅姑，反遗孤孙为累。然妇殉夫为得正，勿过痛也。”遂缢。

于氏，颍州邓任妻。任病，家贫，药饵不给，氏罄嫁笥救之。阅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绾一于夫发，自绾其一，抚任颈哽咽曰：“妾必不负君。”纳指任口中，令啖为信。任歿三日，缢死。

州又有台氏，诸生张云鹏妻。夫病，氏单衣蔬食，祷天愿代，割臂为糜以进。夫病危，许以身殉，订期三日。夫付红帨为诀，氏号泣受之。越三日，结所授帨就缢，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败我事！令我负三日约。”自是，水浆不入口，举声一号，热血迸流。至七日，顿足曰：“迟矣，郎得毋疑我。”母偶出栲沐，扃户缢死。

在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倡导下，妇女殉节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上诸例中，女主人公不仅没有受到逼迫，甚至有人是旁

边人怎么拦都拦不住地要殉死，可见妇女殉节观念的毒害非常之深。虽然在明英宗废除了殉葬制度，从此帝王家的妻妾不再殉死，然而此风却已经在民间愈演愈烈难以遏止，无数“贞节烈女”被这个漩涡卷走了生命。而且，统治者虽然明令废除殉葬制，另一面却又在实际行动上大力表彰妻妾“自愿”殉死的举动。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宁河康僖王卒，宫人王氏、杨氏、张氏、段氏俱自尽，俱赠夫人赐祭及葬，盖以上以其节烈而旌之”。^②统治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使得终明之世，人殉现象实际上都没有彻底根除。

①李凌：《关于中国的人殉、人葬》，《史苑》，2005年第五期。

②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文物》，1974年第七期。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大明会典》载“长陵十六妃俱殉葬”，而朝鲜《李朝实录》载为30余人。

⑥[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

⑦⑧《明史·后妃传》。

⑧《明史·吴复传》。

⑨《明史·金玉传》。

⑩《明史·郭亮传》。

⑪《明史·杨洪传》。

⑫⑬《明史·英宗后妃》。

⑬转引自清代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三。

⑭《明史·后妃传》载：“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旨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此虽为魏忠贤、客氏所为，但终究也是在宫廷中发生的逼殉。

⑮⑯[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五。

⑰[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五。

⑱[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

⑲[明]《礼部志稿》卷二十四。

⑳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为十三陵特区文物科干部）

试论清代驻京喇嘛职衔及管理机构

陈晓敏

藏传佛教是在西藏形成的一个佛教支派。7 世纪左右,佛教从内地和尼泊尔传入西藏,经过与当地原始宗教——苯教两个世纪左右的长期斗争、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世俗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在西藏逐渐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明朝初年,宗喀巴(1357—1419)创立了新的教派,称格鲁派(俗称黄教或黄帽派),其势力逐渐强大。他的两大弟子根敦珠巴(即第一世达赖)、克珠节(即第一世班禅),

继承其衣钵,广招僧徒,逐步形成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16 世纪后期,即第三世达赖时,黄教势力大炽,“其它派皆俯首称子弟”。三世达赖和蒙古贵族建立了政治联系,使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蒙古各地广泛传播,得到蒙古族的普遍信仰,成为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唯一宗教。明朝末年,虔奉喇嘛教的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举兵入藏,帮助五世达赖建立了噶丹颇章西藏地方政权,黄教在西藏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



北京西黄寺(清朝时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的驻锡地)

一、驻京喇嘛的概念

驻京喇嘛概念有狭义和广义概念之分。狭义的概念,就是从地理角度而言的,是在北京各个藏传佛教寺庙出家的、普通的满蒙汉藏喇嘛和外调驻京的蒙藏大喇嘛。后者奉敕驻锡北京,他们或长期在京任职,或受命差遣由京派出任职,甚至作为钦差大臣,参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日本著名学者若松宽在论文中就这样写道:“清代驻锡北京的喇嘛被称为驻京喇嘛”。^①他所使用的就是驻京喇嘛狭义的概念。他在论文中又这样写道:“他们在弘扬黄教上起着较大的作用,清朝赐予他们国师、禅师等名号,这些转世活佛即驻京呼图克图。他们均为康熙、雍正年间,以敕命被迎请至北京的。清廷在京师赐予他们坐床寺以为居住。为了避暑,他们一般夏季在多伦诺尔的坐床寺,作为转世活佛,他们承袭驻京呼图克图的地位和头衔。”^②

狭义的驻京喇嘛概念并不等同于驻京呼图克图,后者属于更小的概念,是驻京喇嘛中的领导阶级。“凡喇嘛道行至高者曰呼图克图”。^③《清稗类钞·宗教类》载:“呼图克图,即再来人。《明史》所谓尚师也。其号本起于红教,红教最高者为萨迦呼图克图。黄教之祖宗喀巴,其始亦受经于萨迦庙之呼图克图。明隆庆后,其名流播于青海、漠南北蒙古等处。大喇嘛学道能转世者,则达赖、班禅印证之,得为呼图克图,又有尊而上之曰大呼图克图者,如漠北之蒙古喇嘛,皆以转生嗣位或受中朝封号。至国朝,凡称呼图克图者,皆赐名号,俾其世世掌教。又有修行未深初转一、二世者,曰沙布伦,亦得建专寺,综计喇嘛之能出呼毕勒罕,入理藩院册者,西藏号呼图克图者十有八,号沙布伦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有五;又驻京呼图克图十有四,都凡呼毕勒罕有百六十人。惟青海诺门罕一支久同世袭,许以亲族入籍。其后又调取西藏、

青海、漠南北蒙古、察木多之呼图克图,轮流驻京,择其道行高者使掌印,三岁而更代。”^④清代载于理藩院册籍的呼图克图共有一百六十人,属于驻京呼图克图的有: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噶勒丹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十二人,^⑤在这十二人中有国师、禅师名号的更少,有清一代只有章嘉呼图克图一人被封为国师。道光十九年(1839)更是明确规定:“呼图克图等除封国师、禅师名号准其兼授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⑥狭义的驻京喇嘛概念指的是北京各个藏传佛教寺庙出家的普通的满蒙汉藏喇嘛和外调驻京的蒙藏大喇嘛。这是一个大群体,以乾隆元年(1736)在京喇嘛人数为例,乾隆元年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有九百五十九名,没有度牒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⑦而入理藩院档册的驻京喇嘛中有呼图克图名号的只有十二人。可见,在驻京喇嘛中有呼图克图名号的只是少数。所以驻京喇嘛的概念与驻京呼图克图的概念是不能混用的。

驻京喇嘛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以北京地区为中心,除西藏外,纳入驻京喇嘛管理体系的满、蒙、汉、藏喇嘛群体。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喇嘛封号》卷974中将全国的喇嘛分为:驻京喇嘛;西藏和蒙古各地游牧喇嘛;甘肃壮浪等处番寺喇嘛三类。其中驻京喇嘛中明确规定了:“由驻京喇嘛派往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派往四川懋功之广法寺堪布一人;其热河堪布达喇嘛二人、达喇嘛四人、副达喇嘛十一人、闲散喇嘛八人;盛京达喇嘛八人;锡勒图库伦扎萨克达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四人;西安广仁寺达喇嘛一人;五台山扎萨克喇嘛一人、达喇嘛一人;归化城扎萨克达喇嘛一人、副扎萨克达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六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一人、达喇嘛二

人。”^⑧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盛京、五台山、热河、新疆伊犁、喀尔喀蒙古的库伦、内蒙古的归化城、西安以及四川等地均有驻京喇嘛长期任职;而且派出的喇嘛都属于喇嘛教中级别较高的,如由驻京喇嘛派往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堪布,为藏语音译,意为师傅,原为西藏地方政府僧官和寺院主持者的名称,后成为当权僧侣的专称)。可以说他们是这些地方藏传佛教寺庙的管理阶层;另外,这些地方的“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政府已经将上述这些地方喇嘛寺院的管理,纳入了驻京喇嘛的管理体系之中。

二、驻京喇嘛职衔

清朝入关前就与藏传佛教有了接触。清朝统治者在东北建立了后金政权,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明朝争夺天下,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采取了与蒙古结好的政策,因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具有巨大的传统势力,他们把尊崇、扶持藏传佛教,作为笼络蒙古王公的一种重要手段。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颁发命令,在战争中保护喇嘛庙,以减少军事行动的阻力,争取蒙古各部的支持。皇太极还派遣使者到西藏,致书达赖、班禅,与藏传佛教的首领人物建立了直接的政治联系。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立即宣布承认黄教大喇嘛原有的社会地位,以消除其因改朝换代而带来的疑畏和对抗情绪。其作法就是令大喇嘛仍袭其旧封,只是改换清朝颁发的印册。顺治八年(1651),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在北京修建了西黄寺,并且剃度了喇嘛。在此基础上,驻京喇嘛制度逐渐形成。对于驻京喇嘛的管理,清朝政府参照世俗等级制度,制定了驻京喇嘛的等级: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扎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其次曰德木齐、格斯贵;其徒众曰格隆、班第。在《钦定理藩部则例》卷56中明确规定了

各等级喇嘛在京城各庙的额缺,“京城各庙额设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缺,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缺;扎萨克喇嘛四缺;达喇嘛十四缺,副达喇嘛三缺,画佛副达喇嘛一缺;额设苏拉喇嘛六缺,教习苏拉喇嘛六缺,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缺,仓苏拉喇嘛九缺;公缺德木齐三十一缺,格斯贵五十缺。”^⑨从这些规定中看,从最高的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到一般的画佛喇嘛、苏拉喇嘛、德木齐、格斯贵等分五个级别,有十二个职衔。

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扎萨克为官名,蒙古语音译,它源于蒙古语的“扎撒”一词,扎撒是汉语法令的意思,意为“执掌政令者”,“尊长”,在清代是蒙古各旗长的称呼;这是满语“长官”的意思。从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认为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就是喇嘛的管理者。清代蒙古寺庙较多地区或按所在行政区划或跨越行政区划置喇嘛印务处于某一大寺,设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处理辖区政教以及寺与寺之间事务,也是当地政教合一的掌权者。京城的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权力要比蒙古地区的小得多,他只能管理京城各喇嘛寺之间的事务。掌印扎萨克喇嘛的担任者,一般多由皇帝从西藏、青海、滇南北蒙古、察木多等地来驻京的呼图克图中,择其道行高者使其掌印。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和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可以说是一个垄断性的职衔,多为驻京呼图克图所占据。其中最重要的是清代先后册封的国师和禅师。康熙四十五年(1706),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奉旨掌管内蒙古和京城的喇嘛教事务。而他担任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职的时间是册封国师之前,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就担任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直到乾隆时期,除了章嘉公派出差或圆寂直至呼毕勒罕成年以前,由其它禅师担任外,此职位基本由章嘉国师担任。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与正职情况相当,也是重要的驻京喇嘛职位,驻京呼图克图拥有绝对的优先权。可见,能够担任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与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多为能够转世的大活佛,由于他们能够

经常随侍在皇帝身旁,不仅在解决当时的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清朝皇帝联系外蒙、西藏、青海等地活佛的桥梁。另外,这些大喇嘛的崇高声望,既可以服五台山、多伦诺尔、盛京、内蒙古诸部,也可以提高驻京喇嘛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增加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号召力。掌印扎萨克达喇嘛这个职位设立之初由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担任,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叛逃后,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这个职位,便由甘青或西藏地区选拔,施以皇恩,使之在京效力或再派到其它地区作为钦差,专门处理内外蒙古地区的部落纠纷,他更容易说服黄教上层,可以减少战争;对西藏而言,驻京的大喇嘛充当钦差,而且,这些充当钦差的大喇嘛中,多数曾经跟随达赖或班禅学习经典,在当地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宗教的亲合力,不容易引起藏民的反感,在感情上藏民更愿意接受。考察驻京呼图克图,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数出身于甘青地区,或与甘青地区的寺庙关系密切。如:以章嘉国师为代表,还有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等,居其大半。在驻京喇嘛中,一些呼图克图还是章嘉呼图克图的弟子。以乾隆时期为例,如敏珠尔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以及由乾隆紧急调到京城、在章嘉圆寂后接任驻京扎萨克达喇嘛一职的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等莫不如是,由此可见,驻京喇嘛的大权一直为甘青喇嘛所掌握。

扎萨克喇嘛在清代为驻京喇嘛和蒙古寺庙的僧职名称,地位低于扎萨克达喇嘛,相当于蒙古旗扎萨克。《理藩院则例》规定:“喇嘛能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扎萨克”,清代蒙古地区共建喇嘛旗七个,各旗均设扎萨克喇嘛,除不管军事外,执掌本地内一切宗教、行政、司法、税收等事宜,有的则辅助扎萨克达喇嘛办理事务。京师设扎萨克喇嘛

四缺,由清政府任命颁给印信,配有随从人员格隆4人,班第六人,月银十三两,米八点二石。驻京的扎萨克喇嘛多从驻京呼图克图中选拔。乾隆九年(1731),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扎萨克喇嘛一缺为雍和宫专缺。嘉庆二十二年(1817)规定,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一缺,有坐床众喇嘛经卷之责,为唐古忒专缺,以呼图克图堪布充任。其余三缺于蒙古达喇嘛内择其年陈,经卷好者补一缺,于汉人达喇嘛内择其年陈,明白能事者充补一缺,余一缺先将未受职之呼图克图充补,如无呼图克图,于唐古忒、蒙古、汉人达喇嘛内拣选充补。^④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驻京的扎萨克喇嘛的权力仅限于一庙内事务的管理,比蒙古地区的扎萨克喇嘛的权力要小得多。

达喇嘛,“达”满语“长官”之意,为管理寺庙的喇嘛,地位在扎萨克喇嘛之下。蒙古各寺庙所设达喇嘛数目多寡不同,以其职务繁简而定。大寺按科分设扎仓,管理扎仓者多为达喇嘛;中等寺庙一般设达喇嘛二名,一专司教务、一专司印务;小寺只设达喇嘛一人,管理全寺事务。驻京喇嘛中的达喇嘛与蒙古地区的达喇嘛有所不同,嘉庆二十二年规定,由藏调来之堪布等俱以达喇嘛补用,遇有达喇嘛缺出,应于达赖喇嘛庙、慈度寺、察罕喇嘛庙达喇嘛内签掣一人调补,所遗之缺,先将堪布坐补,如堪布无人,再于副达喇嘛内拣选升用。随后规定有了变化:达喇嘛的十四缺加上扎萨克喇嘛中的三缺,均从以下十七个寺庙中选出,即:阐福寺、嵩祝寺、福佑寺、隆福寺、普胜寺、大隆善护国寺、妙应寺、净住寺、三佛寺、长泰寺、慈度寺、达赖喇嘛庙、察罕喇嘛庙、圣化寺、大正觉寺、慈佑寺、永慕寺十七个寺庙,如果有从达喇嘛升任扎萨克喇嘛,所出现的达喇嘛缺,也一起归入这十七个寺中选拔补齐。其选拔办法为:于额设副达喇嘛三名、画佛副达喇嘛一名内拣补,将额设副达喇嘛升用六人后,再用画佛副达喇嘛。但是在道光时期修改的有关条例中出现了个特例,即嵩祝寺连同资福院、普度

寺、同福寺四庙达喇嘛缺出,由本庙内应升喇嘛内拣补,而不同其它寺庙补缺。也就是说,京城诸寺中,达喇嘛基本出自这些寺庙中。^①副达喇嘛额设三缺,系慧照寺、慈佑寺、弘仁寺每寺一名。遇有缺出,于额设苏拉喇嘛六缺、教习苏拉喇嘛六名、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名内论其当差年陈者拣选,轮流升用。画佛喇嘛是依附于所出身的寺庙,并不是公缺。所以画佛喇嘛只是个别寺庙才有。^②

达喇嘛和副达喇嘛是一个寺庙的主持,有些重要的寺庙如黄寺、福佑寺、弘仁寺常由一些驻京呼图克图担任主持。满族喇嘛寺庙,即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等五庙,达喇嘛、副达喇嘛缺出应于五庙德木齐内按年陈公同遴选升用,不与其它寺庙混同。^③

苏拉喇嘛,“苏拉”为满语,但不是官名,乃是阶级上的一种符号,“苏拉”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汉语的“散秩”或“闲散”或“没有一定专职”的意思。苏拉喇嘛就是没有专职的闲散喇嘛。他能念经,也能教授经典。他的级别比达喇嘛低,但又比平常的喇嘛高,只是他没有一定的职务。驻京喇嘛中的苏拉喇嘛额设六缺,为藏僧和京城的喇嘛分享。教习苏拉喇嘛六缺,系雍和宫擦呢特学(显宗经院)二缺、扎年克学(诸明院)二缺、巨特巴学(密宗院)一缺、曼特巴学(医学院)一缺;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缺系雍和宫擦呢特学三缺,巨特巴学一缺。^④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教习苏拉喇嘛和额外教习苏拉喇嘛是专门为雍和宫所设。教习苏拉喇嘛担任教习经学等事宜,地位在达喇嘛之

下,理藩院规定每月可领月饷银米,晋升后仍可增加,但不论如何熟悉经典,绝不可能升到领取俸银禄米的高僧喇嘛的地位。仓苏拉喇嘛任职来源不明。有可能是为驻京呼图克图各仓上所配的闲散喇嘛。

德木齐和格斯贵是驻京喇嘛中最基层的职位,按例选取经卷熟悉者担任。德木齐,蒙古语音译,又作“得木齐”,意为“监督官”,“检察官”,“保管人”等。俗称二喇嘛,辅佐达喇嘛管理寺庙庶务和会计。一般是选善于办事的喇嘛充任,地位在达喇嘛之下。雍和宫之德木齐四名遇有缺出,用汉人二人,用蒙古喇嘛经卷好者二人,不得滥用。各寺庙德木齐、格斯贵缺出,由该管达喇嘛将格斯贵内经卷好、人明白、能办事者,保送掌印呼图克图验放,报部记档。资福院系洮岷喇嘛、普度寺系诵蒙古经喇嘛、同福寺系本庙专缺,此三庙之达喇嘛、德木齐缺出,仍由本庙升用,其德木齐等不准升用公缺。格斯贵,管理寺庙、扎仓庶务和杂务,有的还兼管教务和戒律,教授经典和督察喇嘛念经,手执法杖,对不守戒律规定的僧人予以责打,也处理僧众的一般纠纷,实际是寺庙的执法者,地位在德木齐之下。



雍和宫(北京现存最完整、最大的喇嘛寺院)

另外，每一位在职驻京喇嘛都可以带数目不等的本门弟子，称为格隆或班第。格隆是指出家受具足戒的僧人，主要职务是在寺内外诵经。清朝政府对扎萨克达喇嘛等各种僧职喇嘛所配随从格隆，有明确的数量规定，并且要有度牒。清政府规定，驻京喇嘛所带班第每人每月给一定钱粮。按清政府规定，寺庙中有度牒的班第也给钱粮。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勒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四人前辈俱曾驻京，品秩较大，随带噶布楚兰占巴二十名、格隆六名、班第六名、苏拉喇嘛三名随带徒众六名，扎萨克达喇嘛随带徒弟班第六名；副扎萨克达喇嘛随带徒弟格隆五名；扎萨克喇嘛随带徒弟格隆四名；达喇嘛随带徒弟格隆二名；副达喇嘛随带徒弟格隆二名；德木齐随带徒弟班第一名。^①

三、驻京喇嘛管理机构

清朝统治者对于驻京喇嘛的管理，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从简单到成熟，是经过几代皇帝不断修正完善而形成的。有清一代，疆域辽阔，对于地处边疆的蒙藏民族事务尤为重视。崇德元年(1636)，蒙古衙门成立，崇德三年(1638)，更名理藩院。理藩院主管北、西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喇嘛教是蒙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是清朝政府特别重视的问题，更是理藩院管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理藩院内部组织的变动，主管驻京喇嘛事务的部门也随之变化。

从顺治朝到雍正朝，驻京喇嘛的事务主要归属理藩院的柔远清吏司管理。乾隆、嘉庆两朝，改由典属清吏司主管。到道光时期，驻京喇嘛人数激增，但是驻京喇嘛的职衔不变，因而没有职衔名号的喇嘛人数也愈来愈多。道光二十三年(1843)规定：“喇嘛印务处，除掌印正副扎萨克达喇嘛外，如驻京呼图克图中，有驻京年分较久，当差勤慎，经卷熟习者，准印务处报院具奏，作为

行走呼图克图，其无职衔名号之喇嘛，概不准在印务处学习行走。”^②从这一项规定可看出，当时在驻京呼图克图中也有一部分人没有了职衔。因而道光时期，对于庞大的驻京喇嘛阶层管理更加严格而规范化。道光时期，修改理藩院则例，将驻京喇嘛的职衔一分为四，分别由柔远清吏司、典属清吏司、理刑清吏司、喇嘛印务处分工负责。具体而言，柔远清吏司主管京城内外寺庙喇嘛的钱粮、草豆、烤炭、银两，负责颁给各喇嘛庙时宪书；典属清吏司负责在京喇嘛考列等候、升迁、调补、札付、度牒、路引、奏请寺庙名号，各寺庙工程，咨取学艺班第、台吉充当喇嘛等事；理刑清吏司主要掌管缉拿喇嘛私自逃逸及违法犯罪等事；喇嘛印务处主要办理喇嘛事务公文。另外，由于雍和宫皇家寺庙的地位，理藩院直接管理。遇有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缺出，由理藩院尚书、左右侍郎联衔开列清单，请旨简派。

综上所述，清朝政府将驻京喇嘛进行了详细明确的等级划分，每个等级的喇嘛职责明确，甚至每个等级喇嘛所带的弟子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还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驻京喇嘛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清朝政府对驻京喇嘛的管理非常严格。

①② [日] 岩松宽，《葛尔丹锡勒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研究》，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3期。

③ 释·妙丹，《蒙藏佛教史·清代之喇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1页。

④ 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

⑤⑥⑦⑧⑨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喇嘛封号》卷九七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

⑩⑪⑫ 光绪朝《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一》卷五六，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

⑬⑭⑮ 光绪朝《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三》卷五八，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

⑯ 光绪朝《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五》卷六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

(作者为辽金城垣博物馆业务技术人员)

清代八旗值年旗初探

徐晓倩

清代统治者一向以八旗制度为国家之根本,各旗事务由八旗都统管理,而为了八旗军事政治管理的整齐划一,会理八旗旗务的机构值年旗应运而生。值年旗经过雍正元年以来的值月旗不断发展直到成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在八旗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雍正元年到乾隆十六年的值月旗

1. 值月旗的设立与办公地点

雍正元年(1723)九月十八日,雍正帝在召入多罗果郡王允礼时谕令:“嗣后八旗着各当值一月,每月将应当值之旗下大臣等职名开列具奏。俟朕派一人总承八旗公办公事件及传集立稿等事。若于齐集之时有所不到者,于会议折内不必列其职名。”^①这标志着值月旗的正式设立。由此史料可见,雍正帝建立值月旗的目的是使八旗制度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统领机构,可以用来办理八旗通行的事务和记录档案、召集旗务会议等不属各旗分别办理的事宜。

值月旗初设时,当月旗没有公署用以办事,轮到哪旗当值,当月的已结档案也就留在哪一旗,后发现遇到“复检之事”的时候十分不便,还要逐旗查找,影响工作效率,故于雍正六年(1728)建立值月旗公所:“八旗轮流值月并无公所,每月未结案件移交下月承办,已结者上月该旗收贮。遇有复检之事,挨旗稽考,必致延误。嗣后设立值月公署,不论旗分,每翼委派值月官四人在署办事,一年更代,凡已结未结之事均令注册。”^②可知在署办事的有值月官左右两翼各出四人共八人,概是每旗一人,任期一年,期满轮换。

值月旗公所在乾隆十六年(1751)随值年旗的改置亦改称值年旗衙门,一直到民国年间都没有再搬家,直至八旗制度消亡。《日下旧闻考》记载:“值年旗衙门在地安门外雨儿胡同,南向。前后四层,共房四十楹。雍正六年始设,名当月旗,八旗轮流当月。乾隆十六年奉旨改今名,每岁终,兵部奏派王大臣等各司其事。”^③另《光绪顺天府志》也有:“雨或作鱼,值年旗衙门在此。”^④可知雍正年间设值月旗到乾隆十六年设置值年旗,其衙署位置一直在雨儿胡同,坐北朝南,四进院,有四十间房子。到了民国六年对此衙门仍有记载:“谕查明值年旗并八旗二十四固山都统衙署地点开具清折恭呈钧鉴。值年旗,地安门外雨儿胡同路北。”^⑤但今日是否有衙门遗址保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

2. 值月旗的人员构成

上引史料中,皇帝要求各旗在即将当月时就把八旗各都统、副都统的人员名姓列单进呈御览,然后由皇帝亲自从中挑选值月旗大臣,以统一办理八旗事务和“传集立稿”等事。具体规范如下:“(乾隆)六年(1741)议准,八旗值月,每月于二十六日交代,应值月都统等,由下月该旗豫行开列本旗各都统职名奏请简用。”^⑥

在《雍乾两朝镶红旗档》第13条“奏请钦定当月大臣折”^⑦中,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十六日,镶红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和硕恒亲王弘祉等为派当月大臣事上奏,“自本月二十六日起,由臣等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当月。值此即将当月之时奉旨:嗣后,着于十日前即须执掌事务。……当日奉旨:着派弘祉、爱因图、阿克敦、托保。”同样档案中第29条也是乾隆七年

(1742)十月十六日的“奏请钦定当月大臣折”^⑧,所派当月大臣为“恒亲王弘祉,多罗贝勒弘明、副都统罗善、李元良等。”至乾隆初年,值月旗大臣的选派皆依照此例进行。

除值月旗大臣外,值月旗机构下还有一些必要的办事人员,比如值月官、笔帖式、当月章京、骁骑校等等,他们都要受值月大臣的委派和监督。其中具体人数和来源如下表:

表一 当月公署办事人员职能表

官 职	人 数	来 源	职 责	任 期
值月官	8	左右两翼每翼各四员	注册已结未结之事	均为一年更代
领催、马甲	24	八旗满蒙汉每旗一名	缮写	
当月章京	4	左右两翼每翼各两员	缮写档案	
骁骑校	4	左右两翼每翼各两员	缮写档案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一千一百四十四《八旗都统三十四·公式·公署办事》,《续修四库全书》第8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光绪石印本影印,第719页;《钦定八旗则例》卷之二《忠部公式·八旗当月》,《钦定中枢政考三种》第一种,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6年6月,第394页。)

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再加上约4名由皇帝简派的值月大臣,在值月公署办事的总人数至少可以达到44人,这样的规模也是由相应的规定而形成的,除值月大臣外的办事人员在任都是一年,这就赋予了值月旗更加固定规范的人员构成,可以说也为后来值年旗的设立打好了基础。

3. 值月旗的主要职责和功能

上文已经提到值月旗设立的目的是“总承八旗公办事件及传集立稿之事”,“公同议奏及通行知会等事”^⑨,也就是说值月旗主要负责统办八旗事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负责召集八旗大臣会议

值月旗召集八旗大臣公议旗务的步骤大致如下,一旦上级下达有令交予旗共议之事,按照八旗事务整体划一的原则,由当月旗将会议时刻地点说明并通知八旗大臣来开会。会议中,“如系条奏事件,原奏之大臣,亦入班会议,前议大臣立稿,与后议大臣公同阅看。所议皆符,即行具奏,意见不符,另行定义。将另议之处,仍告知同议大臣,有愿另奏者,亦准其另奏。”^⑩最后由当月旗和八旗大臣共同细拟

立稿,在稿末开列大臣职名并画押。对于因故不能当时画押的大臣,则有如下系列规定:“如有别项差事不得会集之大臣,即将定义之稿照写送阅。如无意见不和之处,俱各画押,然后转发该旗遵照办理。”^⑪从此督促大臣按期会议画押可谓三令五申,终于在乾隆三年订下最终实施办法:“八旗会议之事,各大臣务须会齐画稿,其有故不到者,于次日会集补画。如次日仍托故不到,值月都统等查参。交部议处其送稿画押之处,永行停止。”^⑫对于多次托故不到的会议大臣,乾隆帝不再姑息,直接将查参权利赋予值月都统,惩治拖延推诿办事的大臣。值月旗不但担当安排会议事宜的责任,还要对会议始终尽到监督督促的职责,且以其查参权间接起到了提高旗务办理效率的作用。

(2) 掌控主持具体旗务

值月都统也要在业务上对八旗事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此雍正五年(1727)规定了在这方面值月都统的主要责任。

凡是有关八旗的特旨交办事务以及拣选引见人员,值月都统等都应做到心中有数,其中已结未结之事,要求其“详察奏闻”^⑬。《钦

定八旗则例》和《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中亦有具体说明：“再八旗每月派有一旗之都统、副都统等当月，一应特旨所交并拣选引见人员事件皆系当月之大臣等所悉知者，其已结未结之处即交当月大臣之都统副都统等详查奏闻，如此则各处俱有专司即易于稽查而事件亦不致有迟误矣。”^④这都说明雍正年间值月都统当值期间要对八旗会同事务有具体了解，并且主持具体办理。

值月旗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组织机构，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十三日，管正黄满洲事务宗室弘昇奏请简化当月旗行文办法，他认为除了特旨交办事件外将其他咨文先行至值月旗再到满洲、蒙古、汉军旗实在降低了工作效率，恐怕在誊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错误，所以他请求“除当月旗与八旗会奏之事，或一体办理之事，特旨交付之事外，所有各部、各处一切应行之事，俱照原定之例，由各处将钤印文书立即行文各旗。如此则事不繁，且不致耽延舛误。”^⑤雍正皇帝后来批准了他的奏请，这样一来值月旗专办八旗会理之类事，减少了不是必须由值月旗传达的命令的一层周转，也使值月旗的办事内容更加专业化。

（3）负责八旗与其他各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

值月旗最有特点的功能就是将皇帝和各级机构要传达给八旗的命令接收并向八旗传播，同时也将八旗事务向上汇报让皇帝知晓。

如雍正五年四月六日，办理旗务王大臣等骁骑校赫伦泰将行贿事揭发，得雍正皇帝欣慰，即赏其银一百两，记录一次，并下令将这样应予嘉奖的事例发送到当月旗，以使八旗上下皆知且作为榜样，“嗣后凡恩赏与处分事件俱着该旗咨送当月旗，令其遍传八旗，再部院已结案内，其恩赏处分有关于旗务者，亦着咨送当月旗，由当月旗传谕八旗，交该参领佐领等将施以恩赏与加以处分。”^⑥即见值月旗的宣传作用之重要，值得褒奖之事与不当之事都由各旗

上交值月旗，由值月旗向整个八旗宣传，以鼓励八旗内值得褒奖之事，惩戒当处分之事，而所有案件中有关八旗中恩赏与处分的事务也交到值月旗传遍八旗各旗分，这种传达作用是很典型的，对八旗整体事务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类事务之外，值月旗还要将皇帝和各机构下发的有关八旗的文件传遍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并及时将八旗内发生的事情定期汇报给皇帝。

（4）值月旗的稽察作用和自我约束

值月旗要对各种八旗事务办理的时限进行监督催促，凡是“各参领会理之事，限内不能完结者，呈该旗都统，二十日，即将扣限之处，行原行衙门及稽查衙门值月旗。……如逾余限，查参议处。”^⑦值月旗还有对于各旗办理事务的完结期限的知情权，要申请延期办理，必须要向值月旗报告，这一方面加强了值月旗建立时所被期望的使八旗事务划一办理的目的，一方面也限定了各旗事务办理的时限，在各旗之上发挥了值月旗的督促办事者提高效率的作用。

上文提及当月公署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将当月的档案妥善存放以便随时查核旗务，同时值月旗保有参奏逾期不复咨文的衙门的权力。“当月旗行查各部院衙门事件，逾限不行咨复，当月旗参奏。已结者交当月旗公署抄案存贮，未结者移交下月办理。”^⑧

值月之旗在监督其他事务的同时其本身也要受到他旗监督，雍正八年（1730）三月四日雍正皇帝谕令“八旗轮班当月之处，着查旗参领侍卫等稽察。如镶黄旗当月，着正黄旗查旗参领侍卫等稽察，其七旗俱照此例，以次稽察。”^⑨这是八旗之间互相监督，一旗都统当月，别旗参领侍卫稽察值月旗事务，以除去舞弊嫌疑。

雍正帝为了约束值月旗也规定了一般旗务办理的限期，“（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其八旗及当月旗所办已结事件具拟定十日完结。”^⑩

4. 值月旗的经费

值月旗会理旗务也需要经费，初始并不规范，后来经过大臣建议，经费的来源数目也有了保障。

雍正七年(1729)八月二十日，镶白蒙古都统奇尔萨上奏，他注意到八旗轮值当月时，皆动用各旗房租银两且向无定额、多寡不一，恐怕日久滋生情弊，“嗣后当月宜用多少银两之事交付八旗臣等会议，视足定额具奏，一旦有定额，断不致过多挪用也。”^④这里要求值月旗用银最好有定额，以免生弊。

后来值月旗有了公费额度规定，“八旗公费满洲每旗一年留房租银一千两，……当月公费每次银二十六两，由满洲旗分支给。”^⑤此规定限定轮到哪旗当月时，就由各旗满洲旗分支取当月公费银二十六两，轮到当月一次即支一次，成为定例，防止任意挪用房租银的情况发生。

如上所述，值月旗在雍乾两朝为一体划一管理八旗事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滋生出了一些弊病，最显著的就是苟且推迟办事的不良工作作风。雍乾两朝皇帝都对此陋风进行了严厉的整饬^⑥，但是却收效甚微。

二、乾隆十六年到民国年间的值年旗

乾隆十六年(1751)值月旗改为值年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大的变动，值年旗的功能日趋强化，并且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值年旗大臣仍会理八旗事务，发挥着对八旗人员来说不可小视的作用。

1. 值年旗的建立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一乾隆皇帝谕令：“近来八旗都统办事迟延，虽有值月大臣，率皆意存推诿，苟且了事，并不实力经理，殊属无益。嗣后八旗大臣等停止值月，着将都统、副都统等职名由部开列进呈，候朕简派数人，一年轮流一次并带能事之章京承办事件，年终缮折奏闻。”^⑦还明确说明“一年一次轮流值年，不必论旗……将一年内所完事几何、未完事几何，逐款缮折奏闻

……将此永着为例。”^⑧自此，值年旗确定，不再论旗分值，而从八旗所有都统副都统中由皇帝指定拣派人选，仍然承办八旗汇总事务，年终要向上详细奏闻，延长当值期限以除值月旗“推诿成习”的陋风。

2. 值年旗的人员构成

值年大臣的选派与值月旗大为不同。值月旗即各旗都统轮流值月，而值年旗大臣则是将当时的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所有都统副都统职名全部列出，由皇帝圈选由谁值年，每旗一人。“值年旗大臣八人，旗各一人于都统副都统内特简，岁终则更代，掌八旗会理之事。”^⑨值年大臣已经有定员，规定每旗从都统副都统中派一人共计八人。“奏派值年旗大臣，兵部将八旗都统副都统等职名全行开列、缮写绿头牌进呈、恭候钦点数员管理，如遇调补外省以及奉差等事出有员缺，由值年旗开列职名随时奏明请旨，派员管理。”^⑩可见选派值年大臣，由兵部武选司^⑪上报皇帝。

值年大臣的选派方法在《清季兵部武选司奏疏公牒》有记载：“兵部谨奏为请旨更换值年大臣事。查例载值年大臣，每届年终更换等语，本年值年大臣都统锡珍、都统乌拉喜崇阿、都统多罗克勤郡王晋祺、都统宗室灵桂、副都统宗室恩全、都统多罗贝勒载澂，都统和硕礼亲王世铎、都统宗室延煦，现届年终更换之期，臣等谨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职名按翼缮写清单进呈，每旗恭请钦派一员，共更换八员，管理值年旗务，为此谨奏请旨。于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二十四日具奏。奉硃笔圈出镶黄旗满洲都统和硕惇亲王、正白旗满洲都统科尔沁扎萨克和硕博多勒嘎台亲王伯彦讷谟祜、镶白旗满洲都统亲王衍多罗郡王奕详、正蓝旗满洲都统多罗庆郡王奕劻、正黄旗满洲都统固伦额駙景寿、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明秀、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富勒浑泰、镶蓝旗汉军都统和硕肃亲王隆懋。”^⑫后面所列职名分左右翼开列，左翼应列王大臣二十四员，右翼应列王大臣二十八员。清单每年各旗都统副都统所列

比例皆不同。

另将《清季兵部武选司奏疏公牒》与《清光绪兵部奏稿》^⑨相互对比补充,可以得到详细的光绪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奏派更换值年大臣折,每年奏请更换的具体日期都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之间,行文规范准确,前后连贯成为一体,亦可发现中途因故换人的情况。可见选派值年大臣的流程到光绪年间还是依此程序实行。折中一般都列清依例更换缘由、现值年期大臣职名、更换值年应列王大臣职名以供查看

圈选。

皇帝确定人选后下达任命到兵部,再达值年旗,由值年旗统一通知各旗都统知晓派员来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都统衙门全宗》第799号《镶红旗正副都统奏旨补署及值年旗大臣有关文书》可证实流程如下:“兵部为片行事武选司案呈所有奏派更换值年大臣一折,本部于上年十二月初三日拜发,十四日奉硃笔圈出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英信,……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

其他办事人员包括参领、印房章京和笔帖式等,具体分工及人数见下表:

表二 值年旗办事人职能表

时间	官职	人数	来源	职责
嘉庆朝	笔帖式	无定员	各旗印房笔帖式内派委	掌翻译
	参领、章京	无定员	各旗参领章京内派委	掌奏章文移
道光朝	参领	24	八旗满蒙汉旗各一员	轮流办事
	印房章京	48	八旗满蒙汉旗各二员	
	执事骁骑校	无定员	各该期派出由值年旗大臣选用	缮写
	缮写笔帖式	无定员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六十九《八旗都统·值年旗》,第3128页;《清史稿》卷一百十七《职官四》,第3368页;《钦定中枢政考》卷之十一《八旗卷十一·公式》,《续修四库全书》第8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4页。)

以上所列人员加值年大臣八员,其总数已经至少达到值月旗的两倍以上,规模扩大,分工更详细,各种办事人员有了具体固定的规定,选派人员有规则可循。

3. 值年旗的工作内容与职责

乾隆皇帝要求值年旗要“承办八旗公同议奏及应行汇办通行知会等事”,即值年旗主要负责八旗旗务的总议上报,各旗相关事务的办理和在上级与八旗各旗分之间互相传达命令和汇报等事务。可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拣选公中佐领之拟补官员;驻蹕热河时带领各旗营官员引见,验放六品以下官员;兼管事之大臣请简时,咨取各旗

大臣衔名请简;请袭世职,查办事件限期办法;会各旗大臣定义特交事件;汇奏八旗年例之事。^⑩

(1) 选派旗官

即拣选公中佐领拟补官员,驻蹕热河时带领各旗营官员引见、验放六品以下官员,兼管事之大臣请简时,咨取各旗大臣衔名请简,请袭世职,查办事件限期办法一类的职责。“驻蹕热河,凡各旗各营官之应引见者,皆由值年旗大臣带领前往。稽查旧营房新营房及管理官房、稽查城内七仓、稽查坛庙齐戒王大臣,由值年大臣咨取各旗大臣衔名请简。管理铁匠局副都统缺出亦如

之。岁终请袭世职亦如之。在京及各处驻防世职官缺出,统俟岁终,由各该旗拣选应袭之人咨报值年旗,由值年旗奏请进呈折谱及引见日期。”^⑧史料中提及的管理各种事务的人选都要向值年旗汇报上行确定引见日期等再发回本旗办理,或者统一由值年旗管理。

(2) 负责召集八旗各级会议

值月旗和值年旗最重要的功能即召集八旗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召开有关的旗务讨论的会议。开会程序很严格,乾隆帝曾强调:“凡奉旨交议及画一定议之事,由值年旗会同八旗都统等公议。值年旗定稿之后,八旗都统等会集阅看,有应改者即改正画押。其有不得会议者,值年旗交该旗官送阅画押,即交回值年旗具奏完结。”^⑨值年旗要为与八旗都统公议的文件定稿,会后交各旗都统阅看签名确认才再向上一级汇奏。

直到道光年间开会流程也大略如此,但对多次托故不到者惩罚更严厉,“如有事故不能到班,将情由声明咨送值年旗即于次日补行画题,如托故不到,罚俸一年。如有迟延照违限例议处。”^⑩这样不再由“值月都统指名参奏”,值年旗在大臣缺席会议上加大了监管力度,大臣必须向值年旗请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都统衙门全宗》第778号《值年旗通知各旗都统印务参领等官员参加会议事的咨文》内有相关通知会议咨文8件,最早的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三十日:“值年旗准镶黄旗满洲印务参领同山、兜钦为知会事,现有应传之件相应知会值年旗转行镶黄蒙等二十三固山,各请印务章京一员于二月初一日准午刻赴值年旗会晤可也。”这是很典型通知会议咨文,镶黄旗印务参领得到上级命令有事要通知二十四旗的各印务参领,即行文值年旗代请转知其他二十三旗,规定各旗出一名印务章京按规定时间到值年旗衙门开会。有时是如此文所述有应传达事件开通知会,有时就是要求开会商量紧要事件。档案中最晚的为宣统二年(1910)四月咨文:“值年旗准镶白旗满洲知会事,本

旗谨请各旗印务夸兰达于本月二十九日午刻在值年旗会商紧要事件,相应行文值年旗转行镶黄满等二十三固山知悉可也。”有时咨文中也会列出开会商议的主要议题,如《全宗》第843号《吏部转知设立资政院抄谕及值年旗王大臣等筹办京旗宪政咨文》中有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值年旗准正白旗蒙古文开为咨请事准宪政研究会函告选举时间,兹本旗定于本月二十八日准午刻请印钩在值年旗署内研究选举办法务希早临万勿吝玉可也。”

(3) 岁末汇奏事宜

值年大臣负责一年之中从初一至岁止的值年旗务,于年底向皇帝汇奏。“凡事之应结者立其限,有特交者,则会各旗大臣以定义。……岁终将八旗已结未结事件、及官兵人等有无放重利债、官房有无租典、送挑各处拜唐阿大臣官员子弟分别已去未去、分给罪人为奴有无逃亡,具由值年大臣汇奏。”^⑪即八旗官兵的一些日常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主要情况的汇报。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八旗营房管理状况的稽查。“岁终将官房有无租典倒坏之处,会查旗御史共同出结,咨值年旗汇奏。”^⑫值年旗要将每年有关八旗营房的事件汇总具奏皇帝,若有关于营房的命令也由值年旗将执行情况汇报。《全宗》第523号《各房事宜折》中记录八旗都统衙门的机构设置,其中有“折房应办:……每月有无特旨事件咨报值年旗等处”,是为各旗向值年旗汇报事务的机构。

每年年底值年旗还要将汇奏的和已经办妥的事务存档备案,“值年旗行查各部院衙门事件逾限不行咨复,值年旗参奏,已结者交值年旗公署抄案存贮,未结者移交下年办理。”^⑬《全宗》第41号内有咨文称:“现在办理完竣一切公事除各部旗稿册原数缴回外,所有与各旗往返文件拟均咨交值年旗衙门,以备存案。”上文可证实规定的具体执行情况,其变化只是在周期上由一月改为一年。

4. 民国年间的值年旗

1911年后,八旗制度并未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消亡,值年旗事务在民国年间八旗事务中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此方面佟佳江先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①一文详细说明了民国二年(1913)到民国十六年(1927)任命值年旗王大臣的情况,可供参考。

另查到民国年间一系列关于值年旗事务资料:“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奉大总统策令派瑞丰管理值年旗事务。……调查二十四固山学堂停办者若干旗,现办者若干旗,由值年旗函间再本旗官产在何处,有无收租之处。”^②纵观瑞丰辑录的《镶白旗满洲公牒》,值年旗为八旗兵丁向大总统恳求减免税银、减轻兵丁生活负担的要求分外多见,并且仍然负责总议旗务,如“(民国八年)三月三日,值年旗为通知……今各旗营堂宪于三月二日在本值年旗开议表决,兹将各堂宪拟就呈底令即缮写正呈由各旗营堂宪派委代表持据,各堂名章于三月四日准午刻赴值年旗署钤盖后即行呈递。”^③其他方面还有值年旗请求政府勿向旗人住所收租以使旗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等语多见,可以说民国年间值年旗是旗民的依靠。

三、结语

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特有的军政民合一的组织制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年旗从值月旗发展而来,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异同。

当值大臣的选派上,值月旗为由值月的一旗都统及副都统内选派,八旗轮流,而值年大臣则是在整个八旗的都统副都统内选派,不论旗分。

当值人员的拣选上,值月旗较简单,人数较少,包括值月官、领催、马甲、当月章京、骁骑校,而值年旗各类分工趋于完善,其所掌业务扩大,人数高于值月旗两倍之多,去除了值月旗中等级较低的人员,派入了更加专业的“贤能参领”和“贤能印房章京”,办事人员的素质有所提高。

功能职责上,值年旗相对于值月旗新

增了一些比如引见官员、管理营房等功能,从所见档案的目录来看,其扩充的内容不少,值年旗发挥的作用愈加重要。

值年旗与值月旗最大不同就是当值任期上的差异,根本目的在于清除值月旗的推诿堆积之风,月改为年,可以说是对值月旗的优化,使其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值月旗作为值年旗的前身,它的大部分特点和规则都在值年旗上得到了应有的延续和规范。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八旗事务整体划一,使八旗在各旗都统统领的基础上,有共同会理的机构,这也就造就了从值月旗到值年旗不变的最重要的召集八旗大臣会议的功能,从雍乾两朝皇帝对会议程序细致入微的规定可见值月旗、值年旗这一关键性作用的重要所在。其传达命令的功能也发挥到最大,从档案的各项情况来看,所有要通知的有关八旗的事务由各部院衙门发至值年旗后,皆由其传谕八旗,在这一点上,值月旗与值年旗是一样的,他们联系了各旗分之间、八旗全体与上级或平级之间,使机构的运行更有效率。

①《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钦定四库全书》第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页。同样记载可见《钦定八旗通志》和《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696页。

③《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二《官署·八旗都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08页。

④《光绪顺天府志》卷十三《京师志十三·坊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第354页。

⑤费莫瑞丰辑:《镶白旗满洲公牒》,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国家图书馆,2004年7月,第273页。

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06页。

⑦关嘉录译,佟永功校,王钟翰审:《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86页。

⑧关嘉录译,佟永功校,王钟翰审:《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05页。

⑨《钦定八旗则例》卷之二《忠部公式·八旗当月》，《钦定中枢政考三种》第一种，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6年6月，第394页。

⑩《钦定八旗则例》卷之二《忠部公式·八旗当月》，第394页。

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05页。

⑫《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06页。

⑬《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692页。

⑭《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五，《钦定四库全书》第四一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95页。

⑮《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黄山书社，1998年12月，第2420页，第4845条“管正黄满洲旗事务弘昇奏请简化当月起行文办法折”。

⑯《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22册，商务印书馆，第66页。

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06页。

⑱《钦定八旗则例》卷之二《忠部公式·八旗当月》，第394页。

⑲《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696页。

⑳《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五，《钦定四库全书》第四一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97页。

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黄山书社，1998年12月，第1846页，第3487条“镶白蒙古旗都统奇尔萨奏陈当月轮值之银限定数额折”。

㉒《钦定八旗则例》卷之五《孝部仓库·八旗公费》，第411页。

㉓《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三》，第64页，第83页；《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685页，第5708页。

㉔《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304页。

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11页。同样记载可见《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大清会典事

例（光绪朝）》。

㉖《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六十九《八旗都统·值年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39册，文海出版社，第3127页。

㉗《钦定中枢政考》卷之五《奏派》，《续修四库全书》第8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辽宁省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兵部刻本影印，第125页。

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案卷》第1号《原兵部事宜各单》“武选司事宜单：奏派值年大臣。”

㉙《清季兵部武选司奏疏公牍》（全四十册）第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原书藏者为国家图书馆，2005年6月，第1075页。

㉚《清光绪兵部奏稿》（全十三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国家图书馆分馆编，2004年5月。

㉛李鹏年、朱先华、刘子扬等编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6月第二版，第348页。

㉜《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六十九《八旗都统·值年旗》，第3127页。

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六百八十五《八旗都统二十九·公式·公署办事》，第5711页。

㉞《钦定兵部处分则例》（七十六卷）卷之四《限期·会议事件》，《续修四库全书》第856、8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兵部刻本影印，第54页。

㉟《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六十九《八旗都统·值年旗》，第3128页。

㊱《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六十九《八旗都统·值年旗》，第3132页。

㊲《钦定中枢政考》卷之十一《八旗卷十一·公式》，第324页。

㊳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第101页。

㊴费莫瑞丰辑：《镶白旗满洲公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2004年7月，第18页。

㊵费莫瑞丰辑：《镶白旗满洲公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2004年7月，第400页。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先农坛庆成宫彩绘

胡一红 胡东波 康葆强

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帝王祭祀先农的场所,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实物见证。目前,先农坛的建筑布局保存基本完整,是明、清皇家祭祀建筑的杰出范例。其中,作为装饰的建筑彩画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2002年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托,在美国世界遗产基金会资助下,我们对先农坛古建筑中保留的油漆彩画进行了分析研究。本文探讨的彩画地仗的凯氏定氮法分析即为研究项目之一。

一、历史上彩画、地仗制作简述

油漆彩画是对传统木构建筑表面进行防朽保护和艺术装饰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木结构外部刷上丹红的颜色,早在春秋时代就开始了;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是见于古书上关于鲁国的记载的”^①。到了元代,油漆彩画就已经开始作地仗了,1925年在赤塔附近发掘元移帮哥王府(成吉思汗之孙)废墟时,在残木柱上发现有“用粗布包裹涂有腻子灰,表面绘有动物形象的泥饼”,证明元代建筑彩画就有地仗。

但是元代以前有关地仗方面的资料尚未发现^②。

明、清时期,建筑彩画并不是都有地仗。“明朝修建宫殿多采用楠木,架、枋、椽、柱完全使用整木材,经过平、圆、直后,表面光滑,直接在木骨上进行油漆彩画,从不作披麻,油灰地仗。如北京明代建造的故宫诸门……”^③。

有地仗的明、清建筑彩画,从用料上可大致分为二类:一是无血料地仗,二是加血料地仗。早期的彩绘地仗是没有血料的,这在很多资料中都可以见到,如:“明代开始用灰油(桐油、土籽、章丹)、白面和生石灰水制成‘油满’,兑入砖灰后敷于木构件表面,成为油漆漆底,即为‘地仗’”^④。“到了清代,多采用小木料拼帮做法,木件表面粗糙干裂,多缝隙,要用油灰作地仗,使其表面平滑整齐,然后才能进行油漆彩画”。早期的地仗“用面粉或豆面调和桐油紧附在木骨表层上,形成一层薄薄的地仗。由于面粉与桐油富有粘性。能够干结硬化,牢牢地与木材相结合,不易脱落或破裂,至清初依然使用”^⑤。目前地仗中加血料已成为古建保护维修中常用的方法,但是具体何时开始

使用血料地仗,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一般认为清朝后期地仗中开始掺入血料,认为“清代晚期为节约粮食,以血料代替部分油满”^[6]。此做法延续至今。

从保存下来的彩画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先农坛建筑彩画是有地仗和麻布的。而且先农坛建筑中留存的油漆彩画曾进行过多次重绘,部分地方可见多达三层的彩画。只是一些重绘的彩画并没有重新披麻,而是在原有彩画上施加一层薄薄的地仗,然后绘画而成。

二、彩画地仗的凯氏定氮法分析

凯氏定氮法 (the Kjeldahl Nitrogen Determination Method) 是国标规定的粗蛋白质测定方法(GB 6432-86)。采用凯氏定氮法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测试和比较地仗层中粗蛋白含量,计算地仗中是否添加血料。其主要分析原理是利用蛋白质为复杂的含氮有机化合物这一特性。蛋白质的分子量很大,大部分高达数万至数百万,分子的长链从数纳米至 100nm,它们由 20 种氨基酸通过酰胺键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并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所含的主要化学元素为 C、H、O、N,在某些蛋白质中还含有 P、Ca、Fe、I 等元素,但氮的相对丰度基本稳定,是区别于其它有机化合物的主要标志。一般蛋白质含氮量平均为 16%,即 1 份氮素相当于 6.25 份蛋白质,此即蛋白质系数。分析中,将样品与硫酸和催化剂一同加热消化,使蛋白质分解,分解的氮与硫酸结合生成硫酸铵。然后碱化蒸馏使氮游离,用硼酸吸收后再以硫酸或盐酸标准溶液滴定,根据酸的消耗量乘以蛋白质系数,即为蛋白质含量。

经过对动物血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粗蛋白含量很高(见表 1)。由于使用白满的地仗与掺入猪血血料的地仗相比,二者的粗蛋白含量差别应该较大,因此通过分析结果可大致判断出先农坛彩画地仗的制作年代。

表 1 动物血蛋白质含量^[7]

名称	产地及来源	粗蛋白	说明
血粉	广州 熟牛血	84.8%	
血粉	贵州 猪血粉	80.2%	
血粉	湖南攸县	85.8%	
植物油			主要为脂肪,粗蛋白很少

三、地仗中蛋白质可能的来源

要通过凯氏定氮法分析地仗中的蛋白质含量,首先需要确定地仗中哪些材料含有蛋白质。按照清代言工油饰地仗油满材料配比:桐油 100 斤,白灰 50 斤,白面 50 斤,砖灰(官书初制不用血料)^[8]。

白灰与砖灰是经过高温烧制的材料,除了个别情况下产生污染,不会有蛋白质存在。

灰油,制作灰油的材料主要是生油(生桐油),土籽和章丹。土籽和章丹都是矿物质原料,桐油的主要成分是桐(油)酸的甘油酯,并含有少量的油酸和亚油酸的甘油酯,蛋白质含量很少,可以不计,干物质通常在 99.5% 以上。

面粉,对于油满地仗,蛋白质主要来源应该是面粉,面粉的粗蛋白含量大约为 8%~11.7%^[9]。

如果按照上述油满地仗比例,在不计入砖灰时,油满中粗蛋白含量为 2%~2.9% 左右。但是在制地仗时,如加入砖灰,蛋白质的含量还要低很多。在实际制作地仗时,加入的砖灰量一般没有确切的比列,工匠在实际使用时根据情况酌情使用,通常最上层细灰的砖灰量比较多^[8]。

血料,主要来源是猪血。如果地仗中使用血料,地仗中的蛋白质含量应大大增加。通常猪血的固态物质含量约为 20% 左右,蛋白质含量为 18.9g/100ml^[10],考虑比重的因素,猪血的蛋白质含量大致在 17% 以上,猪血在制血料过程中加入石灰水^[8],所以蛋白质含量应低于这个范围。所以除了面粉中的蛋白质外,血料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原材料。

综合看来,地仗中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来自面粉和猪血。

四、分析结果和讨论

1、分析样品的来源及样品编号：

1#：“庆成宫前殿地仗”3-绿，地仗颜色：淡土灰色；

2#-1：“庆成宫后殿外檐明间额枋青绿”，地仗颜色：深土灰色；

2#-2：“庆成宫后殿地仗”来自“庆成宫后殿次间东缝穿插青绿”，地仗颜色：深土灰色；

3#：“祭器库正殿明间地仗”来自于J-1红，地仗颜色：土黄；

4#：“祭器库正殿东进间地仗”来自于J-4绿色，地仗颜色：土黄；

5#：“祭器库正殿西进间地仗”来自于J-6蓝，地仗颜色：淡土灰色；

6#：“祭器库正殿东进间地仗”来自于J-7大片红，地仗颜色：土黄；

7#：“祭器库正殿东进间地仗”来自于J-4三色，地仗颜色：深灰色。

为了便于对比，选取一个现代古建修缮中使用的“一麻五灰”含血料彩画地仗材料进行分析，样品来自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公司。下料配比：面粉 0.27，血料 7.03，砖灰 6.54，灰油 1.51，光油 0.36，生桐油 0.25，精梳麻 0.29^③。按照面粉和血料的大致蛋白质含量，可以计算出这种彩画地仗中的粗蛋白含量应低于 11.5%，砖灰的含量大致为 61.55%。

2、先农坛彩画地仗的粗蛋白分析

(1)分析目的：

分析先农坛彩画地仗中粗蛋白的含量。

(2)分析方法及条件：

先农坛彩画地仗的分析中，将地仗与颜料层进行了分离，防止二者中的胶凝物质相互干扰。

标准：GB 6432-86 粗蛋白测定方法

仪器：瑞士 büchi-324 型定氮仪

方法：全量法

测样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所

(3)分析结果：

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先农坛彩画地仗中粗蛋白含量（6组样品，8个样）为 1.61%~5.82%；现代样品 1 个，粗蛋白含量为 9.62%（见表 2）。

从分析结果来看，现代的样品粗蛋白含量很高，为 9.62%。先农坛庆成宫后殿的地仗中的粗蛋白含量比较高，数值为：2#-1 号样为 4.46%，2#-2 号样为 5.82%，明显高于先农坛其它各处建筑彩画地仗。

相比而言，1# 庆成宫前殿地仗的粗蛋白含量较少，为 2.61%。5# 祭器库西进间地仗的粗蛋白含量与 1# 庆成宫前殿地仗的粗蛋白含量相差不多，为 2.56%，而 3# 祭器库正殿明间和 6# 东进间地仗的粗蛋白含量最少，都为 1.61%（见表 2）。

表 2 先农坛建筑彩画地仗凯氏定氮法分析结果

样品来源	样品位置	地仗样品量(g)	地仗中粗蛋白含量(%)
1#	3-lv	0.6007 0.5638	2.61(双样)
2#-1		0.1802	4.46
2#-2		0.1364	5.82
3#	J-1	0.2739	1.61
5#	J-6	0.4933	2.56
6#	J-7	0.3602 0.2448	1.61(双样)
现代样品 2	房修一		9.62

注：表中含氮数量数据后未注“双样”者，为单一样品。

3、先农坛彩画地仗石灰、砖灰比例分析

(1)分析目的：

分析先农坛彩画地仗中有机成分与石灰、砖灰的比例，以便进一步确定是否使用血料以及面粉和血料的比例。

(2)分析方法及条件：

此分析方法是通过 550℃ 高温烧失并计算出面粉、桐油等有机成分的总比例，灼烧温度不能超过 600℃，因为 CaCO₃ 在 600℃ 以上开始分解^③。再用盐酸去除石灰，剩下的物质计算为砖灰的重量。在制备桐油时加入的少量土籽、章丹等材料，由于其在最后的地仗材料中所占比例较小，分离困难，同时考虑其不会对石灰、砖灰的比例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没有单独分析计算。

分析步骤：

A)将地仗与颜料层进行分离,防止二者中的物质相互干扰;

B)准备坩埚,将坩埚放入马福炉中反复干烧到 900℃至恒重后称重备用;

C)将分离出来的地仗样品用玛瑙研钵研成粉,放入坩埚中置于干燥器中 24 小时,称出粉状样品的重量;

D)将装有样品的坩埚放入马福炉中烧至 550℃并保温 2 小时,自然冷却后放入干燥器中 24 小时,称出粉状样品的重量;

E)用 1N 的盐酸浸泡后再过滤,并用蒸馏水反复清洗,烘干、干燥器中冷却、称重。

使用设备:德国 Nabertherm 公司 HT40/16 型高温炉。

(3)分析结果:

从分析结果看(见表 3),古代样品烧失物比例为 9.88%~18.37%,盐酸溶解物比例为 10.99%~20.27%,残留物比例为 61.36%~78.68%。

可烧失物中,3#样品的烧失物最小,为 9.88%;5#样品的烧失物最多,为 18.37%。

盐酸溶解物,以 5#样品的盐酸溶解物最多,为 20.27%;2#-2 样品的盐酸溶解物最少,为 10.99%。

残留砖灰以 2#-2 样品最多,为 78.68%;5#样品最少,为 61.36%。

现代样品烧失物为 23.49%,残留砖灰 76.51%。

在研磨样品过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细小的白色颗粒,加入稀盐酸后,也看到有气泡生成,所以可以初步判断地仗中有石灰的存在。

表 3 先农坛彩画地仗各种成分比例

样品号	样品量(g)	烧失物(%)	盐酸溶解物(%)	残留物-砖灰(%)
1#	0.1190	12.61	17.56	69.83
2#-2	0.1975	10.33	10.99	78.68
3#	0.6590	9.88	13.61	76.51
4#	0.2034	13.86	12.34	73.80
5#	0.1845	18.37	20.27	61.36
7#	0.49363	10.31	11.06	78.63
现代	0.91502	23.49	//	76.51

注:由于现代样品中以火碱熟化面粉,没有石灰,所以分析中没有进行盐酸溶解过程。

(4)分析结果讨论:

分析结果中,烧失物可以考虑为面粉与灰油的总量;盐酸溶解物为碳酸钙(CaCO₃);残留物计为砖灰。

①从分析结果看烧失物与石灰的比例

先农坛彩画地仗的烧失物与碳酸钙之比平均为 1:1.15,考虑到生石灰与碳酸钙比重上的差别(56:100),烧失物与生石灰之比大致为 1.7:1。如果根据不加血料,只用灰油、面粉、石灰、砖灰组成的地仗计算,与记载中:桐油 100 斤,白灰 50 斤,白面 50 斤计算得出的烧失物与石灰之比 3:1 有出入。

②蛋白质含量的分析讨论

如果前文文献中所说,按照油满地仗比例,在不计入砖灰时,油满中粗蛋白含量为 2%~2.9%左右。计入砖灰后,以砖灰最少的 3#样 61.36%计算,地仗中粗蛋白含量应为 0.77%~1.12%,3#样分析得出的粗蛋白含量为 1.61%;以砖灰最多的 2#-2 样 78.68%计算,地仗中粗蛋白的含量应为 0.43%~0.62%,而 2#-2 样分析得出的粗蛋白含量为 5.82%,可见 2#-2 样计算与分析间产生的差别是较大的。

可以看出,这一计算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材料比例计算的,而分析结果,3#样的可烧失有机物与石灰之比不是 3:1,而是 1.3:1,2#-2 样是 1.7:1,由于有机物的减少,蛋白质含量应该更低才符合逻辑。

如果按照加入血料的地仗计算,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油水比例。在彩画施工中,“油”代表白满,“水”在这里是代表血料的意思。油水比例 1 比 1,行语叫一油一水满,为质量中常的满,最好的有一水二油的,也有 1.3 个水比 3 个油的,质量较次的工程也有用一油二水的^⑤。上述油水之比是体积比,所以很难作为准确计算数据。同时,在制作血料时也加入石灰水,所以血料的加入有可能是导致石灰含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 1#样“庆成宫前殿 3-绿”地仗、2#-1 样“庆成宫后殿外檐明间额枋青绿”地仗、2#-2 样

“庆成后殿次间东缝穿插青绿”地仗中应含有血料。

3# 样的“祭器库正殿明间”地仗、5# 样“祭器库正殿西进间 J-6 蓝”地仗、6# 样的“祭器库正殿东进间 J-7 大片红”地仗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③ 误差分析

在分析中虽然尽量避免各种因素造成的误差,但是由于样品量少,另外制作油灰时加入的土籽等添加物未计算在内,而且石灰中通常含有 8% 左右的杂质,因此对误差会产生一定影响。采样过程中,虽然尽量避开被雨水冲刷的部位,但由于面粉等有机物在制作和长期保存中产生的分解在所难免,所以也难以定量进行计算。

五、血红蛋白分析

为了定性判断先农坛彩绘地仗层中是否含有动物血,确定上述初步分析是否准确,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技术队对先农坛祭器库 3# 样的“祭器库正殿明间”地仗、5# 样“祭器库正殿西进间 J-6 蓝”地仗、6# 样的“祭器库殿东进间 J-7 大片红”地仗和 1# 样“庆成宫前殿 3-绿”地仗的四个样品进行了动物红蛋白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先农坛祭器库的 3 个样品(3、5、6# 样)不含动物血,先农坛 1# 样“庆成宫前殿 3-绿”地仗含有动物血。

六、结 论

通过凯氏定氮法,可以分析出古代彩画地仗中粗蛋白的含量:

凯氏定氮法可以初步判断出 1# 样“庆成宫前殿 3-绿”地仗、2#-1 样“庆成宫后殿外檐明间额枋青绿”地仗、2#-2 样“庆成后殿次间东缝穿插青绿”地仗含有血料;

凯氏定氮法对 3# 样的“祭器库正殿明间”地仗、5# 样“祭器库正殿西进间 J-6 蓝”地仗、6# 样的“祭器库正殿东进间 J-7 大片

红”地仗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推断先农坛庆成宫彩画制作年代应晚于祭器库的彩画,制作时间应在清代后期或更晚;

动物血红蛋白的分析可以定性的分析出古代彩绘地仗是否含有动物血;

先农坛彩画地仗的砖灰含量在 61.36%~78.63% 之间,石灰含量在 10.99%~20.27% 之间,可烧失有机物占 9.88%~18.37%。

①林徽因:《林徽因讲建筑》,九州出版社,2005 年 12 月,142-143 页。

②③⑤马瑞田:《中国古建筑彩画》,文物出版社,1996 年,94 页。

④⑥《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 年,872 页。

⑦数据来自《中国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农业出版社,1985 年。

⑧王璞子:《清官式建筑的油饰彩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 年第 4 期,68-72 页。

⑨香川绫:《食品营养成分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 年,158 页。

⑩《油饰彩画作工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45 页。

⑪苏建新等:《血粉的制备及其消化率的研究》,《饲料研究》,1998 年第 6 期,7 页。

⑫《油饰彩画作工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42-43 页。

⑬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古建分册(下)》,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年,75 页。

⑭刘巽伯、魏金照、孙丽玲:《胶凝材料-水泥、石灰、石膏的产生与性能》,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年,23 页。

⑮《油饰彩画作工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44 页。

(作者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业务技术人员)

北京石刻文献整理的新成果

——《房山墓志》序

齐 心

端午节的前一天，房山区文管所的陈亚洲所长来访，示以其整理编纂的《房山墓志》书稿，“求为审定”，并征序于予。

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老文博工作者，也许是出于职业的偏爱，我对于有关北京历史、考古方面的论著，可谓情有独钟。特别是近年每当看到年轻的同志有新著面世，则更觉欣悦异常。往往在先睹为快之后，为他们经过艰辛努力取得的收获而由衷高兴。《房山墓志》的成帙和即将付梓，便是一位年轻的文物工作者，奉献给喜欢历史、考古、书法、艺术研究的读者一本资料性读物。也是北京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新成果。

房山区位于北京西南郊，其历史之悠久，历史文物蕴藏之丰富，可称京都之首。在已知的历代文化遗存中，房山文物尤以各类古代刻石数量为最多。据当地文物部门调查统计，今北京房山区域内的古代石刻，即使不包括云居寺所藏的一万四千多块石刻经版，目前尚能见到原石的碑、幢、造像、摩崖、建筑构件等石刻文物，就有近千件。这些古代石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负载的历史信息和文献、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特别是研究北京历史的宝贵资料。努力保护、认真整理和及时向社会发布这些石刻文献资料，是我们文博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房山墓志》一书，辑入早年出土和近年发现的志墓之石（其中包括墓幢、墓碣）53件，其个体文物形成的年代，上限起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下限止于明思



宗崇祯十年（1637年），著录志文3万余字。

书内收隋唐墓志13种，均为近年出土。房山发现的隋唐志墓之石，不仅在北京各区县出土的同时代墓志中数量居多，而且文献价值也相对较高。如1992年出土于房山韩村河镇的《韩智墓志》和《韩辅墓志》，皆可称精品。二石志文涉及北齐、隋初时涿郡及幽州政体的演变，信息丰富，对于研究北京地区南北朝后期至隋代初年的历史，可资征引。又志载韩智、韩辅父子晚年皆皈依佛教，曾舍财并劝导乡亲刻造佛经。按韩氏父子所居之“燕国良乡县梓邑多临

流里”(即今房山韩村河镇内),距当时的白
带山智泉寺(今称石经山云居寺),仅 10 余
里,史载僧静琬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在白
带山开创了历时千载的刊制石经的事业。
而据此志文记述可知,至少在北齐末年
静琬之师慧思主持智泉寺时期,刻经活
动已在寺院僧人和民间佛教信徒中间
进行了。

1992 年 5 月出土于房山城关镇的《
贝国太夫人张氏墓志》,志石雕饰之精,
志文辞翰之美,刻写书法之高妙,在北
京地区出土的唐石中,可称杰作。经
有的研究者详考,张氏之夫,乃唐开
元二十年(732 年)归降唐王朝的北
方奚族酋长李诗,降后唐廷授赐王
爵以宠络之,其所治的“归义都督
府”,系唐代设在幽州地区(今北京)
的羁縻州府之一,府治侨治于今房
山区长阳镇的广阳古城。又墓志记
张氏长子李献诚,系安禄山之婿,
建中元年死。此石刊于唐大历十
年四月,对于研究唐代安史之乱前
后幽州的历史,可资征引补阙。

《刘如泉墓志》(唐建中三年)、《蔡
雄墓志》(唐贞元十九年)与《张道
升墓志》(唐永贞元年)三石,皆刊
制于唐德宗李适时期,志主生前的
活动也主要在该时期。须注意的是,
志主三人均为当时割据于幽州地
区,号为“四凶之首”的幽州节镇
朱滔的心腹部将。他们先后参予
帷幄,将兵沙场,或对抗朝廷,或
与河北三镇互相残杀,后来有的
死于战场,有的受任一方,死于
治所,都是当时幽州地区的风云
人物。为深入理解三篇志文的史
料价值,应首先弄清当时的社会
背景:德宗时期的唐王朝,政治上
受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影响,
中央集权统治已趋瓦解之势,朝
廷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地方上藩镇割据,时叛时附。当
时作为“安史之乱”策源地的幽
州地区,安禄山、史思明虽死,但
其属下的叛将仍手握重兵,各据
一方,表面上臣服唐王朝,暗地里
心怀疑惧,自行其事,或混战争
夺地盘,或联手以抗中央,这种局
面终德宗一朝,几乎少有改变。
如上述三志中提到的“朱公”、“
连帅朱公”、“大冀王”,就是指
时任幽州卢龙节度

使的朱滔。史载朱滔为人凶险,大
历七年(772 年)七月与其兄朱
泚谋杀朱希彩而得势,后推朱泚
入朝而得幽州节镇大权。朱滔任
节度使后,对唐王朝时附时叛。建
中三年(782 年)朱滔与王武俊、
田悦、李讷等藩镇,联兵以抗朝
廷,双方大战于魏州。《刘如泉墓
志》称志主:“建中三年六月三十
日,于魏国峡山两军相遇,彼众我
寡,当日阵亡”,即指那次战争。而
志中所谓“连帅”,即是说朱滔乃
四大藩镇“联兵”之首。史载建
中三年十一月,四大藩镇首领聚
在一起,自封王号:朱滔被推为盟
主,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
称赵王,李讷称齐王,故《刘如泉
墓志》中有“大冀王南面听政”云
云。又《蔡雄墓志》谓蔡雄在朱滔
死后的贞元三年(787 年)二月
十六日死于治所任上,而《资治
通鉴》载兴元元年(784 年)五
月,朱滔与王武俊等战于贝州,
遭重创,战后朱怨怒蔡雄力主速
战失策而杀之。此志可正史载之
误。

《房山墓志》所收辽代墓志,以
《孟初墓志》为最精。此志刊于辽
天庆七年(1117 年),记志主孟初
于天庆四年(1114 年)以文职官
而将兵,赴沈州(今辽宁沈阳),
迎击女真首领阿骨打而殁于战
事,其文可补史之阙。另外,此志
的志主孟初与撰文者虞仲文,均
为辽末名士,文章冠绝一时,赖
藉此志,而能传其行实、文章,
石刻文献,可轻视欤?

审此书所收辽、金两代志墓之
文,刻石类型上,多为释子灵塔铭
和佛教信徒的墓幢题记,其中,辽
代 11 石、金代 13 石。在以往的一
些金石著作中,有的研究者就把
塔铭、墓幢与墓志归为同类。清
末叶昌炽《语石》卷四《塔铭》条:
“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以铭,犹世
法之有墓志也。然不尽埋于土中,
或建碑,或树幢。其纳诸圻者,或
用横石,修一之,广倍之,或方径
不逾尺,其通称为功德塔。大历
以后,智悟、如愿之类,亦多从世
法称墓志。思恒律师称志文,或
称方坟记……唐时刻石,又有窳
堵波铭。窳堵波者,梵言塔也,亦
即浮图之转音。宋金元时,只有
普通塔,亦谓之一海会塔,乃是僧
徒丛葬之

碣”。罗福颐在《满洲金石志补遗·僧智福坟幢》跋尾云：“幢称僧智福幢子一所，年八十四，是此幢乃立坟前者。其风始于唐而盛于辽金，唐有乾符三年王夫人墓铭幢及咸通辛卯唐安精舍尼澄素坟幢，晋有天福七年张敬思坟幢，宋有雍熙四年赵郡李恕坟幢，并其前例也”。近年各地所出墓志中，已有将塔铭、墓幢收录者，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就收入塔铭、墓幢记多篇。

灵塔与墓幢，属佛教文化刻石，而墓幢是从经幢演变而来，逐渐成为一种以志墓为主的石刻。其中释子多建形制较大的幢形石塔，大都置于伽蓝旧地，佛教徒的墓幢一般形制较小，多立于茔地坟前。在本书辑录的刻石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这种刻石，作为“自称”，还出现了“坟塔”、“寿塔”、“冢塔”、“石浮图”、“无缝塔”、“顶幢”、“塔子”、“幢塔”、“墓塔”等一些当时人们对这种刻石的称谓，表明了这类幢石，是经幢与砖造墓塔融合、演变的产物。它的材质虽然仍为石质，但形制上愈来愈接近于砖制的浮图，如《严行大德灵塔》、《琬公大师塔》等，或作密檐，或仿刻门窗，或浮雕、线刻人物、花卉图案，俨然一袖珍式墓塔。在这类墓幢中，佛教经文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八面施刻的幢身，经文仅占一到二面。有的则干脆不施刻经文，全部刻写墓主的生平、事业，这类刻文称为“塔铭”或“塔记”。其实，从文体的角度上看，这类铭、记与墓志、碑文几乎毫无二致，也是先序（散文）后铭（韵文），首叙墓主家世籍贯，再记其事业，末尾赞其高行并悼伤其逝。在某种意义上说，墓幢也是一种立于地面上的圜铭或墓志。

房山地处京畿西南要地，大房山素有幽燕奥室、京都胜概之誉，远自隋唐时期，便成为中国北方的一处佛教文化活动中心，故佛教文化遗存甚多。今本书所收辽

金塔铭、幢记，对于研究辽、金两代的宗教政策和佛教活动的历史，足资征引者甚多。

相对众多的佛教刻石，与道教相关的志石，《房山墓志》仅辑入一种，即《玄静达观大师刘公墓志》。志主刘志厚，字伯淳，道号广阳子，金末元初人，他生于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歿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他是元初燕京（今北京）地区著名的道士。他精儒学，长于诗文书法，一度入仕为官，后避乱隐居，礼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为师。后受师命创建道观数座，被公推为“三山洞主”，得诏赐金衣紫服并大师之号。此志的发现与著录，对于研究元初燕京地区的道教活动历史，有重要价值。

此书收明代墓志8件，大多为明代中晚期中、下层官吏圜中之石。其中刊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王之佐墓志》，形制较大，雕饰华贵，书法工谨端秀，文词腴媚，可谓别出一格者。志主王之佐乃一内官，生前得当权大太监曹某引为心腹，官至“乾清官管事提督宫内两司房兼掌尚衣监印务尚膳监太监”。此志撰文者兵部尚书陆完学，篆盖者太傅襄城伯李守筠，书丹者兵科右给事中姚恩。志文少有实际内容，而满篇媚言阿辞，读之肉麻——于此可见明末宦官权势之大，朝臣趋奉之丑。风气如此，明朝待何不亡！

此书作者陈亚州，是一位工作在房山文物部门近二十年的年轻同志，他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家乡文物，注意保存资料。本书所收的一些刻石，不少都是经他之手从野外运回单位得以保存，而书中所附石刻拓片，也多半由他亲手捶拓。现在，作为房山文物管理所的负责人，他又利用近二年的时间，把这些石刻资料整理发表，以便供全社会的研究者交流使用。作者之诚，深可嘉许，聊写上文，谨以为序。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19至20世纪研究 北京民俗的外文文献介绍



赵晓阳

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京城,随着外国势力的日趋进入,以及北京历史文化的逐渐被介绍传播到国外,北京逐渐发展为世界性城市。本文将介绍笔者所见的21种外国人撰写的北京民俗方面的书籍,其中北京城的中国人生活书籍9本,北京城的外国人生活书籍12本,每本包括语言种类、版本情况、出版时间、作者简介、目录等基本资料。

一、北京城的中国人生活

1.《北京与北京人:卫生习俗研究》
(*Pekin et ses Habitants; Etude d'Hygiène*)
(1869年,法文)

乔治·奥古斯特·莫拉基(Georges Auguste Morache, 1837—?)撰写,无插图,共164页,1869年巴黎J.B. Baillière et Fils出版。作者为法国皇家医学校的教授,法国驻北京使馆的医生。本书是以北京地区的公共卫生、管理以及社会福利为主题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对这方面研究和调查的书籍非常少,而本书涉及讨论的是19世纪70

年代以前的情况,作者又是以非常专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所以非常珍贵。

全书共11部分:一、土地构成;1.华北直隶省(今河北)的情况;2.地质学;3.气象。二、城市地形和人口;1.北京平面图;2.城市面积与人口;3.交通道路;4.公园与散步。三、城市的灌溉、道路与墓葬;1.北京的降水;2.下水道和污水管网;3.埋葬与墓地。四、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1.取暖系统;2.戏院;3.兵营。五、公共食品供应和食品内容;1.可支配的动物产品;2.可支配的植物产品;3.饮料和酒;4.配送餐。六、几种民族的人种;1.黏土人和汉人;2.穆斯林;3.下层人口。七、生活状况和公共卫生;1.工业;2.公共教育;3.身体卫生;4.中国人的脚部畸形;5.鸦片问题。八、北京的贫困问题;1.乞丐;2.捡来的儿童、承娶;3.女性卖淫;4.梅毒;5.男性卖淫;6.太监。九、医学训练和医学职业;1.中国社会用的医生;2.流产,刺激性欲的药物;3.皇家医院;4.医生教育的缺乏;5.在军队里的医生和法医。十、生理学和病理学因素;1.个人的进展;2.死亡率和自杀率;3.季节性疾病;4.土地疾病;5.

因卫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6、地方性流行病;7、意外性疾病。十一、结论。

2、《胡同风景与北京人习俗》(Sènes de la Vie des Hutungs; Croquis des moeurs Pekinoises)(1922年,法文)

让·布绍(Jean Bouchot)撰写,1922年由那世宝(Albert Nachbaur)出版第2版并撰写前言,封面的中文题名为《首都里巷写真》,无照片,有插图,共215页。

全书共16章:1、提供的宗教仪式与祈求;2、误会;3、在胡同里;4、盲人;5、走向;6、生长的死亡;7、婚姻之神;8、双轮大车;9、洪亮;10、祖先;11、中国人的辫子;12、老年的中国;13、高贵的长袍;14、宽容的交易;15、象牙;16、天马与车夫。

那世宝(1880—1933),法国报人。1919年来华,任法文《北京新闻》(Le Journal de Peking)社长兼主笔。曾先后开设过那世宝印字馆(Imprimerie Na-Che-Pao),那世宝书店(Librairie Albert Nachbaur),那世宝万国无线通讯社(Agence Nache Pao)。著有《北京漫谈》(Pekinades,1921年);《北京漫谈续编》(Encore des Pekinades,1924年);《中国民间画》(Les images Populaires Chinoises,1931年)。他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关老北京的法文书籍。

3、《农历:中国人风俗节日记》(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 and Festival)(1927年,英文)

裴丽珠(Juliet Bredon, ?—1937)和米托发诺(Igor Mitrophanow)合著,1927年由上海的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出版,1930年别发洋行再版,1931年伦敦的别发洋行再版。全书共522页,37幅有关风俗、建筑方面的照片,非常清晰。以中国农历为主线,讲述了以北京地区为主的中国风俗习惯。

全书共15章:1、中国日历;2、众神图;3、皇家礼仪;4、十二月:痛苦月;5、一月:节日月;6、二月:萌芽月;7、三月:睡月;8、四月:牡丹月;9、五月:龙月;10、六月:莲花

月;11、七月:饿鬼月;12、八月:收获月;13、九月:菊月;14、十月:友好月;15、十一月:白色月。

裴丽珠长期居住在中国,她是总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 Bredon)的女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内侄女。除此书外,她还写有《赫德爵士传奇》(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1909年)、《中国的新年节》(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s, 1930年)等书。虽然作者声称此书为中国的风俗节日记,但作者长期生活在北京,内容也是以北京为内容的。米托发诺是俄国外交官,1914年来华。

别发洋行是著名书店及出版社,1870年开办,前身为凯利(J.M. Kelly)经营的书店和沃尔什(F.G. Walsh)经营的印字馆。先后在上海的黄浦滩及南京路营业。在香港、汉口及新加坡、横滨设有分号,在上海及香港设有印刷厂。以经营西文书籍印刷出版业和文具制造业,兼营报刊代理及烟业贸易,进口经销英美书刊、文具、纸张等。该出版社20世纪曾出版过大量以研究记述北京为主题的西文书籍。笔者2005年在香港仍见Kelly & Walsh标志的书店,现在已无出版业务。

4、《北京生活杂闻》(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1927年,英文)

燕瑞博(Robrt Willia Swallow, 1878—1938)撰写,1927年由北京的中国图书有限公司(China Booksellers Ltd.)初版,1930年北平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再版。全书135页,50张有关市民生活的照片。英国传教士、商人周永治(Hardy Jowett, 1871—1936)撰写的序言。

全书共12章:1、一个愉快的城市;2、胡同和居民;3、街头小贩;4、上四条胡同;5、当铺、中间人和放债人;6、饮食和餐馆;7、演员和戏院;8、各种职业;9、城门、地名和旅游景点;10、政治家、官员和教育家;11、婚礼、出生和生日;12、神话世界:水鬼、城墙鬼、吊死鬼、鬼节、狐精及其它等。

燕瑞博是英国传教士的后代,出生于

宁波,1902年在英国受教育后返华。曾在山西大学任教,1912-1916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员。他专门研究中国古董,专为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本报为在中国大陆出版历史最久的外文报刊,1864年创办,1951年停刊。)撰写有关中国风俗及古董的文章,后死于上海。还著有《古代中国的铜镜》(Ancient Chinese Bronze Mirrors,1937年)。

5.《满族的风俗和迷信》(Manchu Customs and Superstitions)(1928年,英文)

柏干太太(M.L.C.Bogan)撰写,1928年由天津和北京的中国图书有限公司(China Booksellers Limited)出版,共148页,照片27幅。作者以中国农历为主线,非常细致地观察讲述了以北京地区为主的风俗习惯,并对北京这个可以被称为“移民城市”的风俗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书18章:1.十二月;2.一月;3.二月;4.三月;5.四月;6.五月;7.六月;8.七月;9.八月;10.九月;11.十月;12.十一月;13.满族的婚礼;14.满族的葬礼;15.孩子的出生;16.儿歌;17.出生庆祝;18.各方面资料。

6.《北京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1928年,英文)

林志宏(音译)(Jermyn Chi-Hung Lynn)编著,1928年由美国图书有限公司(China Booksellers Ltd.)出版。全书共182页,10幅有关北京风俗方面的照片。通过描述民国初年北京人的生活,在服饰、婚葬、娱乐、休闲等几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说明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和过渡。

全书共12章:1.前言;2.拜访;3.娱乐;4.游戏;5.戏院;6.公园;7.集市;8.酒店;9.婚礼;10.葬礼;11.服饰;12.结语。

作者林志宏留学国外,曾任内务部官员和大学老师,自称此书为外国人了解北京而著。

7.《吴氏经历:一个北京人的生活周期》(The Adventures of Wu, the Life Cycle

a Peking Man)(1940年,英文)

罗兴霖(H.Y. Lowe)(音译)撰写,1940年由北京时事日报(The Peking Chronicle Press)出版,1983年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再版。共239页,无照片。记述了20至30年代的一位小康之家的北京人从出生到成家的生活经历。书中包含了大量的有关北京传统风俗的描述和记述。

全书共24章:1.吴的家庭介绍;2.儿子的出生;3.三日洗澡;4.满月;5.拜访祖父母;6.第一年;7.请大夫;8.妙峰山;9.中国的儿歌;10.北京的花市;11.三个特别的寺庙:九天庙、雷电神庙和十八层



地狱;12.每个季节的游戏;13.私家花园;14.儿童游戏;15.龙舟节;16.哈德门外的寺庙;17.说书人;18.夏季时光;19.走向知识的第一步;20.钓鱼;21.上学;22.吴老先生的生日;23.70个月的7天;24.祭祖。

8.《殷老太太:1926—1938年北京生活的记忆》(Old Madam Yin: a Memoir of Peking Life, 1926—1938)(1979年,英文)

蒲爱德(Ma Pruitt)撰写,197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全书15章,无目录,共129页。

本书描述了一个几乎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北京富裕人家的生活,附有一张照片的殷老太太是作者钦佩的坚强的中国老太太,她的规矩和为维持家庭所做的努力,反映了中国妇女善良、宽容和聪慧等品质。书中还描述了中国人对妇女的歧视,认为这是西方人非常不可能理解的。

蒲爱德是美国南浸信传道会女教士,生于中国,父亲是在山东传教的传教士蒲

其维 (Cicero Washington Pruitt, 1857—1946)。她在山东生活到 12 岁回美国受教育, 1912 年美国大学毕业后回烟台传教。后来辞去教会职务, 1918 年至 1938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主任。她在北京的家当时曾是许多刚到中国的外国人的家。她曾将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译为英文, 英文题名为 *The Flight of An Empress*, 1936 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 和伦敦 Faber and Faber 同时出版, 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赖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写序。还著有《汉族女儿: 一个汉族劳动妇女的自传》(A Daughter of H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en, 1945 年) (廖中和、张风珠译, 1993 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题名《汉家女》) 等书, 1948 年她曾协助老舍先生将《骆驼祥子》翻译为英文, 1951 年由纽约 Harcourt, Brace and Co 出版, 题名《黄色风暴》(Yellow Storm), 翻译受到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的肯定。1996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放翻译的她的回忆录《在中国的童年》(A China Childhood)。1960 年, 她曾再次来华访问。

9、《北京风俗图谱》(1986 年, 日文)

青木正儿编图片, 内田道夫撰写说明, 采用左图右释的形式, 非常精美。共 227 页, 1986 年东京平凡社出版。分为八大部分, 一、岁时; 二、礼俗; 三、居住; 四、服饰; 五、用品; 六、市井; 七、游乐; 八、戏剧。每部分附图多幅并解释。

第一部分岁时, 插图 17 张: 1、春联门神; 2、接神爆竹; 3、元宵灯市; 4、喇嘛打鬼; 5、厂市年节; 6、白云开庙; 7、清明戴柳; 8、什刹赏莲; 9、闺女丢针; 10、盂兰法船; 11、中元莲灯; 12、二闸河灯; 13、中秋拜月; 14、重阳登高; 15、拖床冰嬉; 16、祭祀灶神; 17、腊月画棚。

第二部分礼俗, 包括婚礼和葬礼, 婚礼插图 10 幅: 1、搭棚结采; 2、送礼; 3、上轿; 4、迎亲一常礼; 5、迎亲一盛仪之一; 6、迎亲一盛仪之二; 7、迎亲一盛仪之三; 8、迎亲一

盛仪之四; 9、婚礼; 10、拜天地。葬礼插图 13 幅: 1、丧事搭棚; 2、停尸; 3、带孝; 4、头期法事; 5、二期法事; 6、三期法事; 7、出殡之一; 8、出殡之二; 9、安葬; 10、墓地; 11、烧船; 12、男女请安。

第三部分居住有插图 10 幅: 1、住宅全景; 2、正厅; 3、书斋; 4、卧室; 5、闺房; 6、厨房; 7、王府门前; 8、王府门内; 9、王府花园; 10、农家工作图。

第四部分服饰有插图 12 幅: 1、男子服装; 2、女子服装; 3、旗人女子服装; 4、汉人女子服装; 5、服装之一; 6、服装之二; 7、服装之三; 8、朝服; 9、礼帽和便帽; 10、妇女头饰之一; 11、妇女头饰之二; 12、男鞋女鞋。

第五部分用品插图 11 幅: 1、桌椅; 2、烟袋; 3、梳妆器具; 4、厨房器具之一; 5、厨房器具之二; 6、运水器; 7、敬神器物; 8、彩灯; 9、小孩玩具; 10、风筝之一; 11、风筝之二。

第六部分市井插图 18 幅: 1、铺面全景; 2、幌子之一; 3、幌子之二; 4、幌子之三; 5、隆福寺庙会; 6、夜市摆摊; 7、壳类花制品; 8、壳类其它制品; 9、江米人; 10、11、12、馒头食品; 13、花生; 14、补锅; 15、豆腐; 16、打更; 17、骆驼骡车; 18、报馆。

第七部分游乐插图 9 张: 1、茶馆; 2、餐馆; 3、喝茶; 4、搓麻将; 5、抽大烟; 6、养鸟; 7、逗蝻蚰; 8、儿童游戏之一; 9、儿童游戏之二。

第八部分戏剧插图 16 幅: 1、戏台全景; 2、角色之一; 3、角色之二; 4、角色之三; 5、乐器; 6、小丑; 7、滦州皮影; 8、说书; 9、大鼓; 10、莲花落; 11、秧歌戏; 12、跑旱船; 13、舞狮; 14、武术; 15、猴戏; 16、耗子戏。

书后附参考书目。

青木正儿 (1887—1964),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 尤其注重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国的生活文化进行独到的探讨。1911 年京都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 1920 年首次在日本介绍鲁迅, 1922 年、1925 年曾多次来中国。曾任同志社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等校教授, 是京都派汉学的代表人物。还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1966—1970 年春秋

社出版了《青木正儿全集》10 卷本。

内田道夫为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毕业,专攻中国文字,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还著有《中国小说研究》等。

二、北京城的外国人生活

1.《北京和北京人》(*Peking and Pekinges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1865 年,英文)

芮尼(David Field Rennie, ?—1868)撰写,1865 年由伦敦的 John Murray 出版。全书共 351 页,无照片,插图绘画 12 幅。



芮尼是英国人,1860 年随英国侵略军进入北京。1861 年在北京建立英国公使馆,任使馆医生。还著有《英国军队在华北和日本》(*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 1860 年*)。

全书共 11 章:1.从热河回来;2.北京城里的外国人;3.宫廷生活;4.走在城墙里的问题;5.北京的年轻皇帝;6.从通州到天津;7.北京消息;8.回到天津;9.中国人的生活;

10.与满族官员的谈话;11.再访北京。

2.《英国学生在北京的生活》(*Where Chinese Drive, English Student—life in Peking*)(1885 年,英文)

务谨顺(William Henry Wilkinson, 1858—1930)撰写,1885 年伦敦 W.H.Allen & Co.出版,全书共 275 页,有插图,书后是出版社广告。描述了一个外国学生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是较早来北京的外国人的经历写照。作者是英国外交官,1880 年来华。

全书共 9 章:1.中国人的中国第一;2.欧洲人的北京;3.早期的责任;4.教师和教育;5.赢家;6.春天和秋天;7.在山上;8.夏天;9.考试和离开。

外国人写北京的书藉中,对北京历史、政治、建筑等客观具体描述性占多数,带有个人感受性的抒发相对少些。本书是较早的一本。

3.《头顶北京的天》(*Sous le Ciel de Pékin*)(1919 年,法文)

安德烈·迪博斯克(André Dubosq)撰写,1919 年由巴黎 Editions Georges Crés Er 出版,共 161 页,无照片插图,是关于北京各方面的描述和观感。在西文以北京为主题的文献中,客观描述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的居多,谈及主观感受和体会的相对少些,本书是其中比较生动贴切的一本。

全书共 32 章:1.天坛;2.皇帝陵;3.在孔庙;4.颐和园的青牛;5.朝着最和谐的宝座;6.在象征的保护下;7.倾听;8.发霉的旧城;9.离五亭很近的莲湖;10.玉;11.印章;12.碎纹瓷器;13.我的佛教;14.二个喇嘛;15.龙卷风;16.喜鹊;17.鱼;18.苦力;19.运水的人;20.骆驼;21.鸽子;22.蚕丝;23.明朝的大瓷花瓶;24.讲述的人;25.风景;26.斗蟋蟀;27.剃须匠;28.长江;29.水塘;30.乡村里的朝鲜人;31.墓地;32.被出售的高尚。

4.《穿过月亮门:美国人在北京的生活经历》(*Through the Moon Door*)(1926 年,英文)

葛来思(Dorothy Graham, 1893—?)撰写,1926 年由纽约 J.H.Sears & Company

出版。共 341 页,照片 32 幅,均为作者拍摄。本书英文全名为 *Through the Moon Door: The Experience of an American Resident in Peking*。作者为英国人,1902 年进中国海关工作。

● 全书共 32 章:1、中国的海边;2、两个房子和结局;3、北京的贵族;4、我们走进了月亮门;5、市场;6、懒汉;7、客人;8、两个手拉手走的人;9、紫禁城;10、慈禧的三海;11、在中国的庭园里;12、宫殿天堂;13、穿夹克的季节;14、烧香;15、生命的轮回;16、月亮;17、穿黄色袍子的道士;18、壮丽;19、新神;20、第一个月亮节的第一天;21、鬼节的舞蹈;22、春天;23、风云变幻中的格格们;24、容忍;25、四月的田园诗;26、北京的夜晚;27、皇帝的范围;28、长城;29、张家口;30、跑马场的比赛;31、西山;32、离开月亮门。

5、《英国人在北京的回忆》(*British Memorials in Peking*)(1927 年,英文)

全书共 10 页,有照片 8 张。署名“在北京的英国居民”编写,1927 年天津的天津印字馆(*The Tiensin Press*)出版。是作者的个人生活感受。

6、《丰腴年代》(*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1952 年,英文)

乔治·凯茨(*George Kates*)撰写,1952 年由纽约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1967 年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再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作序;1988 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3 版,1990 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4 版。全书 268 页,8 张照片均是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所摄影。

全书共 15 章:1、我看城墙;2、学者的家;3、先生的智慧;4、生活的舒适;5、北京城完美的设计;6、都城的面孔;7、紫禁城;8、贵族的生活;9、绅士;10、皇家庭院;11、理想的花园;12、颐和园;13、北京的山和寺庙;14、天国的时空;15、一切逝去之时的迎接。

《丰腴年代》是作者在北京 7 年的经历和感受,据 1988 年版序言介绍,他自称像

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一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并花了许多时间学习。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这个国家,但却接受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被变成了中国人,虽然他们来中国是想将中国人变成英国人或美国人。他认为中国人懂得愉快生活的艺术。凯茨后来在纽约的艺术博物馆里从事东方艺术的工作,再没有回过中国。

7、《北京:1950—1953 年》(*Peking, 1950—1953*)(1958 年,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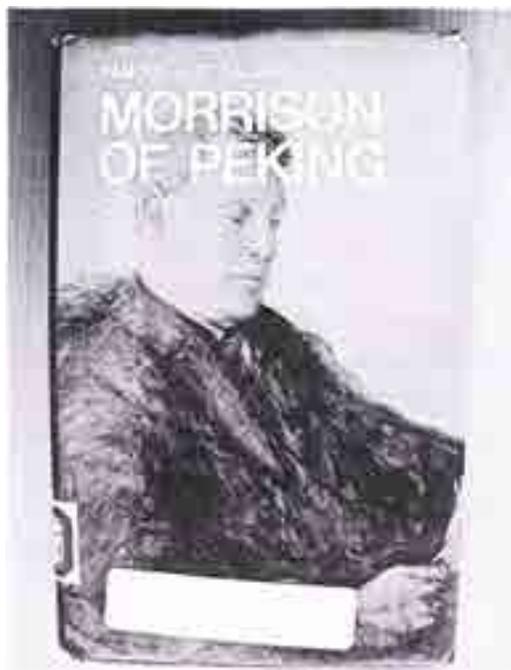
彼得·兰姆(*Peter Lum*)撰写,1958 年由伦敦 *Robert Hale Ltd.* 公司出版。全书共 190 页,照片 13 张。是作者 1950 年至 1953 年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全书共 20 章:1、香港;2、北京的序曲;3、第一印象;4、汤尼;5、中国新年;6、春天;7、五月;8、六月二十五日;9、夏季和国立假日;10、八月十七日;11、节日、十月一日和圣诞节;12、三反和五反;13、访问者和十三陵;14、狗;15、北戴河;16、黑色的天;17、鸭子;18、又一年;19、又一春;20、再见。

8、《北京的莫理循》(*Morrison of Peking*)(1967 年,英文)

由西里尔·珀尔(*Cyril Pearl*)撰写,1967 年由伦敦 *Augus & Robertson, Ltd.* 出版,当年即重印,1968 年再印,1981 年再版。全书共 431 页,照片 36 张。本书是基于他记录到临死前几天的日记、未刊稿而写成的传记,采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写成,可读性极强,不但揭示了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也描述了这个复杂性格的人。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窦坤翻译的中译本,题名《北京的莫理循》,共 607 页。全书共 14 章,但无目录。作者珀尔(1906—1987),出生于澳大利亚,任记者和编辑多年,后成为职业作家,还出版了 *Wild Men of Sydney*(1958 年)等 18 本书。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是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生性爱冒险。1887 年在爱丁堡医学院毕业。来中国后,由上海动身沿陆路到仰光,1896 年从曼谷到昆明,次年又到东三省旅行,到



过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1895—1912 年任《泰晤士报》记者，先驻印度、暹罗等地，1897 年 12 月后驻北京。1912 年袁世凯聘他为政治顾问，1917 年辞职回国。他收集的关于远东的西文书籍、杂志和报刊，当时被公以为是最完备的。回国前，他的藏书为日本人岩崎男爵以三万五千英镑购去，成为东京东洋文库图书馆的基础，曾以他的藏书为基础出版过《莫理循亚洲文库（现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一部分）目录》（Catalogue of the Asiatic Library of Dr. George Ernest Morrison, Now a Part of Oriental Library, Tokyo, Japan）。莫理循还著有回忆录《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ritish Burma, 1895 年），英国剑桥大学 1976 年相继出版骆惠敏所编的《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第一卷（1895—1912）和第二卷（1912—1920）。他是北京外侨中非常知名的人物，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西文地名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理循大街（Morrison Street），西文地名标牌一直挂到 1949 年。

9、《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1978 年，英文）

骆惠敏（Lo Hui-Min）编，共二卷，一卷（1895—1912）848 页，二卷（1912—1920）950 页。1978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剑桥大学出版社 400 年来所出版的最优秀的百本学术著作之一。1986 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书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副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由刘桂梁译，986 页，下卷由陈霞飞等译，本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流史、北京地方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由骆惠敏整理、认读、校注后结集出版，附加了大量注释，尤其是信中出现的人物和与莫理循通信的人。封二是莫理循与袁世凯的画像。骆惠敏（1922—2006）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著名华裔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和莫理循研究专家。他指出，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帝国分子的历程”，下半部分则体现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的故事，莫理循是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尽管莫理循本人对这个虚幻性的职务很厌倦，多次想辞职。

10、《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1979 年，英文）

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撰写，1977 年由纽约 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共 316 页；1986 年伦敦 Macmillan Publication Ltd. 再版，共 391 页。1986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胡滨、吴乃华翻译的译本，题名为《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约 349 页，列为义和团资料丛书。全书共 15 章：1、浪荡子；2、学者；3、历史学家；4、在两个主人之间；5、捐助人（上）；6、捐助人（下）；7、秘密代理人；8、经纪人；9、景善日记；10、争论；11、隐士；12、霍普利博士；13、回忆录（上）；14、回忆录（下）；15、巴克斯的形象。作者罗珀 1939—1945 年在英国陆军情报机关任职。

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一译白

克浩司,英国著名汉学家。1898年来华,为英国使馆的翻译学生,1903—1913年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他收集了许多中国古籍和善本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完全在北京定居,全心用于汉文研究和翻译,不与外界往来。1937年日寇占据北京后,被迫搬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居住。1942年他被列为首批遣送回国的英侨,但他不愿意回去,后死于北京法国医院。他与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还合著了《清室外纪》(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和《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is,Compiled from State Papers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1910年),均译为中文。

11、《亨利·墨菲在中国的建筑生涯》(Building in China:Henry K.Murphy,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China,1914—1935)(2001年,英文)

郭伟杰(Jeffrey W.Cody)撰写,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全书共264页,图片61幅。这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教师。

全书共5章:1、横渡太平洋的挑战:墨菲与中国的相遇,1914—1918年;2、建筑中国风格的实践:墨菲在上海和北京,1918—1919年;3、建筑大学和公共建筑的实践: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和银行,1919—1921年;4、建筑荣誉:合作、坚持和荣誉,1921—1927年;5、建筑城市:孙科、蒋介石、和广州、南京重建计划;结论:墨菲的贡献。附建筑插图1249张,照片49张。

亨利·墨菲(Henry K.Murphy,1877—1954)是最早来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之一,美国人。他的建筑理论和运作方式对近代中国建筑的形成和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境内留下了大量的近代建筑。在北京地区,1914年他为清华学校制订了第一个校园规划,1916—1920年设计

并建成大礼堂等四大建筑。1920年为燕京大学制订规划,总体布局吸取中国园林的处理方法,注意结合自然地形,单体建筑为“传统复兴式”,采用庑殿、歇山及两者结合形式的屋顶。燕京大学校园、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分馆等这些颇有中国建筑风格的近代建筑都是他的作品。

12、《一个死过两次的人:北京的莫理循的生活和传奇》(The Man Who Died Twice,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orrison of Peking)(2004年,英文)

彼得·汤姆生(Peter Thompson)和罗伯特·麦克林(Robert Macklin)撰写,2004年由澳大利亚的Allen & Unwin出版,共380页,照片多幅。彼得·汤姆生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曾任Fleet Street的记者20余年,Daily Mirror副总编、Sunday Mirror总编和Mirror Group Newspapers的社长。成为职业作家后,他写了多部人物传记。罗伯特·麦克林也出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澳大利亚电影和电视学校,先后在Courier-Mail,后为The Age, The Bulletin, The Canberra Times写稿,直到2002年。他还写过三本小说,现居堪培拉,在写书的同时,也为电影电视写稿。他们还合作写过The Battle of Brisbane等三部曲。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862—1894年,包括8章:1、鞋匠;2、最高贵的职业;3、奴隶;4、跟随别克和威尔士;5、新几内亚历险;6、医生的命令;7、东方的诺言;8、一次愉快的旅行。第二部分为1895—1911年,包括9章:1、曼伯利的男人;2、秘密代理人;3、中国问题的困惑;4、皇太后;5、1900年的义和团;6、避难和惩罚;7、莫理循的战争;8、到北方;9、革命了。第三部分为1912—1920年,包括6章:1、中国的斗士;2、矛盾的心情;3、背信弃义的日本;4、王朝;5、情感的旅程;6、最后的挣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7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4 月 5 日 召开局系统学术委员会 2007 年第一次会议, 通报局科研工作情况, 并讨论了《北京市文物局科研工作规划》。

4 月 10 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及其夫人参观首都博物馆。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波、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及党委书记韩永等陪同。

4 月 10 日~11 日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冯书亮、副主任匡国良与 20 余位委员视察太庙、柏林寺、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等文物保护单位。

4 月 12 日 由首都博物馆与法国巴黎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07 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活动, 以及该活动两项重要展览“摄影的诞生——一项法国的发明”和“维利·罗尼眼中的巴黎”摄影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驻华大使苏和、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出席了开幕仪式。北京市市长和巴黎市市长分别为展览发来贺辞。

4 月 15 日 朝阳区下三条小学搬出东岳庙东路。至此, 东路除娘娘殿一处因公安部门特殊需要无法腾退外, 其余部分全部腾退。

4 月 24 日 “2006 年度北京地区博物馆行业奥运培训工作表彰大会”在首都博物馆召开。大会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10 个“首都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和首都博物馆等 6 个“奥运培训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 对首都博物馆社教开放部主任杨丹丹等 15 名“首都文明服务明星”和鲁迅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郑智等 7 名“奥运培训工作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 并发放了奖金和奖品。

4 月 25 日 召开“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动员大会”, 局属单位党政领导及机关正、副处长出席会议。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对开展创建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4 月 28 日 李大钊故居修缮工程竣工并举行了开放仪式。

《悲鸿南归——徐悲鸿绘画经典作品苏州特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出席开幕式。

4 月 29 日 市宣传系统调研工作会议对 2006 年度优秀调研报告进行表彰。我局上报的《北京旧城文物保护单位腾退和环境整治的调研报告》荣获 2006 年度北京市宣传系统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4 月份 由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与京华出版社合作的《北京文物百科全书》正式出版。

在大觉寺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两期法制培训班。培训内容为宪法、物权法及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分析。局机关全体人员及局属单位馆级领导约 100 人参加了培训。

5 月 11 日 市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报告会》在康铭大厦举办。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作了题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的精彩报告。

5 月 14 日 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奥组委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第 36 届世界期刊大会招待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 国际期刊联盟执行主席唐纳德·库默菲尔德, 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孙安民,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出席了招待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期刊出版界精英、嘉宾和媒体代表近 400 人出席了招待会并参观了首都博物馆展览。

5 月 17 日 由北京市科协、北京市信息办和北京市文物局共同主办的“2007 年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在北京科技活动中心举行。国内外近 100 位数字博物馆专家出席了会议。

5 月 18 日 首届“我看博物馆”公益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颁奖仪式暨展览开幕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李培松、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启刚、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赵靖云等领导出席了活动并为获奖者颁奖。

5 月 22 日 《北京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修改协调会在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的写法。

5 月份 完成国务院行政法规清理工作,并将清理意见报市政府法制办。

“当代博物馆学前沿译丛”系列丛书第二本《展览论》正式出版。

妙应寺白塔勘察工程开工。此次白塔勘察工作由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内容包括对白塔塔身的检查、白塔地基及周边地形的检测等。

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完成国子监复原陈列设备采购,北京孔庙历史沿革展览设备采购,国学教室装修及设备采购,祭祀乐器、礼器复制品展示厅装修及设备采购,室外照明终端设备采购,孔庙国子监古树保护绿化及环境整治等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6 月 8 日 人事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表彰大会。首都博物馆被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怀柔区文化委员会周洪福同志、密云县文物管理所祝自祥同志、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刘卫东同志、十三陵特区办事处高

小华同志被国家文物局评为“文物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密云县古北口镇政府旅游办公室主任王长青同志、延庆县八达岭镇石峡村农民梅景田同志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优秀长城保护员”称号。

6 月 10 日 由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研究所、首都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承人与学术界的对话——北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规律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6 月 19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63 次市长办公会听取了关于《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规划》的汇报。

6 月 21 日 市文物局与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联合在康铭大厦召开“学习贯彻《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工作会”。会议由于平副局长主持,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李培松、社会文物处处长王莉、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所长陈平以及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 20 余位委员出席了会议。

6 月 27 日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和首都博物馆共同承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成就展》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开幕。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吴邦国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

市政协副主席黄承祥带领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委员视察南新仓,孔繁峙局长陪同。

6 月份 市委宣传部确定全市 2007 年调研课题项目,我局承担其中 5 项。

第五批援藏干部卢嘉兵同志赴藏工作。

在局系统开展“加强作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主题教育月活动。举办了专题党课、警示教育、党风廉政建设文化活动策划、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培训班、党风廉政建设知识竞赛等活动。

2 季度 成功举办“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我看博物馆”公益摄影大赛、香港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第

二届数字博物馆国际研讨会、5·18 国际博物馆日专场晚会、讲座和鉴定以及“历史的记忆——名人与和谐文化”巡展等。

成功举办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遗产日当天在太庙举行了隆重的主会场活动。主要内容为太庙修缮工程竣工仪式,故宫、天坛等 4 处世界文化遗产 5A 景区授牌仪式,表彰北京市文物保护先进个人,近年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成果展,近年来北京地区文物修缮工作成果展,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图片展览等。全市各世界文化遗产地、各区县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审批注册了北京李大钊故居、中国电影博物馆、胡同张老北京民间艺术馆 3 家博物馆。

开展博物馆重新登记工作。下发了通知和重新登记表格,有 90 多家博物馆按时反馈了重新登记材料。

组织完成 2007 年度“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消防安全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制定并下发《北京市文物局直属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考评方案》和《北京市区县文化委员会文物安全和文物行政执法工作考评方案》,并按照方案完成了区县上半年考评和局属单位第二季度考评。

完成 62 家国保单位的巡视检查工作,对 13 处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了抽查,对 33 家博物馆进行了检查。调查处理群众举报 21 起,处理违法案件 5 起,拆除违章建筑 5000 余平方米。

组织对公检法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13 次,接待前来鉴定的人员 20 余人次,共计鉴定涉案文物及复、仿制品 360 余件,起草、打印鉴定意见 13 份。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玉河文保试点工程中清理出东不压桥、明清玉河河道堤岸等重要遗址。

2007 年第二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122546	88904	33642	20962	8438
大觉寺	73303	48123	25180	4674	1473
正阳门	19191	12011	7180	343	1169
徐悲鸿纪念馆	13990	2303	11687	97	2755
智化寺	16348	11013	5335	598	3574
辽金馆	6360	0	6360	1335	2435
西周馆	17021	0	17021	10089	1172
艺博	34436	27998	6438	1190	2100
团城演武厅	14419	0	14419	2479	3032
大葆台	6120	0	6120	1404	
大钟寺	82056	12036	70020	1606	6920
古建馆	19203	14947	4256	88	1990
白塔寺	26226	11784	14442	726	6505
老舍纪念馆	4374	1613	2761	764	838
德胜门	48077	44369	3708	426	3282
石刻馆	16392	13682	2710	531	2710
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	29914	19410	10504	4500	9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 2007. 3/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402-1912-3

I. 北… II. 张… III. 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 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119748 号

北京文博(2007 *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 元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部分介绍(二)

承恩寺

●年代:明至清

●说明:承恩寺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街,始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予修缮。承恩寺占地约6000平方米,共计四进院落。包括山门、天王殿、大殿、后殿,院墙四角有瞭望烟楼,下有地道相通,为明、清寺庙所罕见。天王殿保留四幅腾龙壁画,绘画技艺高超。寺内存有明初碑刻2通。承恩寺是研究明代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



万寿寺

●年代:明至清

●说明:万寿寺位于海淀区苏州街长河北岸,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六年(1761年)扩建成现在规模,为京西著名的皇家大寺。万寿寺布局严谨,错落有序,规模宏大,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堂、观音殿、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和万佛楼等,主殿的两侧均建有配殿、配房、群房等附属建筑。东路为方丈院,西路为行宫院,是慈禧太后去往颐和园途中驻蹕休息之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ISBN 978-7-5402-1885-0



9 787540 218850 >

定价: 10 元